

老西寧

LAOXINING

靳育德 著

探访 古城的遗迹民风

感受 河湟故土的苍凉

追寻渐渐远去的历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再现 那渐渐淡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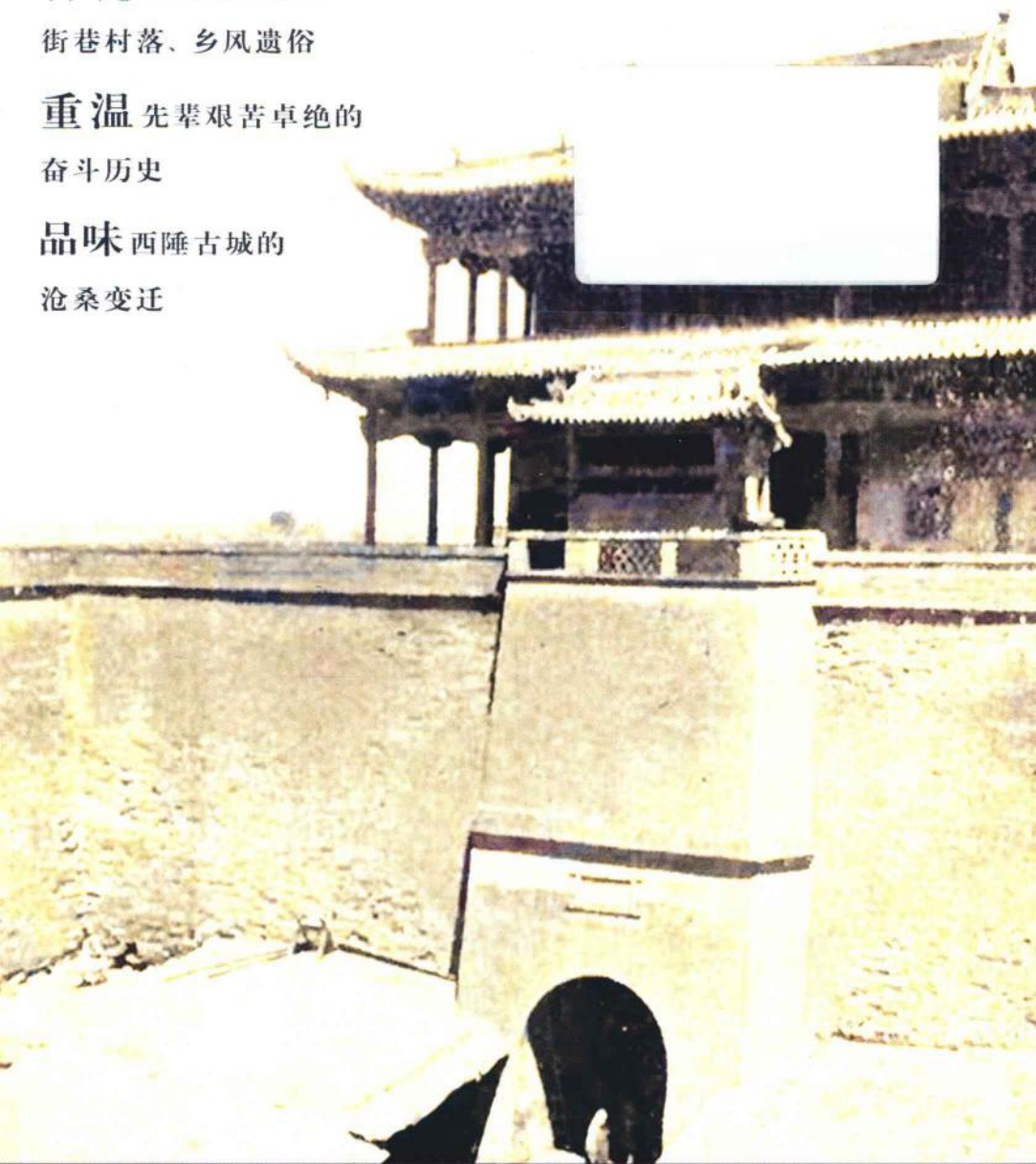
街巷村落、乡风遗俗

重温 先辈艰苦卓绝的

奋斗历史

品味 西陲古城的

沧桑变迁



封面、封底照片摄于1914年

ISBN 978-7-225-04211-4



9 787225 042114 >

定价:28.00 元

老西寧

LAOXINING

靳育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西宁 / 靳育德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225 - 04211 - 4

I. ①老… II. ①靳… III. ①文化史—西宁市 IV.
①K29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2844 号

老 西 宁

靳育德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策 划 万晓辉

责任编辑 万晓辉 马丽娟

装帧设计 王小剑

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4211 - 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根深才能叶茂

陈元魁

先做个假设:解放初期至后来的整个建设时期,如果西宁乃至青海,始终保持恒久的文化眼光,在城外荒郊野滩建设新西宁,而把砖包城内的西宁古城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古迹完整地保存下来,维护至今,如今的青海旅游将是何等局面?不难推想:留给后人的不仅仅只是用来挣钱的独特的古城遗存,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

可叹历史局限造成的文化的短视、弱视,让青海错失了一个天赐良机。

再做个假设:如果浙江曾经的执政者为了开辟大量耕地,以保证多打稻谷而把西湖填埋;如果湖南曾经的执政者因为湘西凤凰古城养育过陈宝箴那样的封建官吏、沈从文那样的“臭老九”,下令拆毁凤凰古城;如果陕西曾经的执政者因为长安是历代封建都城,张扬了封建皇权而颇令摧毁西安城池,那么,今天的浙、湘、陕三省的旅游形势又将如何?这也不难推想:留下来的只会是千古骂名!

可悲错误的思潮导致政治上的偏狭独断,不知毁灭了多少文化瑰宝。

如今,中央电视台在反复播放着一句公益广告词:失去的不能追回,现存的要倍加珍惜。这是敲响在每个华夏子民耳边的警钟。

庆幸的是如今的政府,已经意识到文化建树与政治建树、经济建树同等重要。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靳育德先生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奉行者和实践者。说他自觉,是因为他对地方文化的热情发自本真;说他自信,是因为他对地方文化的认知

锲而不舍。作为地方文史文化的传播者,他始终保持着悠远的文化视觉和宽厚的文化襟怀,翻阅古籍,查阅史料,实地调查考证,年复一年地坚持地方文史典故的书写。不张扬,不卖弄,默默地为青海本土绘制文化宗谱,为失去的西宁古城描画一幅在记忆中永久存活的立体画卷,践行着一个文化良知者和先见者的历史使命。

他奉献给读者的新作《老西宁》,不同于先前出版的《河湟随笔》、《河湟杂记》、《河湟拾遗》,而主要把着眼点投在西宁这个文化客体上面,并在“老”字上多作阐述。着眼点的改换,使文章立意更加明确,主题更加鲜明。以时尚话说,是前三部作品的升级版或者精华版。强调对“老”西宁的再度认知,使耳熟能详的西宁地方文史资料突显历史的深邃感和文化意味的厚重感。加上针对内容匹配的众多老照片,让老的地方文史典故焕发出新的文化价值。

“老”字用在这里,不是呈现衰弱、陈旧、退化,而是辩证地呈现出事物的另一种存在特征,即它的悠远、厚重、博大、绵长和淡定。西宁人习惯把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称为老大树。一个“老”字,既表达出对观赏主体的敬意,也表达出被观赏客体的尊严。老,是对西宁文化宗脉的客观认定和首肯。做为西宁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西宁的文史典故以老尊称是受之无愧的。

靳育德先生作为西宁古城文史典故的记录者或者记载者,从旧街巷名、寺院寻踪、村庄山寨、旧校追忆、历史名人、沧桑留迹六个侧面,客观忠实地阐述了西宁这座古城的历史发展渊源和自然人文形成的文化必然性。以文化视角,投射出作为古城灵魂的工、农、商、学、兵等社会群体以及宗教文化、民居文化、民俗文化在西宁的历史沿革中发挥的作用和占有的位置。这些作用和位置,都以“老”的特征延伸进新的时代和新的认知领域。当然,强调和肯定地理位置的老,街市面貌的老,民情民风的老,历史渊源的老,不是为了单纯的怀旧,而是为了给新的认知领域提供一个立体又鲜明的参照物,让后来者和外来者通过比对,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怀旧是为了沉淀情感,确立文化归属感。唯有有了连着血脉、牵着筋骨的情感和文化归属感,认知新生事物才不会盲目和浅薄。一如面对一株大树,我们在肯定它枝繁叶茂的同时,必须肯定它深深扎进泥土的那些看不见的庞大根系。只有认清了整个根系的面貌,才有理由相信大树的繁茂会历久弥新。



目录

旧街巷名 1

观门街 法院街 心寺街 教场街
 饮马街 府门街 县门街 莫家街
 大新街 小新街 仓门街 隍庙街
 会馆街 兵部街 黄学街 水眼洞街
 官井尔街 北斗宫街 弘觉寺街
 雷鸣寺街 斗行街 前营街 后营街
 玉井巷 营房巷 斜石巷 社学巷
 驿街子 广济路 莫家路 南、北小街
 大同街 南城壕·南关街 后街·后后街
 纸坊街 土巷道

寺院寻踪 35

北禅寺 南禅寺 普济寺
 大佛寺 弘觉寺 金塔寺
 法幢寺 东关清真大寺
 塔尔寺 西纳下寺 广惠寺
 会宁寺 东科寺 扎藏寺
 佑宁寺 却藏寺

村庄堡寨 50

龙泉谷·深沟儿 铁佛寺·寺台子
柴小庄·王家庄 林家崖 褚家营
小寨·王同堡 韵家口 土门关
近郊六寨 深涧堡·张家湾 扎麻隆
乌思巴堡 刚岔村 合尔营 佐署
葛家寨 海马泉 苏尔吉 班沙尔·
大閤门 朔屏台前汉东川 甘河
圆山古堡 隆思干 拉布尔

旧校追忆 99

西宁第十四中学 西宁第一中学
西宁第五中学 西宁市西关街小学
西宁市观门街小学 西宁市南大街
小学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 西宁市
解放路小学 西宁市玉井巷小学
西宁市大同街小学
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 西宁市保育
院 西宁市五四大街小学
东关回族女子小学

沧桑留迹 119

吃人命 柴皮子 扒炕灰 红崖
滑坡 席茺 硬柴 羊脚巴
胡儿条筷子 贴钱马 打醋罈
丢钢儿和拌馒儿 “白方儿”和“咕
尔典” 地锅儿 凉圈儿和沙瓶
皮筏 搁大粪 锅罗锅和碗儿匠
冰桥 丹噶尔歇店 金书铁券
苍崖遗迹何处寻 人间仙境仙米
峡 说“腊八” 说“小年”
闹元宵 清明时节 话中秋
岁岁重阳 故乡的回忆

历史名人 106

无弋爰剑 霍去病 赵充国
秃发三兄弟 源贺 唢厮啰
宗喀巴 史昭 柴国柱
罗卜藏丹津 杨应琚 左宗棠
马麒 黎丹 朱绣 周希武
马步芳 王洛宾

《水经注》中西宁境内

湟水支流谈 181

附：老西宁地图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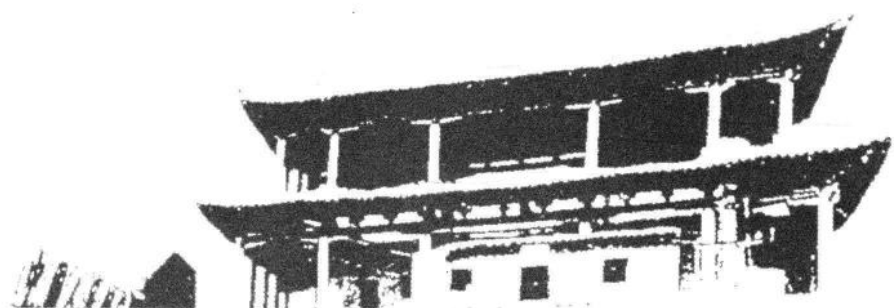
西宁卫城图

重刊西宁卫城图

西宁府城图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西宁街市图

后 记 190



旧街巷名





观门街得名于当时建于西宁城东北隅的广

观 门 街

福观。明永乐二十二年,西宁都指挥僉事李英

因功被永乐皇帝朱棣赐封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并特准李英在西宁建真武庙的请求。之后,李英亲选庙址,督工兴建,宣德元年冬十二月建成后,派专使进京请皇帝赐名,宣德帝以“广福”赐观额,后称西宁真武庙为广福观。广福观是当时城内重要的寺观,虽曾多次维修,但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坍塌殆尽,惟留有一观门街名,叫到如今。

法院街得名于这里曾设过的宁互地方法院。

法 院 街

清初,一名叫旭止的江宁(今南京)和尚来西宁

化缘建寺,后经西宁府、县官员的允许,在城内北城墙根建起寺院,定名“葆宁寺”(今玉井巷小学校址)。葆宁寺因地处城中,加之旭止和尚的声望,一直香火兴盛。但到上世纪初,因寺院佛徒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只十余年功夫,寺产即被变卖殆尽。1929年青海建省,机构初创,困难重重,只得在破败的寺院中筹建西互地方法院,以审理西宁、互助两县的民、刑案件。由此缘故,寺前通道逐渐被人们称作“法院街”。

心寺街今已不存,原是南大街西侧东西向

心 寺 街

的一条小街,即在今省劳改局地段,曾称“布政司街”。它的得名与印心寺是分不开的。印心寺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甘肃天水有一个七岁的姜姓小孩自称是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之后,剃度出家,法名“佛敏”,成名后“来宁发愿修寺”,得到西宁道当局和信徒的支持,占用明代西宁卫布政分司官署所在地,建成印心寺,两百多年间香火不断,所以寺前的原布政司街又被人渐渐改称为“心寺街”。省劳改局机关的修建,使原街被封闭。

教 场 街 **教**场街得名于小校场。明代由于西宁“孤悬绝塞,外控番夷,中卫华夏”的特殊地理位置,设西宁卫后,就设镇守总兵官,以管辖军务,城中置小校场,作为“岁时校阅,护守城池”之所。当时的小校场在城东南隅。清王朝建立后,随着临巩总兵官移驻西宁,统领马步军达 12 425 名,其中城内镇标五营营兵即达 4 500 名,随之小校场移至今省政府所在地。小校场占地 20 多亩,设东西二门,两门外的通道逐渐被人称作“东、西教(校)场街”。随着城市的发展,东教场街因被封死而消亡,西教场街独存,人称“教场街”。

饮 马 街 **饮**马街得名于左营军马饮水一事。旧时西宁市区虽地处湟水南岸台地,但地下水却比较丰富,先民们早就掘地成井,汲水使用。明初改建西宁城后,不久即将防守西宁卫的左营游击(明清两代武职官员级别名)署设在这里,此外,还建有兵卒营房和能圈养 800 多匹战马的马厰和料场。当年饮马街地区就有一眼水脉旺的井,井旁设有一长溜石槽,作为军马饮水之用。汲水兵卒轮流摇动辘轳,清澈的井水不断被到进槽里,湿漉漉的街道渐渐被称作“饮马街”。

府 门 街 **府**门街即今文化街。清雍正三年(1725 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后,西宁府衙门即设在原明代隆庆元年修建的通判署内。18 年后(1743 年),西宁府知府申梦玺对公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它右靠西宁县署(后迁往今人民街),左接文庙和儒学,高堂

朱户，庄严威仪，一直是当时西宁府最高行政当局所在地。因西宁府衙门在此，府前街道被称作“府门街”。

县 门街即今人民街。清初，震惊全国的罗卜

县 门 街

藏丹津之乱后，雍正三年设西宁县，县署即设

在今文化街原明代通判署之西，与西宁府府署相邻。36年后的乾隆二十六年，西宁县署奉命迁往水眼洞街（今人民街省财政厅家属院址），直到1945年，西宁县改称湟中县，县署迁往文华镇（今鲁沙尔）为止。在长达184年中，这里是西宁县县署办公的地方。所以人们渐渐改称县署门前的街道为“县门街”。

莫 家街是西宁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在元末

莫 家 街

群雄争霸的烽火中，安徽寿州人莫得投奔朱

元璋，后因军功封为西宁卫世袭指挥僉事，坐镇西宁。据现存《古湟莫氏宗谱》中由晚清西宁著名书法家和诗人张思宪所撰的序来看，西宁筑城时，莫得曾在长兴侯耿秉文的指派下，负责这一工程，因忠于职守，所筑墙体坚固而受到嘉奖。后其子莫云继任此职，因功又被加封指挥同知，莫氏后人即在今莫家街一带卜地筑屋，建起私邸，并在私邸附近建起莫氏宗祠，人们以“莫家寺”称之。寺前街道，渐渐被人们称作“莫家街”。

明 弘治初年，专设抚治西宁兵备道官员一

大 新 街

名驻西宁，作为“宁郡大员”，官署分两处，在

今大新街一带的一处叫“东察院”。1586年，留任西宁兵备道副使的万世德将旧道署东察院进行了扩改，作为抚治西宁兵备道的办事衙门，南察院后作他用。清承明制，这里又成了清分巡西宁道的办事衙门。清王朝灭亡后，1914年衙门终于因失修而坍塌。1916年，废道署地皮由十家买定，中间留出一条南北向的街道，人称此街为“新街”。小新街开通后，为示区别，改称“大新街”。



教(校)场街



斗行街



弘觉寺街



饮马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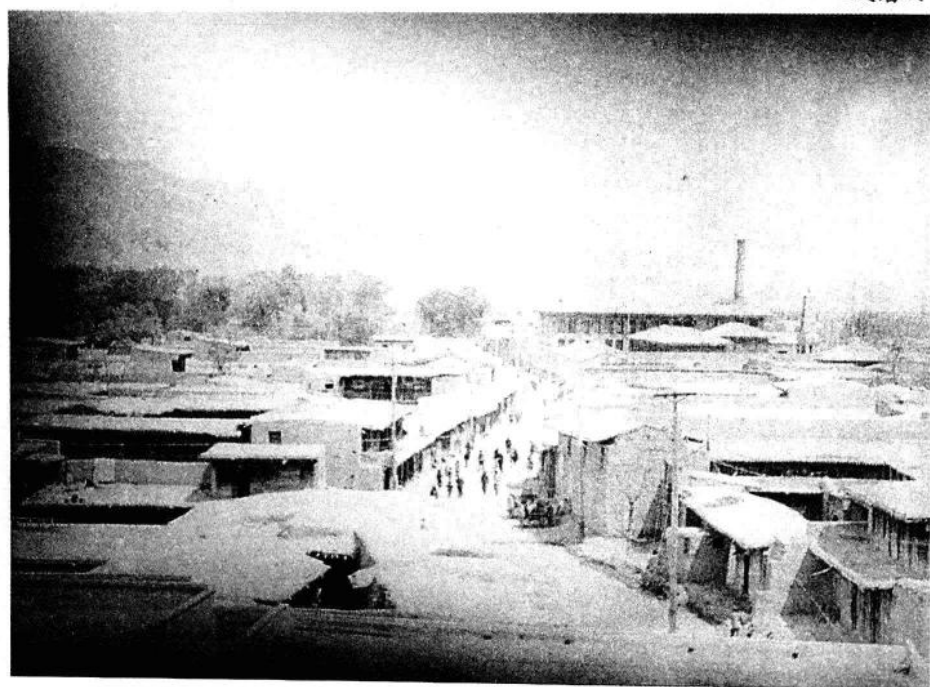
上东关大街

老照片



北城門內側

城牆外





小新街

清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八月,时任临巩布

政司印务西宁道的杨应琚为达到“成人才、厚风俗”的目的,专门申请在西宁开设贡院。经同意后,即在今小新街所在地购地修建贡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建学堂,西宁贡院也随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屋舍也“日形坍塌”。1918年,当局将它划拨给师范学校,学校即将贡院拆毁,开成街道,两侧修成楼房铺面,“招商以为学产”,人称“小新街”。

仓门街

仓

门街得名于西宁仓。明洪武二十九年

(1396年),当局在这里构筑粮仓,定名西宁仓,并派西宁仓监收判官一名,以负责管理仓粮入库、调拨和监守工作。“海寇”之患中,由于西宁周边军事形势严峻,大军齐集,粮糈需求量大,明都御史石茂华曾上书,要求在西宁增设通判,以提高西宁仓场的管理级别。西宁仓的设立,使“广籴征贮,以备不虞,水旱有备,地方大幸”。因此,粮仓前形成的街道称为“仓门街”。

隍庙街

隍

庙街即今之解放路,得名于这里的西宁城

隍庙。西宁城隍庙始建于元代,据说供奉的城隍是东汉护羌校尉邓训。邓训在任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待羌胡以恩情,深得羌人心。邓训去世后,家家“为训立祠”以祭之。清初,庙前街道被称为“庙街”,后来渐渐改称“隍庙街”,与会馆街一起,是当年西宁最繁华的两条街道。

会馆街

会

馆街即今之兴隆巷,原称后街,又得名于

这里的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商人集资筹建的。他们远离故土,在外经商,为了加强彼此联系,互相关照,增进乡谊,交流商情,协调商务纠纷,融洽与官府的关系,设立了山陕会馆这样一个

共同议事的场所。原建于今湟光附近,但毁于 1895 年的战火,5 年后在城内后街茶店地址重建。建成后,很快成了城内一处热闹的地方,门前的后街也很快被人们改称为“会馆街”。

兵部街即今之解放巷。300 多年前,这里是明

兵 部 街

王朝西宁卫南察院所在地,正德年后,“海寇”之患起,战火燃遍山川,西宁卫副总兵李魁,百户郭承勋、刘世爵,洮州副总兵李联芳等先后战死,陇右之祸,九边震动。万历十八年七月,明神宗诏遣兵部尚书郑洛率军西征,八月,郑洛入驻西宁,行营即设在南察院。因第一次有中央王朝六部大员驻扎西宁,老百姓将南察院前街道改称“兵部街”,以示荣耀。

黄学街,亦简称为“学街”,即今城中区文化娱乐城。明宣德三年(1428 年),都督史昭在西宁建

黄 学 街

文庙,并在其侧修建了儒学,供生员读书。因此卫儒学前通往东大街的街道被称为“学街”。清雍正三年,改卫儒学为府学,至乾隆时,街名已改为“黄学街”。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又改为“勤学巷”。上世纪 90 年代,整个勤学巷被拆除,改建为城中区文化娱乐城。

水眼洞街实际上是“水眼头”,后来的水井巷

水眼洞街

是上世纪 50 年代命名的。原来南山寺根水渠的一条支流经渔场台,通过今水井巷南端城墙下的一个洞眼,流入城内,供城内居民清扫及城内菜园灌溉使用,因此“水眼头”竟成了这一区域的地名。上世纪 30 年代,有人在此购地建屋,一些作坊相继设立,人称这儿为“水眼洞街”(包括今人民街部分地区)。50 年代,西门城楼及城墙被拆毁,路面拓宽拉直,面貌一新,改称“水井巷”。

官井儿街即今民主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西

官井尔街



西宁市邮局(原设在大新街)

西宁城墙下的百货商场





西宁市大街一角

斜石巷

老
照
片



宁虽地处湟水南岸台地，常年干旱少雨，但地下水却比较丰富，据考古发现，这儿就有两千多年前挖掘的深达十余米的水井。今民主街原来有一口水脉旺的井，属公众所有，所以称“官井儿”。有人在此终生以打水、送水为业，许多老年人对此尚记忆犹新。解放后，街名改为“民主街”。

北斗宫街

北斗宫街与官井儿街、水眼洞街是西宁西

大街南侧的三条古老街道，清朝初年就有。北斗宫街以这儿建有一所道观——北斗宫而得名。北斗宫宫址在街东，官井儿街西侧，只有一个院落。它的右侧还建有修道院，当年护送班禅的专使曾一度住在这里。

弘觉寺街

弘觉寺街以这儿建有古老的弘觉寺而得

名。弘觉寺，本名“妙华庵”，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永乐十年，赐名“弘觉寺”。清代为避乾隆皇帝讳，曾改名“宏觉寺”。它一进三院，从建筑规模、布局设计、艺术价值上说，只有葆宁寺才能和它媲美。弘觉寺后来成为拉卜楞寺的属寺，除作为拉卜楞寺的一处佛教教场外，还作为该寺僧众朝拜塔尔寺途经西宁时的寄宿之处。过去由于香火颇盛，因寺得名，明代已称寺前街道为“弘觉寺街”。此街南侧还有金塔寺。

雷鸣寺街

雷鸣寺街亦以这儿曾建有雷鸣寺而得名。

雷鸣寺创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寺南向，正殿为二层。据说当年正殿落成时，忽然乌云四合，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寺主认为上天感应，遂将寺定名为“雷鸣寺”。雷鸣寺今已片瓦无存。

斗行街

斗行街位于观门街北端，缘于这儿曾是粮食杂糴的地方。过去，粮食用升子量，十合为

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所以经营粮食买卖的行业叫“斗行”。据史料记载,清前期把做这种行业的地方叫粮面市,清末又改称为斗面行,主要设在府门街和黉学街,清王朝灭亡后,一度迁往礼让街。1941年日机轰炸西宁后,为便于疏散,尕北门作为新开挖的四个城门之一,即在今观门街北端。1943年,当局将粮面市迁往尕北门,遂名其地为“斗行街”。

明 嘉靖三十一年,经巡抚王浩奏请,西

前营街

宁卫防卫机构的级别由原来的守备提高为

参将,即在今西大街南侧修建参将厅,作为守护西宁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参将厅下辖中营和左营、右营,管辖马步军共9710名。清顺治十三年,将管辖西宁的最高武职自临巩移驻西宁,设西宁总镇,并在原来三营的基础上,除增设了前营和后营外,还另设了城守营。新设营的军官配置级别低于原来的三营,只设都司一员,统有马战兵480名,步战兵320名。新增的前营驻地在今宏(弘)觉寺街中段五中校址附近,后称这儿为“前营街”。

因 与前营街得名的原因相同,清顺治十三

后营街

年,新增的后营驻地在今城中区前营街小学

附近。后营也只设都司一员,统有马战兵480名,步战兵320名。后称这儿为“后营街”。在当时西宁只有两万左右人口的情况下,城内镇标五营驻军竟高达4200人,凸现了当年西宁作为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

玉 井巷得名于原西宁县监狱。明初,长

玉井巷

兴侯耿秉文率兵修筑西宁城后,在今玉井

巷南修建长兴侯府第,后改为西宁卫衙门。北面因修城取土而形成的“涝坝”被填平后,设在城驿(驿站名),设驿丞,专管递送官府紧要公文。故驿前通道称为驿军巷。清雍正三年,新设西宁县,7年后,知县沈子绩建县狱于驿军驻地,后西宁府府狱亦在此建成,并明令此巷禁止百姓通行,驿军巷渐渐被改称“狱禁巷”了。清乾隆二十六年两狱合并,直到1929年才迁往他处,原地皮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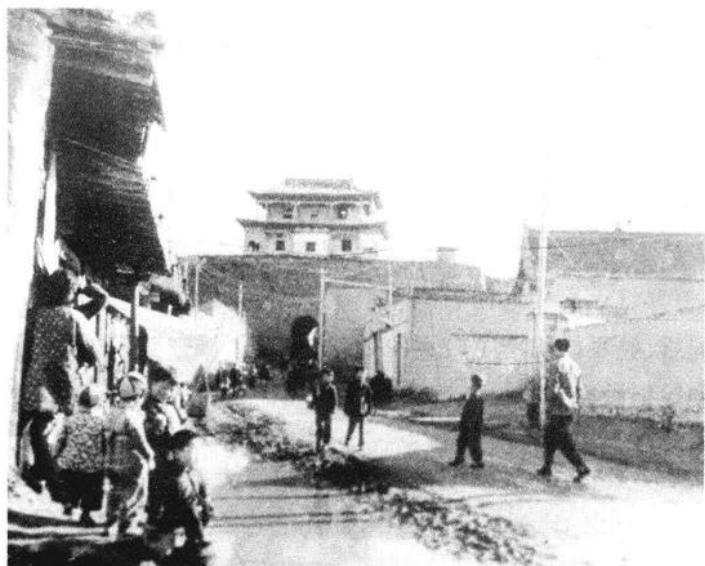


西宁西门城楼内侧(照片左侧平房为初设的中国人民银行)



修建中的长江路(照片右侧可见尚未拆毁的回城墙)

西宁南门
城楼前的
南大街



东城墙下的花园南街





给一盐商。盐商嫌其名不雅，改“狱”为“玉”，改“禁”为“井”，并书写招牌为“玉井巷盐栈”，从此就有了“玉井巷”的街名。

营房巷

营房巷得名于清西宁府镇标中营守备署。

明西宁卫参将厅下辖中营在今营房巷，设中军游击（军职名，低于参将而高于都司）一员，中军都司一员，所以曾称“中营房街”。清王朝立国后，驻军机构有了较大的变化，另设了城守营和前营、后营，但中营的地址和级别没有变化。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城中镇标五营被裁撤，只留下了营房巷名，让人还能想起那渐渐远去的历史。

斜石巷

清初小教场自“城东南隅”移至明代西宁

卫“草场”后，今省政府所在地就成了城内镇标五营营兵岁时“校阅之所”。当年校场西侧除了一些人家院落外，尚有不少地段是畦田菜地。由于小校场设东西二门，校场西门外连接西城门一线，渐渐被人们图近走捷路，成了斜斜的一条便道。后随着人家增多，成为巷道，为防路湿难行，和石坡街一样，铺垫石块，人称此巷为“石巷”。当年因与横平竖直的西大街和校场街相比，石巷显得不直，故称“斜石巷”。上世纪前半叶，有名的“西北歌王”王洛宾就曾在这儿住过。

社学巷

社学巷得名于清代“回民社学”旧址。清

乾隆十一年（1746年），饱学多才的西宁道金事杨应琚在知府刘弘绪等的支持下，在创办新社学的同时，在回族聚居的西宁东关地区购置地皮，建造屋舍，创办了回民社学。之后，清代在西宁任职的西宁道蔡廷衡，知府马愚、玉通、龙锡庆等人先后捐银资助，社学一直办到清末。1914年，回民社学改为西宁县立高等小学，后又改为东关同仁小学。几经变迁，1969年正式命名为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因260多年前这里办过回民社学的缘故，所以这儿的街巷被称为“社学巷”。

驿街子

驿街子

街子即今之生产巷。清雍正三年建西宁县,7年后,知县沈子绩为建县狱,将“狱禁巷”驿军住宿地迁至今城中生产巷。乾隆元年(1736年),在驿军新驻地建成“在城驿”,当时有驿马44匹,驿夫32名,归西宁县管理。因这里几百年间曾作为“在城驿”的住址,所以人称其巷为“驿街子”。

广济路

广济路

济路因广济桥而得名。明万历年间,以“勇冠三军”而闻名的柴国柱任西宁卫中军守备时,曾率兵卒驻守西宁东湟水北岸,为方便交通运输而在东郭门外湟水上筑桥一座,老百姓也深受其惠,称其为“柴家桥”。清乾隆年间,杨应琚在原址建起了一座更为坚固的桥,定名“广济桥”,连接“关厢”北门(水城门)的桥南端便有人垒墙筑屋,做起小本买卖。因桥与水城门不在一条直线上,所以这条斜斜的大路渐渐成街道,约定俗成,以桥命街,就称“广济路”。

莫家路

莫家路

家路即今兴海路。莫家路的形成与北山铁佛寺是分不开的。铁佛寺建寺历史悠久,建筑华丽,有明代诗人夏瓚称赞铁佛寺的诗为证。它与北山洞窟一起,成了西宁城内士民和四乡老百姓礼佛和游览的胜地。每逢寺院举行佛事,人们扶老携幼,进献面食、奶茶供喇嘛食用,称为供“芒嘉”。当年,今党校后的湟水上搭架有便桥,莫家路一带田埂便成了去铁佛寺的必经之路,人称其路为“芒嘉路”。起初有人在此从事卖香表、蜡烛等朝佛用品的生意,后便有人摆茶园、开饭馆,成了街道,因谐音,把“芒嘉路”叫成“莫家路”。

据南、北小街

据南、北小街

史料记载,早在千余年前,东关已是各族商贾交易之地,称为“关厢”。明代“海寇”之患起,为了保护关厢商贾,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兵备副使王昂在修补西宁卫城的同时,在东门外环绕关厢修成了子城,开三门(东门即保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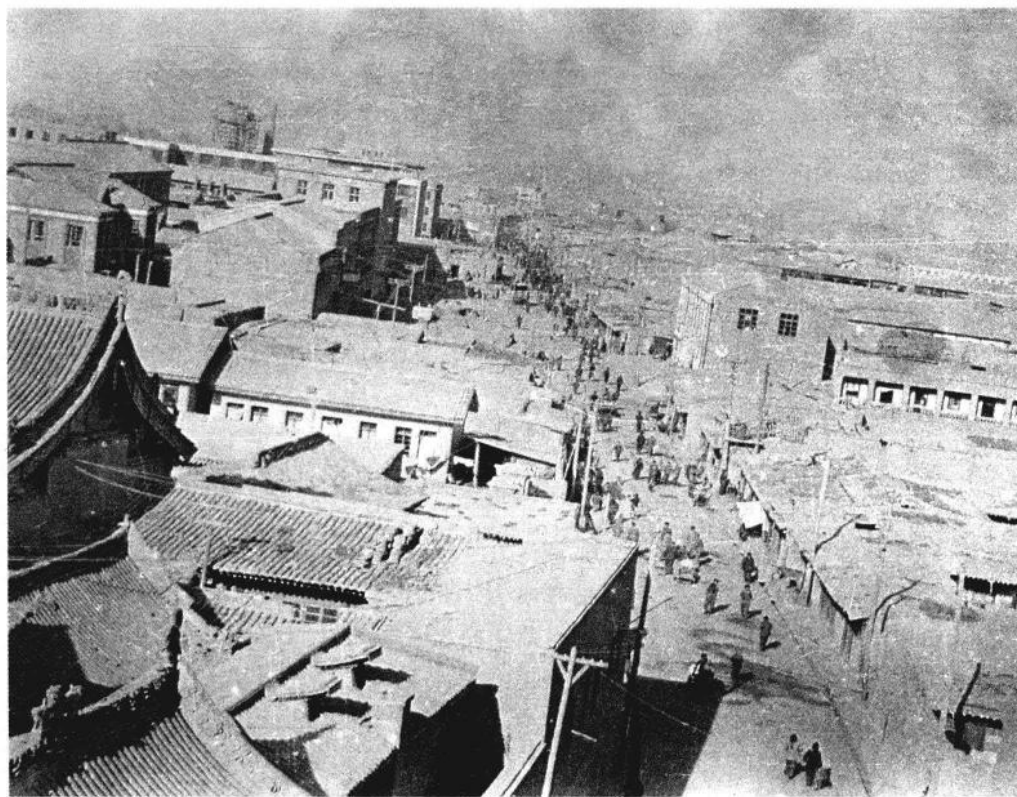


南川六一桥西侧（今
六一路），远处隐约可
见南山寺

老 照 片



城墙下长江路正在修建中



西宁旧街巷一瞥



改建中的东大街
(远处可见清真大
寺唤醒楼)



门,老百姓俗称“东稍门”,北门即水城门)。之后,连接东门和东稍门的街道,更为繁华,沿着子城南、北两门一线,逐渐也形成了街衢,即今之南小街和北小街。

大同街

西 宁城中有条大同街,地处古城西北

隅,作为横贯城内的一条重要街道,它西连尕西门,东通北大街,街道两侧不但店铺林立,而且整日车水马龙,是一条交通要道。但在几百年前,这里只叫“后马场”,是一处很不起眼的地方。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长兴侯耿秉文率陕西诸卫所士兵修筑西宁城后,作为陇右重镇,城内一直驻有重兵,到明神宗时,西宁卫参将统领马步兵3152名,时有营马2519匹。众多的马匹每天要消耗大量的草料,所以那年月给官府“上粮纳草”是老百姓的重要任务。当年供营马食用的草料集中堆放在城内封闭的西北隅,即今大同街一带,《西宁志·西宁卫城图》就标明,这里是卫城的“草场”,《西宁志·卷二·建置志》中就注明“草场在城西北隅,弘治十六年都御史刘璋奏设”。它东临茶马司、城隍庙,后来重刊的《西宁卫城图》(现存甘肃省图书馆手抄本)中也标明这里是“草场”,但“茶马司”已不存在。

清代立国后,城内驻有前、后、左、中、右镇标五营,共统辖马步兵4500名,这就是今天城内有前营街、后营街、中营房街等地名的原因。镇标五营和城守营平时负责城市和卫内各地的治安、守卫,国家有战事时,要奉调外出,应征御敌。右营就设在今大同街小学一带,管辖马战兵480名,步战兵320名。如清乾隆三十七年、嘉庆元年,右营经制外委马得、李洪发、沙兆庆等就奉调从征金川等地,先后阵亡。据撰成于清乾隆年间的《西宁府新志》记载,右营游击就驻在“西街石巷子(今斜石巷)东向”,右营守备就驻在“右营营房门,南向”,右营军营前的通道曾叫做“右营房街”,右营房街后面草场既是圈养营马的地方,也是堆放草料的场地,所以人们称其为“后马场”。为了加强对营兵“忠君”、“义气”的教育,当年每营驻扎处都建有“三圣庙”,右营的三圣庙前的香厅至今仍在大同街小学内,作为古城驻军的惟一一处历史文化遗迹,现受到政府的妥善保护。

清末,镇标五营迁往城外,所遗“后马场”成了一片空旷地,因是一处官府

用地，一直在闲置。据我省知名的地方史学者榆柳先生说，清王朝灭亡 10 年后的 1922 年，西宁道尹黎丹、县长周子扬、巡警局长明璋等筹款在这儿建起丰黎仓，共有 32 间仓房。因城内原有义仓和社仓，所以老百姓俗称丰黎仓为“朶仓儿”。12 年后，当局废除丰黎仓，将地皮分别赏给“马家军”头面人物金耀星、赵遂等人，让他们修建私宅，一时间偏僻荒凉的后马场顿时成了达官贵人的天下。不久，人们顺路建起一些装有灰色门窗的铺面。

1941 年 6 月 23 日，自山西运城起飞的 27 架日本敌机轰炸西宁，在当时只有 5 万人口的城内和郊外“投掷 200 多枚炸弹、40 多枚燃烧弹和上万发机枪子弹，摧毁 500 多间建筑物，炸死回汉老百姓和巡警等 43 人，伤残 28 人”，给西宁人民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为了预防再次空袭时疏通方便，当局下令在号称“岩疆”的城墙上再开挖四处通道，地处封闭的后马场城墙被挖开了一个豁口，偏于一隅的后马场终于有了一个直接出城的通道，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为“朶西门”的出口。朶西门开通后，据榆柳先生说，人们互相告知：“打通了”，后马场顿时成了城内一处热闹的去处，铺面比邻，牌幌相招，卖煤卖柴的，多聚于此，俨然成了一条街道。“打通”与“大同”读音相近，且与孙中山先生所追求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意思一致，故定名为“大同街”。

历史上，西宁只有东关，没有南关、西关和北关。东关历史悠久，可

南城壕·南关街

以追溯到唐宋，因北宋元符时李远在《青唐录》中就写道“青唐城（西宁）东城惟陷羌人及陷人子孙”，说明几千年前，这里已是各族商贾交易之地。明王朝建立之后，洪武二十年（1387 年），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诸卫所士兵修筑了西宁城，因东稍门一带在东城墙之外，故当时称为“关厢”，说“东门连关厢，商贾市肆皆集焉”。后又因关厢地处东门外，就简称为“东关”。当初耿炳文筑西宁城时，弃南占北，城基“割元西宁州故城之半”，城墙“高厚皆五丈，壕（护城壕）深一丈八尺，阔（宽）二丈五尺”。城墙西、北两面“因崖为基，池不能环”，所以没有护城壕。南城墙所在地黄土层很厚，所以筑城时用土多取自这里。尤其东南角有后来称之为“山陕义园”的土台，筑城取土后留下了很深的壕沟，人称“南城壕”。这个壕沟因近年城区改建，兴修“夏都大街”而不太明显了。



西城南城墙外

老照片

西宁市搬运公司第八队





隍庙街

修建中的莫家路桥





南城壕北依城墙，南侧不远处有水渠，这条水渠西连南灌沟，东通瓦窑沟，有人形容这里“层叠丹崖如画里，纵横碧水绕城边”。水渠经过南城门处，渠上有座小石桥。如果去南山，过南城壕经石桥，不远就是“大埡壑”，过大埡壑，就是南滩了。大埡壑即在今西宁十一中一带，只所以称为“大埡壑”，是早年为了通行方便，挖开早已废弃的青唐城南城墙而形成的壑口，壑口外即是马步芳时期有名的刑场。南城壕南侧由于土层厚、有水源，当年水渠两侧绿树成荫，遍布农田、菜地，人们称为“南园”。“湟中（西宁）自古为名郡，世外谁知有美田？”近代西宁名人周光辉在《绘云阁诗草》中曾描写了这一景况。

据在世老人讲，当年南城壕作为一条车马道，从渔场台下来，沿南城壕拐向东行，到山陕台下向北拐，即可到今花园南街。平时，人们在这里比走马、溜马散步，近看城头垛堞逶迤，古砖苔染，麦田菜地，嫩黄深绿；远观青山四围，古木苍翠，寺院隐现，经幡摇荡，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不久就有人在水渠两侧垒墙筑屋，渐成村落，如李土司四门庄即在南门外。到上世纪，就有人在这儿开车马店，建作坊，修花园，据巢生祥老先生回忆，到二三十年代，仅南城壕西段南侧，就有近十家，分别为赵烧坊、李家店、邓珪店、邓珽店、李吉斋菜园、张三爷菜园、张大爷菜园、孟家花园、邓八爷家等。南城门正对小石桥的小巷里，也住有寇铁匠、权算卦、秦铜匠、丁杠房、仇奶奶、王妈妈等人家。

1941年6月侵华日机轰炸西宁后，当局为了战时便于疏散城中居民，下令在四面城墙上各开挖一个豁口，南城壕豁口即在今水井巷南口处。由于此豁口的打通，人们进出更为方便，便有人依城墙建房修院，南城壕两侧更显繁华。解放后，西宁市政府机关设在这里，汽车一场、长途客运站、煤场等单位相继建立，当年冷清的南城壕终于变成了南关街，如今，整个街道的店铺多以销售昆仑玉和金银首饰为主，灰瓦青砖，门窗玲珑，独具特色，装饰得虽素雅幽静，但又不失富丽堂皇，成了西宁有名的金玉一条街。

后街·后后街

从西宁十四中门口东行，过饮马街，

北拐弯有一东西向的街道，现在叫兴隆巷。兴隆巷原来被称为“后街”，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因为包括后街在内的这

一块地处古城东北隅,原来除了东侧有个名气很大的广福观,西侧有文庙、儒学和西宁府衙门外,这儿地处背街僻巷,距繁华闹市较远,所以连个正式的街名也没有,人们只以“后街”称之,史料中有关记载也很少。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西宁府只在这儿建起了类似今天收容流浪人员的场所——栖流所,但到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街的命运却发生了转变。原来,在西宁经商的山陕商人曾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东门外今“义乌商城”及以东地段购地建起一座“山陕会馆”,作为他们互相联系、交流商情、调节纠纷、对外联络、沟通关系的固定场所,但建成后不到7年,就在河湟事件中毁于战火。鉴于城外安全难有保障,1900年,颇具财力的山陕商人又集巨资,在城中选址重建“山陕会馆”,几经商谈交涉,终于选定后街茶店作为新馆地址,然后大兴土木,建起了“规划合理,布局严谨,殿宇宏伟,结构精巧”的新会馆。新会馆一进四院,除钟鼓楼之外,以春秋楼和三义楼为主要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尤其以木雕和砖雕之精美闻名。

新会馆建成后名噪一时,这里除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的例会外,每年还要办几次庙会,西宁第一次演京剧和演电影也是在这儿开了头。从此,冷清的后街顿时成了那年月西宁热闹之地,城里人互相戏谑时说“没事了到隍庙里转去,会馆门口站去”,把隍庙(城隍庙)和山陕会馆当作城内值得一去游览娱乐的两处场所,可见当时会馆的规模 and 影响。上世纪著名作家萧军之妻王德芬兄妹和“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都曾在这里演出过《打回老家去》等抗战话剧和教唱过《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为推动西北地区的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没名字的后街渐渐被人们叫成了“会馆街”。解放后,随着山陕会馆改作他用,会馆街也被改名为“兴隆巷”。

当年,后街的北面叫“后涝坝”,因这儿北靠城墙,是城内最低的地方,每逢下雨消雪,污浊的脏水流向这儿,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近3000平米的水池,而且冬夏不涸,人称后涝坝。一冬天尚可忍耐,夏日里水面污物满目,臭气熏天,路过者只得掩鼻而过。据张志珪先生说,后涝坝北侧的城墙根挖有数十个窑洞,一些讨饭求生者在此栖身;涝坝四周,也有些简陋土房,斑驳陆离,住着一些靠打隔褙、织口袋为生的贫苦人。处在它南面的后街尚且没有个正式的街名,人们只把它叫做“后后街”,意思是后街后面的“街”,而人们背地里却把它叫做“臭臭街”。



前营街

南关街西口(今管理站)



老照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大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湟光十字(右侧建筑物为湟中大厦)





解放后的 1951 年夏,在西宁市人民政府的发动下,百姓不分老幼,硬是用背斗等简陋的劳动工具,从城外背来砂石,填平了涝坝,一条有模有样的街道形成了。经政府批准,定名为很有时代特色的“新民街”。

纸坊街

今天,当你出西宁西门,过西关桥,

横穿黄河路,前面便是纸坊街。纸坊街

是一段不长的街道,实际上就是西关大街的一部分。过去这里并不叫“纸坊街”,人们只称它为“纸坊”,再确切一点,就叫“纸坊庄”,一个有田地、有耕畜、实实在在的农村。纸坊庄是一个很古老的村庄,近 300 年前清乾隆时修成的《西宁府新志》中,就载有它的名字,说“殷刘堡,城西百步,与西三里刘家河湾合,附南百步纸坊庄,二里圆树尔庄”。

过去西宁地广人稀,即就是几十年前,城内一些地方还有人们耕种的菜地,还住有不少以种田为生的农民,西门外更是“长山如带南北屏,湟水绕城东西行;最喜白杨林深处,鸟啼羊咩水磨鸣”,近在城郭的今五四桥东西侧全是耕地。那时,西门外南川河西岸从北往南,依次有李家屯、殷家庄、谈姓庄、纸坊庄、贾小庄、园树庄等村庄,其中纸坊庄所处的地理位置最好,因它东连通济桥、大西门,西接古城台,地处西川进城的交通线上。村庄之所以“纸坊”为名,这里肯定有过手工造纸的作坊。过去,西宁私塾、书院用纸,一般多用改山纸。改山纸吸水性强而柔软,因是甘肃成县、礼县、徽县所产,距西宁路程不算太远,价钱比较便宜,所以今西宁周边村庄各家族所存世的家谱,用的多是改山纸。虽然过去福建永安贡川镇和邵安产有用竹纤维造的贡川纸、连史纸,江西也产有用竹纤维造的毛边纸,但西宁地处边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即使有,因价格贵而一般人买不起。直到解放后的上世纪 50 年代初,贡川纸才被广泛使用。估计纸坊所产的纸,大概就是以麦草等为原料造的草纸和麻纸。

纸坊庄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城边小村,过了高槽儿,眼前全是麦田菜地,但与远离城里的其他村庄相比,由于距西门不过数百米,所以知名度还是很高的。清王朝灭亡后的第 6 年,纸坊庄东口的朶庙儿里办起了“殷刘堡私塾”。在那极不重视教育的年代里,许多村庄里没个读书人,不要说正规的学校,寨

堡大庄中有私塾的也寥寥无几。殷刘堡私塾是由殷家庄、刘家河湾、谈姓庄、李家屯和纸坊庄联合集资创办的，五个村子分布虽广，但那时人口不过百户。私塾之所以选择在纸坊庄村庙里，是因为这儿地理位置适中，便于各村学童走读。据赵仰仑老先生回忆，村庙地处今市政府综合办公楼地址，庙内大殿坐西朝东，南北为厢房，院中松柏参天，环境十分幽静。当年的私塾仅有 10 名学生，由苏家河湾的苏楼堂老先生任教，人们利用村庙大殿台地作为教室，垒土台作为桌凳，条件极为简陋。但从村庙里传出的读书声，却成了吹响南川河畔群众集资办学热潮的号角。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纸坊庄里沿通济桥连接西川大道两旁，有了几家骡马店和酪馏铺，由于村小，有店铺的地方也长不过近百米，据赵老先生回忆，直到上世纪初，纸坊庄里还“确有一处手工造纸的作坊”。看来，以纸坊作村名，也确实名副其实。但就这短短 50 多米街面，比起邻近村子，要显得繁华多了，不知不觉间，人们去掉了“庄”字，改称为“纸坊”，有的老一辈人把这里叫“纸坊里”。解放后，随着城市的扩大，新的西关桥建成，纸坊更加繁华，它和北面的莫家路一起，成了解放初期西门外最热闹的两处地方，名称也改为纸坊街了。

小 桥附近有个土巷道，过去曾作为一个地理标识，也许许多人还记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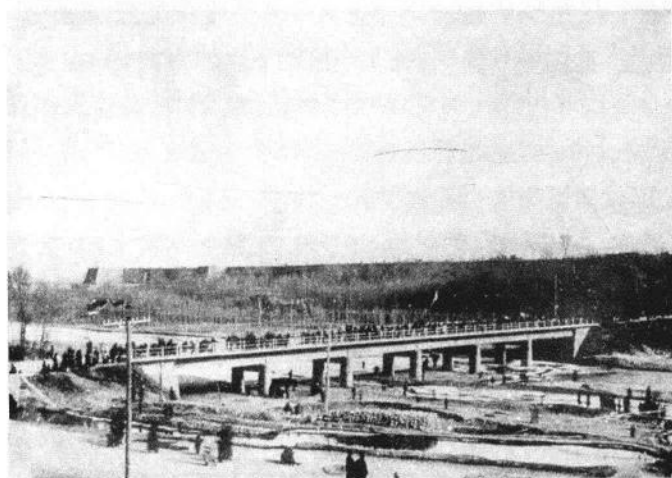
土 巷 道

处交通要道上的小桥是连接北川和西川的咽喉之地，从这里西行，首先就要经过土巷道。当年西川人上粮运草、拉煤进城，一般都要经过这里，所以人们一说起到了“土巷道”，那就知道离城也不远了。

土巷道全长约二里许，东连小桥，西接今盐庄东，北靠一溜黄土山，南侧是湟水边上的庄稼地。由于西高东低，所以从小桥西行，一路是不太陡的慢上坡。缘于土巷道北侧是土质松软的黄土山，常会因下雨水浸而造成滑坡，所以土巷道里长年黄土遮道。为了防止大路上西来东往的牛马羊驴糟蹋路南侧的农田，田主们沿路边筑成齐人高的土墙，绵延数里路。这里终日人来车往，路面松软的黄土经无休止的碾压，成为粉尘，随着车轮和脚印而滑动，扬起的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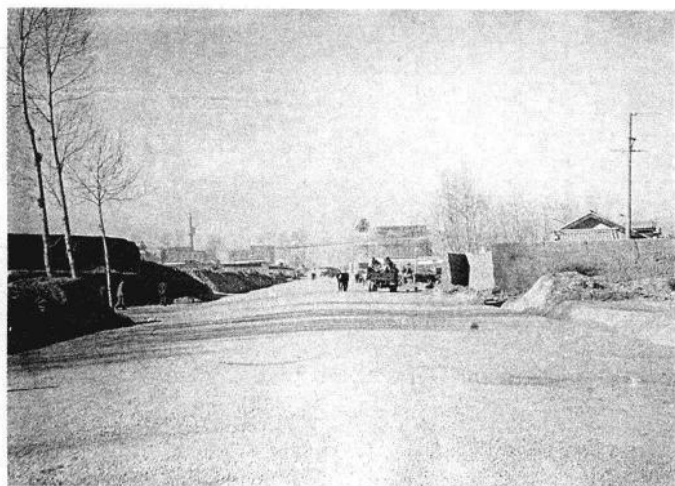


1954年元旦庆祝西关桥通车的会场(背景为取土后残破的旧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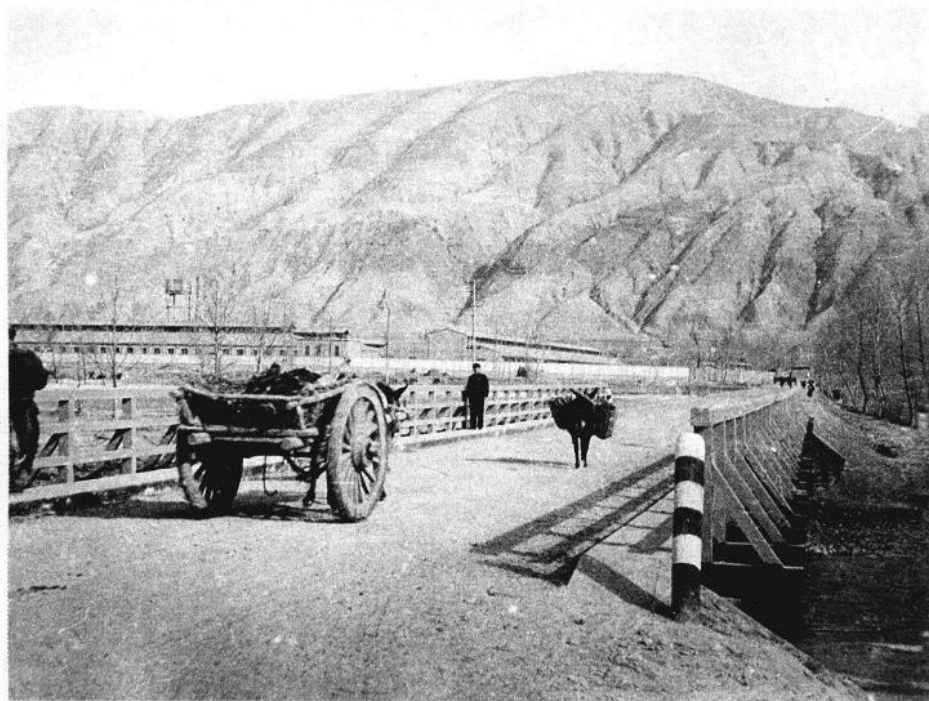
竣工后的西门外的西关桥,远处可见旧城墙

老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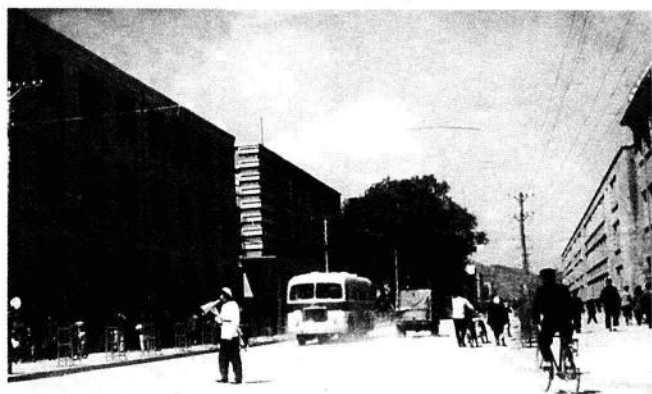
昆仑路(当时叫西山湾路)

北川河桥(今门源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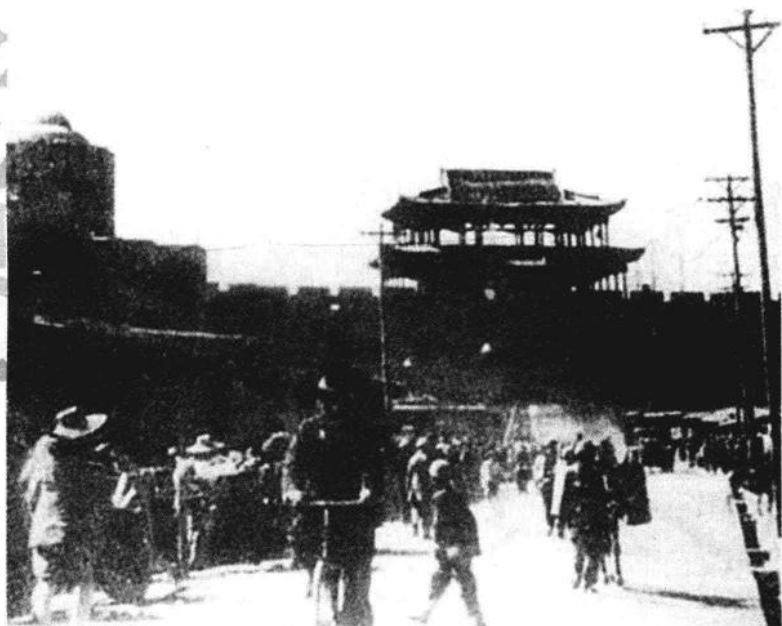




西宁城中大街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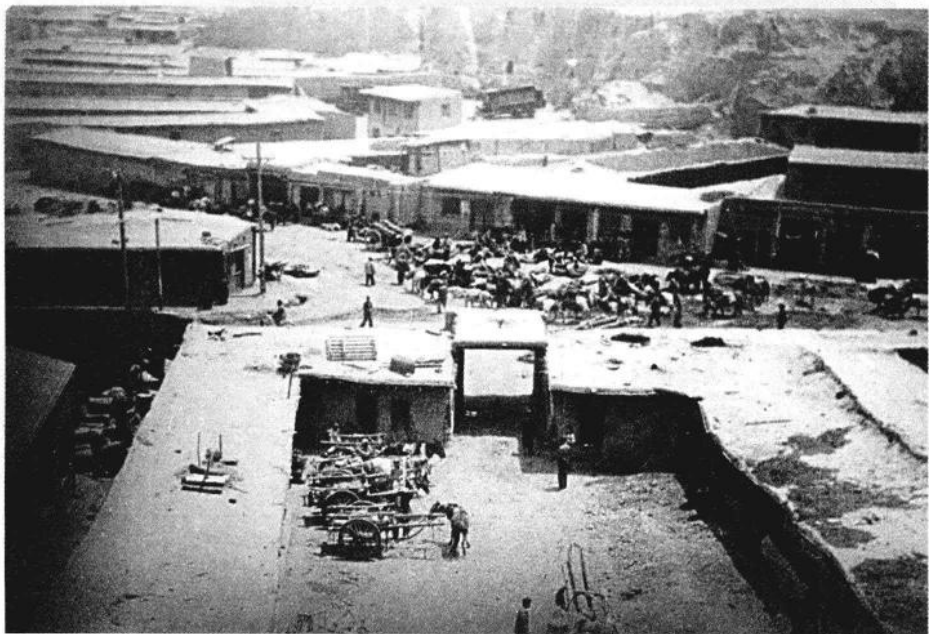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五四大街



东门外湟光地区(图中左侧圆顶建筑物为湟中大厦)

小桥马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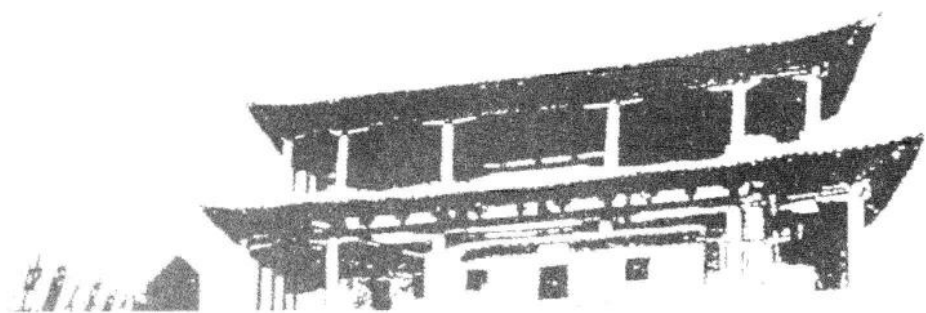


土笼罩了这一段路,就连路边的土墙和树木也长年灰蒙蒙地,落满了尘埃。因而这段大路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巷道”。下雨后这里泥泞一片,行进不易,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就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土巷道的西尽头,是一段不太长的下坡路,前面不远低洼处就是盐庄,村前是一片盐碱地,当年曾是一块水池,据《西宁府新志·地理·山川》记载,水池在“龙泉西 12 里,广袤百余丈,亦名杏园池,明末(因)泉歇”而干涸。

历史悠久的土巷道终于到了旧貌变新颜的时候。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随着兰青铁路的兴建,铁路路基通过了土巷道南侧、湟水河北岸;北侧连接小桥一线,一些木材加工厂、水泥制管厂等小厂相继在这里落户,路面也得到改造,但人们还是称这一段路为“土巷道”。与它毗邻的铁路南侧,沿河边也建起了预制厂、木材厂、煤场等,铁路边坑坑洼洼的土路竟成了后来的“海西路”。60 年代后期,为了解决城市用水问题,上级决定在土巷道南侧的湟水河上修建西宁市第二水厂,作为土巷道地界最大的一项市政工程,这里很是热闹了一阵。土巷道随之也有了正式的名份,成了“柴达木路”的一部分。

要说土巷道最大的变化,就数改革开放后世纪之交的海湖路兴建。继海湖桥建成后,平西高速公路柴达木路入口也在“土巷道”建成,不久,当代“愚公”竟挖开了土巷道北侧的黄土山,连通北川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名曰“海湖大道”,使谈虎色变的“土巷道”成为柴达木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自此,“指通豫南,达于汉阴,无陇断焉”。



寺院寻踪



北禅寺

曾

称土楼山寺、土楼神祠、永兴寺、北

山寺，现称土楼观。北禅寺位于西宁城北

土楼山峭崖间，始建于北魏。《水经注》中说“上有土楼，北依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楼下有神祠，雕墙故壁存焉”，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北禅寺多用洞窟建成，北魏壁画存于悬崖岩洞中。原有依山崖凿造、高达10米的两尊金刚佛雕像，因雨水冲刷，西侧雕像已毁，东侧还依稀可辨。历代对北禅寺曾多次进行过整修重建，明洪武年间，千户张铭曾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永乐十四年，高僧桑尔加朵奏请寺名，永乐帝敕赐“永兴寺”。清宣统元年（1909年），西宁香行魏僊等捐资进行大修；宣统二年，葆宁寺僧人徐仁溥拆祁家城禅院到北山，改为佛阁，并添修山门、斋舍。寺后山顶有宁寿塔；悬崖间的“九窟十八洞”以栈桥曲廊连接，是青海少有的寺院建筑。土楼山峻拔雄伟，北禅寺嵌筑于危岩，奇巧玲珑，被称为中国“第二悬空寺”。

南禅寺

曾

称南山寺、华藏寺，位于西宁城中凤凰

山麓，与北禅寺遥遥相对，故被称为南禅寺。

早期这里建有民间信仰的关帝庙，明永乐八年，建成佛教寺院；永乐十四

年，僧人舍刺藏卜奏请寺名，永乐帝敕赐“华藏寺”。当年寺院的山门在山根，是一座二层楼阁，下为进寺之门，上为戏台，保持了民间庙门的特点。佛教殿堂建筑群在半山腰，殿堂模式保持着汉传佛寺的风格。明万历年间，有道士到这里静修，在建筑群中又增加了道教宫阁，后经不断扩建，到清乾隆时，三教共处而风格不同的建筑群以关帝庙为中心依山势而就，既有佛教的护法殿、弥勒殿，又有道教的真武殿、飞升阁（佛教称为小西天），还有民间信仰的关帝庙、财神殿。历史上三种信仰的香火都很旺盛。该寺古建筑群保存比较完好，西宁解放初即列为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西宁市宗教部门批准，成为佛教寺院。为建西（西宁）塔（塔尔寺）高速公路，后来法幢寺也迁到这里。

位于西宁城中南门体育场附近，有

普济寺

些人又称为寄骨寺，其实这是两个紧

密相连的寺院名字。清乾隆四年（1739 年），西宁道僉事杨应琚等为暂厝外地人遗体，在南门外修建漏泽园一处，规模较小，寺址坐南向北，四周房屋共 30 余楹，编成字号，停寄遗骸，人们通称“寄骨寺”。百余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洋行经理沈得璞先后捐银 600 两，在寄骨寺之西侧，隔墙修建“普济寺”，一墙隔两寺，工程由杨进湘主持修建。普济寺凡二进，里院建有三楹较气派的南大殿，殿内供奉地藏王菩萨，后又塑观音像。上世纪 20 年代初，曾将南大街印心寺精致的十八罗汉塑像也迁至此寺。因寄骨寺修建在前，普济寺修建在后，人们往往统称“寄骨寺”。1953 年，随着南门体育场建设的需要，已有 200 多年历史的寄骨寺被拆除，普济寺得以幸存。

又名宁番寺，位于西宁市西大街北侧。

大佛寺

大佛寺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的

发祥之地，闻名整个藏区。唐宪宗时，吐蕃第四十二代赞普赤达玛乌冬赞（史称郎达玛）继位，掀起灭佛运动，佛像、佛塔、佛经多被捣毁、焚烧，



北山寺石窟一角和闪佛(右)



城隍庙牌坊



南山寺



普济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祭海后,拍摄于湟源东科寺



大佛寺(北側)

老照片





东科寺宗教活动

塔尔寺一角(图中高大殿堂为大金瓦殿)





僧人多被杀害，剩下的被流放或为奴，佛教在西藏陷入了灭绝境地。西藏名僧藏·饶赛、肴格迺、玛尔·释迦牟尼三人不甘泯灭佛法，伺机用骡子驮着经卷，潜逃出西藏，一路上风餐露宿，经新疆、河西走廊，辗转来到青海阿琼南宗，后又到普兰央宗躲灾修行。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有名的“三贤哲”。后肴格迺等在西宁、玛什藏等地圆寂后，人们在此建起土灵塔和一些祭祀设施，以作纪念。明洪武二十三年，土官李南哥以灵塔为基，重建寺院，因寺内有三尊高三丈九尺的佛像，俗称大佛寺。明洪武二十七年，奏请朝廷敕赐寺名，朱元璋赐名“宁番寺”。

弘觉寺

弘觉寺在今弘觉寺街路北，因清乾隆皇帝名爱新觉罗·弘历，为避讳，曾称为宏觉寺、

洪觉寺、红觉寺，位于西宁市南大街东侧，以寺命街，即今弘觉寺街。寺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凡三进，初名“妙华庵”，明永乐十年，敕赐额曰“弘觉寺”。明代前期，寺院颇受朝廷重视，寺僧札思巴索南嘉措曾受封为国师，多次进京朝贡，以建筑华丽闻名，史载可与有名的葆宁寺媲美。后衰落，成为拉卜楞寺的属寺，改为该寺僧人朝拜塔尔寺时寄宿之所。1929年青海建省后，班禅驻青办事处、蒙藏招待所曾一度设于此。解放后，寺院建筑被印刷厂占用，近年，由青海文都大寺活佛接管重建。

金塔寺

金塔寺位于西宁弘觉寺街路南，与弘觉寺隔街相望。寺院始建于17世纪的明万历年

间，为塔尔寺第一任法台若子日坚措大师的佛堂，后成为塔尔寺的属寺。寺院规模不大，占地约一亩多，近年被整修一新，主殿内供奉三世佛及其弟子佛像。

法幢寺

由心道法师的女弟子尘空创建。心道法师

俗姓李，湖北省松滋县人。17岁时受具足戒于江陵章华寺净月方丈，1934年来青海塔尔寺学习密宗，并筹建俗人佛教团体——居士林。1936年离青赴陕，后任西安大兴善寺方丈。在青期间，湟源南乡波航村一祁姓姑娘曾在海峰书院旧址听过心道法师宣讲《金刚经》，遂发愿遁入空门，成为心道法师的女弟子，道号尘空，名广闻。1943年，心道法师抱着创建法幢寺的宿愿再次来青，为了了却心道的心愿，尘空多方奔走，历尽艰辛，法幢寺于1948年在西宁园树村破土动工，次年建成。后因西（西宁）塔（塔尔寺）高速公路的建设，现已迁入南山寺。

位于西宁东关大街路南一侧，是
西宁著名的建筑，我国西北地区四大

东关清真大寺

清真寺之一，与西北地区著名的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寺、新疆喀什艾提卡尔清真寺并称为西北四大清真寺。据现存寺内的《重建西宁大寺碑记》和《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两块碑文记载，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辅佐他开国有功的回族将领沐英为西平侯，以镇守今甘青地区。沐英奏请朝廷允准，在回族聚居的东关地区动工修建了清真寺。该寺建造雄奇，古朴雅致，庄严肃穆，具有我国古典建筑和民族风格的建筑特点，处处都显示着浓郁的伊斯兰特色。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破坏，又不断修建，现存的建筑是1913年重建，1946年改建并扩建，1979年又重修的。

曾称梵宗寺，藏语衮本贤巴林，意即

塔 尔 寺

“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元至正十七

年（1357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就诞生在塔尔寺所在地莲花山中。后噶玛噶举派第四世活佛若比多杰受元顺帝召请，途经平安夏宗寺时，宗喀巴的父亲鲁本格曾带时年3岁的宗喀巴到夏宗寺拜见若比多杰，并受近事戒。明洪武五年（1372年），宗喀巴时年16岁，奉师命前往西藏深造，史载他长期修学，“忏悔叩拜，指端俱裂，磨拭盘坛，腕部全损”，经艰苦努力，博通显密，声名渐著，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他对佛教戒律进行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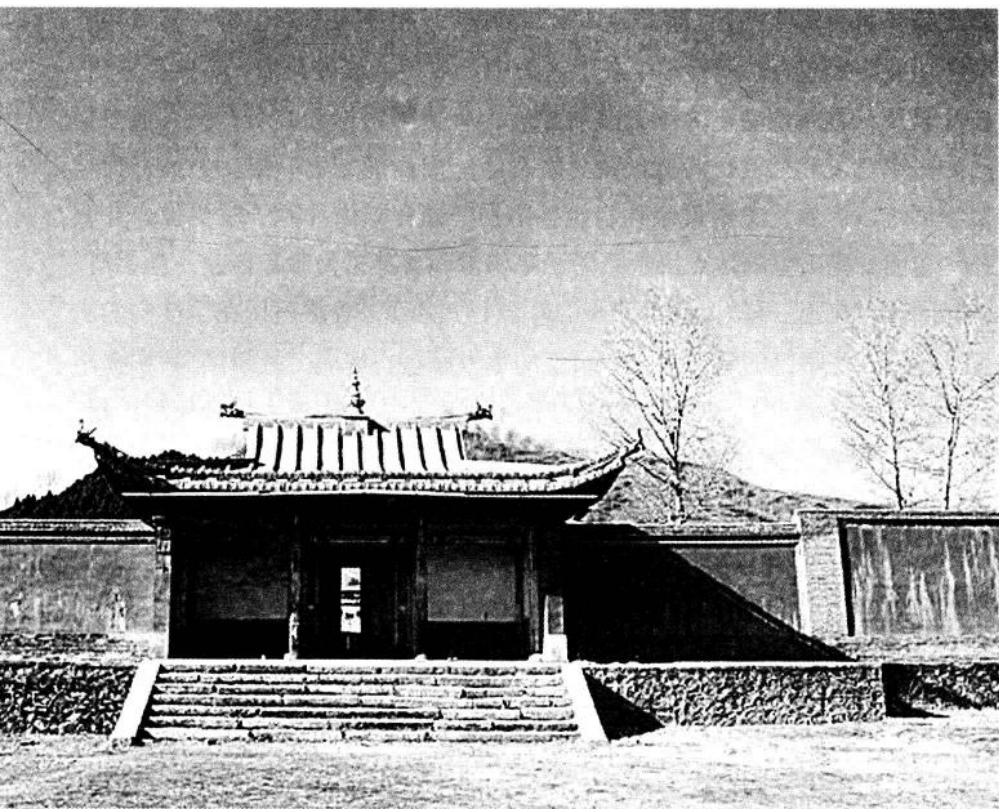
互助佑宁寺



大通会宁寺



大通广惠寺



互助却藏寺

1913年重建的东关清真大寺寺门





创立格鲁派（即善规），被誉为“第二佛陀”。相传大师降生时，其母亲香萨阿切剪脐带时有血滴落地上并渗入土中，数年后这里长出一棵白菩提树，枝叶繁茂，香气四溢。大师去藏6年后，香萨阿切思儿心切，托人捎去自己的一束白发和信件，盼望大师见发思亲，回乡能见上一面。但大师为学佛学而难以返乡，遂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一幅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并嘱托“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和我见面一样”。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香萨阿切在信徒们的支持下，依照宗喀巴的嘱托，在他出生的地方建塔，取名“莲聚塔”。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仁钦宗哲坚赞在塔侧建起一座小寺，后经陆续扩建，遂成今日规模。因先有塔，后有寺，遂称塔尔寺。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曾赐名“梵宗寺”，并赐“梵教法幢”匾额。

西纳下寺

又称下演教寺，位于西宁西川黑嘴尔村，现已毁。早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出身于西

纳部落的西纳格西和家族成员去上都投靠成吉思汗，因之受到器重。此后，出身于该家族的第一代西纳喇嘛喜绕益西是曾为护送八思巴回藏受戒的侍从，被元朝授职为宣政院院士，赐给其家族成员西纳贝本三道虎头牌，封为宗喀万户。明洪武十三年敕封西纳部落寺院（今湟中县拦隆口乡上寺）为“演教寺”，又先后封国师、禅师，赐土地、百姓、象牙图章和银印。宣德二年（1427年），西纳喇嘛却帕坚赞被封为“通慧静觉国师”，却帕坚赞于是大兴土木，又在黑嘴尔建成部落寺院，为示区别，称为“西纳下寺”，即下演教寺。西纳下寺规模宏大，围有城堡，四角有角楼，当地人称“官家城堡”。天主教传入西宁后，清末在黑嘴尔建起天主教堂，逐渐形成洋教兴、藏传佛教衰的局面。后因缺少供养，西纳下寺名存实亡，上世纪30年代竟成为马氏家族的军需供应站，解放前夕被当局炸毁。

原名“郭莽寺”，位于大通县东峡衙门庄，

广惠寺

清顺治七年（1650年），由西藏哲蚌寺喇嘛端

智嘉措创建，与塔尔寺、佑宁寺、夏琼寺、隆务寺一起，被誉为青海五大格鲁派寺院。端智嘉措法号称隆巴端智布，因寺院属于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系统，所以当时名为郭莽寺（郭莽，藏语“多门”的意思）。广惠寺建寺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由敏珠尔呼图克图驻寺。建寺初，只有显宗经院，康熙初又设密宗院，遂成了显、密双备的寺院，在甘肃、内蒙等地颇有影响。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觐见皇帝，返藏时曾亲临此寺，并为僧众讲经说法，从而极大地扩大了该寺的影响。清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寺僧在上层喇嘛唆使下，援助叛兵，遂“使修行之区，转为藏奸之藪”。是年年底，清大将军年羹尧大破郭莽寺，杀郭莽寺法台却藏活佛等大小僧众700余人，圣塔、经堂、佛殿俱被焚毁。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认为郭莽寺是“边塞古刹，为西藏赴京喇嘛休憩之所，即佛家所谓十方院也”，于是拨银10万两，令其修复，并亲题寺名为“广惠寺”。

又名土官寺，位于大通县景阳乡土关（官）

会宁寺

村。明朝永乐年间，西宁卫指挥使李英追随朱

棣远征朔漠，因功封为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宣德年间，会宁伯李英倡议建寺院（家庙），建成后，即以他的爵位作为寺院名。因李英的土司家族是明清两朝世袭的土官，所以又称会宁寺为土官寺。会宁寺结构严谨，艺术高超，是一座典型的明代汉式宫殿建筑，寺内壁画、雕塑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现寺院大佛殿门顶“会宁寺”三字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题。

位于湟源县日月乡寺滩村，有些材料上写作

东科寺



“洞阔寺”。明万历四年（1576年），雄踞青海湖地区的俺答汗在青海湖南岸的察布齐雅勒建成仰华寺。为了实现与西藏格鲁派宗教势力的结合，他特地派人邀请西藏拉萨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前来仰华寺参加大法会。万历六年五月，索南嘉措终于在蒙藏僧众的隆重欢迎仪式中来到美丽的青海湖畔，在这具有深远意义的仰华寺会晤中，俺答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的称号从此产生。拉萨哲蚌寺前两任法台分别被迫认为一、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即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会后，三世达赖喇嘛特派随行的东科尔呼图克图云丹嘉措（二世东科尔活佛）作为自己的代表，跟随俺答汗前往蒙古讲经说法。从此，东科尔活佛作为西藏高僧、达赖喇嘛的代表，在青海湖周边，包括今湟源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宗教影响。清顺治三年（1646年），东科尔四世嘉木样嘉措在西藏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处受此比丘戒，取法号为多居嘉措，并受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指派，来青海选址修建寺院。清顺治五年（1648年），多居嘉措就选址在西石峡西口的八宝山下建寺，因是四世东科尔活佛多居嘉措所建，遂称东科寺，藏语名东科尔甘丹却科林（具善法轮洲）。雍正元年七月，罗卜藏丹津在青海湖东南的察罕托罗亥（今倒淌河东北的白头山）与青海诸台吉会盟，起兵反清，河湟谷地许多寺院纷纷响应，青海各部落及寺院喇嘛以东科寺为据点，猛攻西宁门户镇海堡，清军横扫从叛诸寺院，东科寺被焚毁。雍正十年，西北局势基本安定，清廷下旨重建一些被焚寺院，但严禁东科寺在原地重建。雍正十一年，东科寺奉旨选址重建于日月山下、隔板山之阳，寺名未改。

扎藏寺

前身是位于该寺西南哈毛尔达哇山上的塔雁静房。明万历年间，应西海蒙古俺答汗之请，

西藏拉萨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原属萨迦派的塔雁静房改宗格鲁派。崇祯十年（1637年），嘉木样嘉措修建了扎藏克·噶旦祥排楞，简称扎藏寺，作为蒙古固始汗的佛堂，寺中供奉有固始汗用过的刀、衣帽和洛藏大德的手铃、四川理塘版的《丹珠儿》等。扎藏寺作为青海蒙古族格鲁派的主寺，清代一直是西宁办事大臣和青海蒙藏王公商议

祭海、会盟、处理蒙藏事宜的地方，设有青海蒙古右翼各旗王公贝勒的衙署，藏有乾隆皇帝御赐的“佛光普照”匾额一方。

又名郭隆寺，位于互助县五十乡北，即青海

佑宁寺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东 35 公里处。藏语称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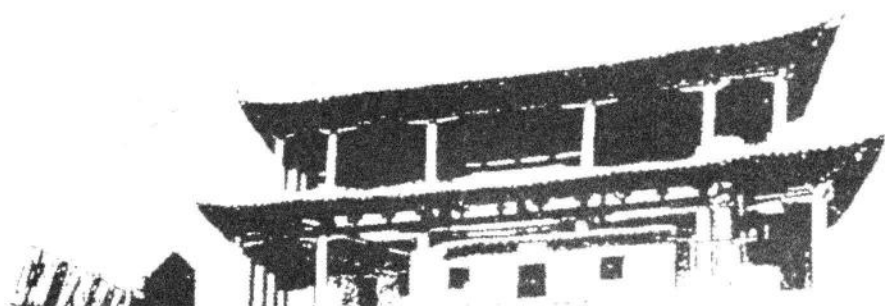
隆弥勒洲，因处郭隆地区，通称郭隆寺。明万历十二年（1584 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至青海讲经传教、授记建寺；万历三十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自内蒙入藏坐床，途经此地，当地十三部落以达赖三世授记为由，联合要求建寺，然未获允准。至年底，又派代表入藏请求，仍未有结果。直至万历三十二年破土动工，完成嘉色寝宫、经堂及部分僧舍，并建显宗学院，初具寺院规模。其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 年），已拥有大小经堂、僧舍等 2000 余座院落，僧侣 7000 余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学院。属寺众多，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雍正二年（1724 年），在罗卜藏丹津之乱中，遭清军烧毁。雍正十年，清世宗雍正敕令重修，赐额“佑宁寺”。此后，屡有兴毁。“文革”期间，仅存李家昂院落一处，1980 年 7 月重新开放，一些殿堂僧舍陆续得到重建。

又名广济寺，位于互助县南门峡乡境内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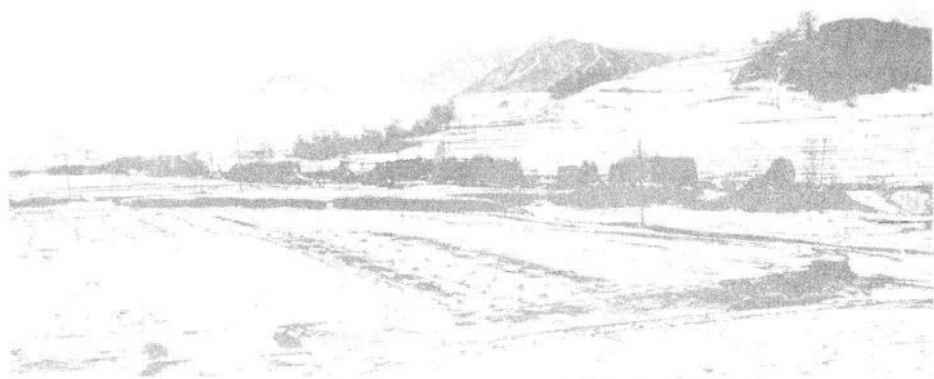
却藏寺

隆扎喜塘（现称却藏滩），藏语称却藏具喜不变

洲。却藏寺因是九世却藏·南杰班觉于清顺治四年（1647 年）创建，南杰班觉活佛是西藏却藏堆垅人，为示纪念，故定名“却藏寺”。却藏寺环境肃穆幽静，寺院由众多殿宇、经堂、佛塔、僧舍组成，尤其以千佛殿、九龙壁最为著名。雍正二年（1724 年）罗卜藏丹津之乱中遭清军烧毁，当时的却藏活佛也受牵连被杀；雍正十三年，章嘉国师呈请清廷，要求重建却藏寺，雍正帝下旨重建。道光十年（1830 年），却藏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完工后，道光皇帝亲赐寺名为“广济寺”，并特许建一座“九龙壁”，这在佛教寺院中所罕见。



村庄堡寨



龙泉谷·深沟儿 唐

穆宗李恒长庆元年（821年），

大理寺卿刘元鼎为唐蕃会盟，奉旨

出使吐蕃，回长安后，曾写有《使吐蕃经见纪略》一文。文中说“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据《西宁府新志·地理·山川》记载“县（指西宁县）西八里有龙泉，疑即西川称龙泉谷也。唐刘元鼎使吐蕃，逾湟水至龙泉谷，谓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并说“（当年）刘元鼎使吐蕃出蒙谷，抵龙泉，则蒙谷在龙泉东也”。据专家考证，龙泉谷东的“蒙谷”指西门外由沈家寨沟（长岭沟）水冲刷所形成的沟。沟经湟川中学大门前、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东侧北行，通向南川河。杨应琚先生所指“县西八里”的西川龙泉谷即今海湖新区的深沟儿，杀胡川即指今西川。当年哥舒翰率军在赤岭一带与吐蕃抗衡时，今西宁地域就设有“河源军”。深沟儿南接鸳鸯沟，向北撕裂西川平整的原野，拐向东北，在苏家河湾附近通入湟水。鸳鸯沟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起于今湟中县城通宁路附近的湟中职业学校，止于今海湖新区的彭家寨，全长约20余公里。全沟属浅山地区，干旱缺水，因而沟中有当年以吃窖水闻名的火烧沟、狼沟等苦地方。平时沟中未有涓水，但夏秋季节偶遇天降暴雨，由于山高沟深，地域较大，常会突发山洪。千百年来，突发的山洪咆哮着一路裹挟泥沙，冲出沟口，因而在彭家寨村东形成一条宽大沟壕，人称“深沟儿”。当年，平坦



的西川南路经杨家寨,过刘家寨村南,就到了深沟儿边上,一路下坡,通向沟底,沟中搭有一处便桥,过桥再上数十米的土坡,才到路平处,即见彭家寨村。从沟中望去,只见两侧土崖壁立,颓然欲倾,斗折蛇行,令人心寒。深沟儿蜿蜒东北行,在苏家河湾地界,因沟西侧有有名的龙泉,所以文人们称其为“龙泉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龙泉又称都龙湫泉、药水泉、药王泉,泉水下泄,汇集成池,称为“龙池”。“龙池夜月”被列为古湟中八景之一,古人曾写了不少诗词赞美它:“龙池环注五龙宫,一水清澄月正中”“池中若有蛟龙在,云雨一经便上腾”“见说河湾药水祠,同声异口夸龙池。池水晶莹能治病,胜良医”。既然刘元鼎时已称这里是龙泉谷,可见深沟儿早已有名了。

千百年来,龙泉谷横亘在西川原野上,既给行人旅客平添了一些麻烦,也阅尽了人世沧桑,但到了改革开放的近几十年,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高大宽敞的箱涵在沟底建起,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千万方黄土填平了大地的裂口,深沟儿摇身一变,成了昆仑大道的一部分,行走在笔直宽敞的路面上,你再也想不到脚下的地段,曾是有名的“龙泉谷”!深沟儿南侧的荒山秃岭作为西宁大南山绿化工程的一部分,“火烧沟”已经披上了绿装;它的北侧,原来的荒草野沟,作为海湖新区重要的绿化景观带,引来了解放渠水,随沟哗哗流淌,其间曲径小桥,叠水成瀑;巨桥横跨,彩灯耀珠;芦苇遮堤,浮萍流连;芳草碧树,掩映两岸,难怪治理工程尚未竣工,已让到过这里的人一呼三叹。

龙泉现已改建成为景观带中的“药王泉遗址”,“深沟儿”早已被人们遗忘,站在横跨景观带的海晏西路大桥上,远望碧水环绕的原苏家河湾村庙,檐角高翘,斗拱焕然;邻近高楼林立,气势非凡。这一高一低,一旧一新,既有宁静,也有繁华;既有壮观,也有幽雅。正合着时代的节拍,记录着龙泉谷这块土地前行的步伐。

铁佛寺·寺台子 西

宁北山寺脚下有个不大的村庄,名叫寺台子,距村子不远的北山里还有两个山沟,分别叫作大寺沟和小寺沟,这些地名是否和现在的北山寺有关?

据史料和一些文史专家考证,答案是否定的。原来这些地名的来历,和早已消亡的“铁佛寺”是联系在一起的。

铁佛寺是西宁一座很古老的寺院,属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历史最久远的教派,因该派僧人头戴红帽,所以又称为“红教”。“宁玛”是“古旧”的意思,由原克什米尔的密宗大师莲花生大师所传,比其它藏传佛教教派要早 300 年。它的主要教义是“九乘”和“大圆满法”,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是该教派的主要寺院。明代诗人夏瓚就写有一首有关铁佛寺的诗:“西来铁佛倚嵯峨,铸得钟来圣绩多;地上轮菌含混沌,土中窅霭孰婆娑;海潮无响闻仙梵,月影飞光下素娥;安得六丁起潜伏,五更鲸吼震山河。”从诗中看,铁佛寺背倚嵯峨的北山而建,寺中有一口铁铸的钟,敲击起来,声震山河。既然“地上轮菌含混沌,土中窅霭孰婆娑”,可以推测,夏瓚造访铁佛寺时,这个寺院已建成有时了。到底建于何时?至今仍然是个谜。

据我省知名学者谢佐和格桑本等所著《青海的寺院》中记载,铁佛寺建在北山“山麓平广处”。明嘉靖十六年(1537 年),西海蒙古进攻西宁时,当时的西宁卫守备崔骐曾率领明军与蒙古军激战于铁佛寺(《青海历史纪年》)。崔骐,肃州人,当时任西宁分防守备,因功于万历年间升任分守参将。当年西海蒙古进犯西宁时,多取南川和北川道,既然两军激战于与西宁卫城仅有一河(湟水)之隔的铁佛寺,可见当时军事形势已极度危急。

清王朝建国后的顺治十四年(1657 年)仲冬,分守西宁道陕西布政使右参议苏铕写成《西宁志》,其中也说:铁佛寺“有口钟,高不可知,圆径半入地下,不能掘取”。但几十年后的乾隆年间杨应琚撰《西宁府新志》时,说“铁佛寺在城(西宁城)北五里余,昔传有钟,高大不可知,半入地下,半在地上,不能掘取”。建寺历史悠久的铁佛寺到清雍正初年,终于没有逃过灭顶的劫难,由于该寺参与了环海蒙古族亲王罗卜藏丹津的反清活动,“当年梵宇助枭雄,豕火狼烟遍海东”,初登帝位的雍正帝闻讯十分震怒:“寺院本是修行之区,转为藏奸之所。……佛教复兴,如此隆恩,喇嘛并不感激,反助忤逆之人,凶恶已极。”下旨痛剿,于是僧众尽被陕甘总督、大将军年羹尧诛杀,华丽的寺院也和东科寺、郭隆寺、郭莽寺、却藏寺等十多个寺院一样,被一火化为灰烬,“高不可知”的巨钟从此也下落不明,真是古寺已随烈焰去,此地空留寺台名。尽管铁佛寺

小西门外，远处树荫下可见南川河上的莫家路木桥



西门外通济桥



1953年修建中的西门外西关





西宁大街一角



西宁大街一角



消亡已经快 300 年了,但因它而得名的大寺沟、小寺沟至今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地名。

铁佛寺焚毁后,北山土楼神祠还在。而废弃的铁佛寺寺址上逐渐有人筑墙垒屋,种庄稼生活,因这里曾是寺院旧址,人们渐渐以“寺台子”称呼其村。这里北禅山如屏,柳影掩映;朝阳渠如带,绕村东去。在熙熙攘攘的北山市场的喧哗声里,铁佛寺过去“鲸吼震山河”的壮丽一幕,早已像退了色的底片,飘向了远远的被遗忘的角落。

柴小庄·王家庄 当

年从平安进入西宁,因南岸山高而陡,人们多走小峡河北岸路,这在周子扬的《玉树调查记》和基生兰的诗中可以看出。其实早在 400 多年前的明代,从东方来宁的大道也是沿湟水北岸穿小峡,过韵家口再进入城区的。王家庄作为西宁城东稍门外、湟水北岸枢纽之地,进出关厢水城门的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的西宁卫中军守备柴国柱就曾率兵驻扎在这里,并在这儿筑起了寨堡和瞭望台。为加强和城区的联系,来往通行方便,他亲自策划并在堡前湟水上铺设了一座木桥。史载柴国柱“壮勇足智,善骑射,勇冠三军”,为一代名将,时人就将所筑的寨堡称为柴家寨堡,寨前的木桥称为“柴家桥”。柴家桥是当时湟水上为数不多的几座桥之一,它为沟通西宁湟水南北两岸的交通,方便百姓生活起到过重要作用。柴家寨堡和柴家桥的维修和养护由今互助沙塘川一带的老百姓承担,故当时就有“柴家桥的伏儿,沙塘川的张工头”之俗语,当时就有一些养护伏儿住在寨堡里。柴国柱曾在这里建起花园,由于环境优美,人称“柴园”,清乾隆时西宁道金事杨应琚曾到柴园游玩,并写有《夏日游湟水北岸柴园》一诗,说这里“下马渡危桥(指柴家桥),北岸多林泉。密萝下开径,疏松上窥天”,可见当时的柴小庄一带风景是非常秀丽的。

柴家寨堡和柴家桥建成后,由于这里灌溉便利,交通方便,而且有兵卒驻守,具有一定安全感,故有人携家眷来此依堡居住,遂成村落,时称“柴小庄”。估计柴小庄老的坐地户有两种来源:一为柴国柱驻守这里时的随军家属的后代;二为柴家寨堡建成后依堡而住的农民,其中沙塘川农民因承担寨堡和柴

家桥的维修和养护等任务,迁来的居多。

后来,柴国柱调任其他地方,他将寨堡留给了跟随他多年的杨通事(翻译),久而久之,人称其寨堡为“杨家大院”,瞭望台为杨家大墩,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村上还有80米×80米的堡寨遗迹,堡墙高5米,厚4米。但因村民太少,直到清乾隆年间,官府在民堡管理时,把它和东侧的中庄合称为“中柴庄”。其后300年间,柴小庄时荣时衰,尤其经过同治、光绪年间两次大的河湟事变,湟水北岸的几个村庄首当其冲,历尽劫难,到上世纪中叶,柴小庄仅存10户人家。除堡内一户杨姓和一户申姓外,其余八户皆姓王。故当时就有人提出村庄应改名为“王家庄”。1952年“土改”后政府派人员查田定产,柴小庄正式改名为王家庄,从此,柴小庄就成了一个历史地名,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林家崖是西宁北山脚下、湟水河

林家崖

北岸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现在,它

因南通五一桥,西连寺台子和北山市场,东接路家庄和火车站,已成了寸土寸金之地,整日“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但据史料记载,最初来这儿拓荒的有两家农户,西边的一户姓林,东边的一户姓邱,他们的家园分别被称为林家庄廓和邱家庄廓,因林家庄廓地处大寺沟口东侧,那里经千百年沟水冲刷,庄廓西侧地段早已形成悬崖;南侧紧靠湟水河,河沿陡峭,叫“河滩崖”;北靠险峻的北山崖,三面靠崖,所以林家庄廓渐渐被人们称为“林家崖”。后子孙繁衍,邱家庄廓虽然一度也曾被称为“邱家庄”,但因相距不远,被林家崖“吞并了”。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西宁府新志》记载,当时的林家崖因村小人少,官府只好把它与东侧的路家庄合并管理,在《寨堡》一节中统称为“林路庄”,是下朝阳图的附属小村。

经数百年的家族迁徙,到清代中期的嘉庆、道光年间,林家崖已成为一个回族聚居的村庄,但经同治、光绪年间的两次社会动乱,兵燹之后,安静、闲适的林家崖竟成为一片废墟,只留下了尕寺儿圈圈、马家破大院、文家破庄廓等断垣残壁和有100多座坟墓的坟院。

据陈鸿德老先生当年调查记录,经那次战乱后,林家崖荒芜近20年,直到民国初年,曾任清诰授武德骑尉、西宁府城守营把总(下级武职名,正七品)



的田泉与其弟田顺来此建宅立户，荒村建新宅，枯树发嫩枝，废垒满目的林家崖又飘起了新的一缕炊烟，这也就是后来林家崖田姓大、小两个房头之宗。自从田氏兄弟入住林家崖之后，短短 20 年间，一些与田家沾亲带故的农户陆续迁来，其中有祁家城、寺台子的李家和张家，还有因躲债、打崖赖而来自湟中小南川、李家山和互助红崖子沟的几家农户，到 1936 年时，林家崖已成为有 9 户人家的村庄，但新来者多数没有可耕的土地，只得以租种别人的田地为生，成为佃户，被人们俗称为“庄头”。

林家崖东侧数里处的湟水上，是建于清代的广济桥。这座桥是大寺沟以东、湟水北岸的几个村庄进城的主要通道，后由于被水冲毁，给村民进城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这些村庄的生产发展。1939 年夏，时任骑一师师长的马彪曾倡议修建广济桥，经几番努力，一座长 168 米、桩架式的桥梁终于于 1941 年年底在原址建成，尽管这座桥只存在了不到 7 年时间，但对包括林家崖在内的湟水北岸村庄的生产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北关马得安等商家陆续迁至林家崖，沿公路两旁逐渐形成了以炸油饼、卖麻花等为业的摆摊小店，据统计，到 1949 年建国前夕，与东关隔河相望的林家崖总住户已达 94 户，其中 37 户以耕田种地为业，57 户以开铺摆摊为生，已形成了一条较为热闹的街市。随着后来五一桥的建成，林家崖占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很快成了城东区一处繁华的街衢，你要是再来这儿打问当年的孕寺儿圈圈、马家破大院、文家破庄廓和坟院，也许再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褚家营

褚家营西通王家庄，东连中庄，当年铁

路通到西宁后，西宁铁路分局车辆段就设在这儿。斗转星移，褚家营现已融入繁华的互助路，成为街衢的一部分，但要说起村庄的形成，还得从清王朝的嘉庆年间说起，迄今已 200 年了。

200 年前，“偶出东郭门，茫茫尽良田”（杨应琚），褚家营地段还是一片肥沃的田地，多属东边中庄的地产，当时的中庄主要由严、边、褚、段、卢五大姓组成。清嘉庆年间，中庄褚氏家族中出了一个有名的褚裕仁，正是由于他的发迹，促使了褚家营庄堡的形成。

褚裕仁，字伯敦，他虽出身农家，但自幼刻苦自励，勤奋读书，“总角”（古时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一般指十三四岁的少年）时就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史载，当时的西宁府学使（即学政，掌管一地文教的官员）康公深爱其才，曾“聘阅试卷”，后褚裕仁就随康公至京。几年后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褚裕仁参加科举考试，得以高中庚辰科进士，一时誉满乡里。从此“释褐”（脱去平民衣服，踏入仕途），被任命为陕西眉县知县。眉县地处关中平原，北宋有名的哲学家张横渠先生就出生在这里。张横渠（1020～1077年），名载，字子厚，青年时学过兵法，曾组织民间武装，收复甘肃洮西失地。但平生除在祁州、明州任职外，就一直在家从事著述。因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其著作编入《张子全书》中。张载死后，他的学生把他埋葬在眉县城东南约30公里的大振村糊岭下，当地为纪念他，还在横渠镇修建了一座张子祠，元、明间曾重修过多次，清代著名的横渠书院也设在这里。褚裕仁到任后，即前往拜谒横渠祠，因“见其倾圯，即捐资修葺，撰文勒石”，在任期间，褚经常阐述横渠先生“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理，以教育后学。褚裕仁维修“张子祠”一事，深受人们的赞誉，被载入史料中，传为佳话。不久，褚裕仁又被任命为直隶三角淀通判，离任后，返乡讲“行知并重”之学，在西宁府士子中享有崇高威望。

褚裕仁衣锦还乡后，即和弟弟褚裕义在中庄西侧、褚氏祖业的农田里修建宅院，后子孙繁衍，遂成村落，于是就有了“褚家营”的地名。本来清乾隆时，它西侧的柴小庄（今王家庄）和东侧的中庄被通称为“中柴庄”，就因为褚裕仁的关系，两庄之间又有了一个新的村落“褚家营”。

褚裕仁百年后，被后人葬于村后的茆山儿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墓地建有龙凤牌坊，气派高雅，其墓碑上称颂他为“褚青天”。据说，他的后裔褚连元家曾藏有褚裕仁家传的古砚和用过的印合。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六日，瓢泼大雨突降褚家营，只见电光射地，一声惊雷，褚家门前巨柳轰然倒地，《西宁府续志·祥异》中曾记载其事。也许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训，到上世纪30年代初，褚氏家业已经衰落，后人将祖业卖给了当时盛极一时的马氏家族，一些马氏家族的达官显贵在这儿纷纷选地构建豪宅，一时间这里冠盖云集，褚家营的许多住户反而成了他们的庄头（即佃户），一些褚氏后人因受不了他们的盘剥，像褚元、角角老三、茆孝子、举得子、茆五子等八九户纷纷逃往其他



村庄度日，只留下了一个“褚家营”的村名，让人们记起那段早已远去的历史。

今天，当你走在繁华的互助路上时，两侧高楼林立，店铺比邻，在街上车水马龙、人们摩肩接踵中，不经意间，可能已经走过了褚家营。“褚家营”早已变成了一个渐渐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地名，也许只有个别人还能记起。

小寨·王同堡

在 过去时局不靖的年月里，“寨”是民

间以家族为主的村民自卫结构，因此，西宁周边就有许多“某某寨”的村名。寨的建立和发展，对河湟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西宁周边以“寨”为名的村庄多有同名，如西川、北川和沙塘川都有叫“陶家寨”的村庄，西川、北川和东川都有叫“小寨”的村庄，尤其西川湟水两岸竟各有一个“小寨”，人们为了区别它们，只得将“河南小寨”和“河北小寨”来区分它们。而东川的小寨本来叫“王同堡”，后来改称为小寨了。王同堡地处湟水北岸，东邻韵家口，西靠中庄，现在几乎已成了互助路街衢的一部分。“堡”为过去官府派兵驻防之地，那么，王同堡曾经有官军驻防吗？这还得从元末群雄逐鹿中原说起。

在元末豪杰并起、逐鹿中原的岁月里，江西宜兴人王猷参加了朱元璋的红巾军，后在宜兴、庐州、鄱阳湖战役中屡立战功，因而深受上司赏识；据其后裔王世哲先生说，在攻打开封的战斗中，王猷不避锋镝，第一个奋勇登上城墙，曾受到元帅徐达的嘉奖，后因功授昭信校尉。明王朝建立后，在西部边陲实行军屯制度，王猷和他率领的军户作为河州卫中左所的正规军屯，驻扎河州。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王猷奉命赴甘肃文县征剿叛乱，不幸在战斗中阵亡。王猷长子王华袭父职，奉命调往归德（今贵德）军屯实边，后屯以姓为名，今贵德县王屯即其后裔屯田实边之地。王猷次子王斌奉命前往西宁南川驻防，当年驻防地即今湟中县总寨镇王斌堡。王猷三子王同奉命前往西宁东川驻防，当年驻防地后称“王同堡”。

以王同家族为核心的军户驻防西宁东川后，即在驻防地建起庞大的寨院，寨内有南北走向的总巷道，巷道两侧规划整齐，院落紧凑，巷口东侧设有瞭望台，俗称“寨门墩”，是寨内庄户站岗放哨的地方。寨院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座瞭望楼，与寨门瞭望台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其东楼所在之处，即在今天被

称为“红墩”的地方。王同家族显赫的时光,随着岁月的洗涤,渐渐成为过去,随着其他家族陆续迁入堡内,到上世纪 50 年代时,只留下了寨门口当年用羊脑石砌成的门槛槽和寨门墩、红墩、羊巷、城壕等地名,让人回想起“王同堡”曾经的辉煌。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又有了白家场院、锁家院和戴家湾、戴家后庄等地名。众多的杂姓入住王同堡,促使了堡名的逐渐淡化,而横贯全村的总巷、寨门等却是永远难以淡忘的共同记忆,于是,“小寨”这个地名渐渐被通用,终于代替了已被人们叫了数百年的“王同堡”。

常言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据王世哲老先生讲,到他的高祖父这一辈时,已经“家道沦落,极度贫困”,靠高祖父替人打零工、高祖母给有钱人家当厨娘挣钱度日。最后竟到了高祖母“每天回家时有意不洗手,回到家先把手上粘的许多面团洗下来,然后放点野菜熬成拌汤喝”的地步。听起来实在有点心酸。但后来却又时来运转,突然发迹,到王钺(字佐臣)的头上时,已迁居到城内宏觉寺街中段居住。王佐臣是拔贡出身,曾做过一任山西通判,家大业大,曾被人们称为“王半街”。昭信校尉王猷的三个儿子分别在贵德、湟中、西宁留下了“王屯”“王斌堡”“王同堡”三个地名,这不能不说是青海地名史上的一件趣闻。

韵家口虽是西宁湟水北岸一个普

韵家口

通村庄,但居交通要隘之地,曾被称

为“古湟土著民族的军事要冲”,至今那儿还遗留有一些古城堡遗迹和烽燧墩台,并有古城滩、山城墩等地名。韵家口原称“韵家庄”,这在史料中有记载“王同堡,城北十里,附东五里韵家庄,十里傅家寨”(《西宁府新志·建置·堡寨》),因它地处沙塘川河西岸,又是沙塘川川口,西宁赴互助大道正好从村中经过,现在叫“韵家口”,确也名副其实。

韵家口东接小峡,西通西宁,北靠沙塘川,前临湟水,沙塘川河蜿蜒在村东,两川交汇,二水绕村,确实是一块形胜之地。在过去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当年赴沙塘川大道在川的东侧,但韵家口作为军事要道,经常是兵马经过之地。唃廝囉统治青唐时,西夏曾多次侵犯北部边境,唃廝囉为了抗击入侵,青唐军多次过这儿北上;北宋取河湟,其中一路兵马在高永年的率领下,沿湟水北岸进军,后筑绥边寨于今互助威远镇,韵家口肯定是兵马必经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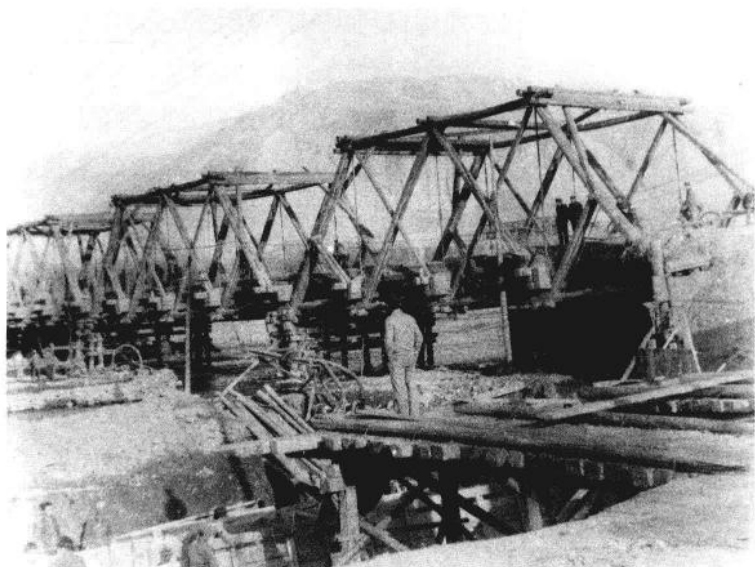
西宁东大街



隍庙街

城东建国路地区





正在修建中的五一桥



北关街



大同街



后政和、宣和年间，北宋熙州将刘法与西夏兵大战于古龙骨城（今互助东部），筑震武军，韵家口也是兵马必经之地；北宋灭亡后，金夏反复争夺西宁，明代“海寇之患”中，战火一度烧到离韵家口不远的北山寺麓，这里作为军事要隘，也少不了战火纷飞。清前期罗卜藏丹津之乱和后期河湟之乱中，四川提督岳钟琪进军郭隆寺和清军统领刘锦棠间道红崖子沟，出沙塘川攻小峡，韵家口又是双方对垒的战场。至今只留下古城滩、山城墩这些遗迹，和《西宁府续志》中“同治二年，韵宗训等三十一名村民殉难”的简略文字，让人们通过凭吊那远去的历史烟尘，感怀世事的沧桑。

据一些史料记载，韵家口最早的住户被称为“马土人家”，人们推测，那可能是土族的后裔；据《韵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年间，韵氏五军户来此屯田，这也许就是村名的来历。后来张、都二姓也定居这里，后逐渐成了村上大的家族。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韵氏家族的韵成章得中己酉科举人，顿时成了韵氏家族中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民间传说，韵老先生中举后，官府并未授给实职，依旧在家干些农活。有日在村外拾粪，被路过的衙门差役借口挡路而打伤，韵举人咽不下这口气，遂告之官府。在当时，举人是有功名的人，是很受人们尊重的，这下，不但使打人的差役受到惩罚，而且还规定，凡骑马路过韵家口者，必须在村外下马，然后牵马过村，至红沟儿口才能上马。之后有人说，村庄得名“韵家口”的缘故，与韵成章老太爷的发迹有关，其实成书于乾隆十二年的《西宁府新志》中就记有“附东五里韵家庄”的文字，40多年后韵成章才得以中举，所以庄堡的得名，与韵成章先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马家军中的达官显贵，显赫人物马彪、马得胜、马步康等纷纷在西宁近郊的中庄、褚家营等地修建豪宅，而马忠义却选中韵家口，巧夺豪取，强行在那儿修建了一进三院的私宅。由于“马公馆”的建成，这里一度又成了马忠义独霸的天下。马忠义，化隆县二塘乡龙欠村人，老百姓称其“大老五”。马忠义曾任马家军骑兵旅第二团团团长，作为马家军阀的一名爪牙和悍将，在河西走廊阻击西路军和攻打果洛的战斗中，欠下了许多血债，据史料记载，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就是被他惨杀于西宁东关敦庆号后院的。西宁解放前夕，一度失宠而在韵家口赋闲的马忠义又被委任为师长，参加阻击解放军西进战斗；青海解放后，他和谭呈祥又纠集韩进禄、韩起禄、马成贤、孟

全义等多次组织叛乱,使化隆县治安科长曲建华、税务局长刘锦文等近 20 多名干部牺牲。后经解放军一路追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投诚,并参加了省上组织的伪军官学习班,但他中途借口回家探亲,又从韵家口家中逃脱,在贵德、尖扎等地流窜,解放军围攻化隆昂思多关相口时,他又侥幸漏网,只身逃往红卡哇油坊,最后在后沟村被解放军战士郭彦用手榴弹炸死。

离 西宁,沿宁贵公路南行到总寨,再

土门关

东拐进蹚土湾,过坝沟门、加汝尔,翻红岭垭壑下行不远,便到了土门关。土门关是湟中县土门关乡政府所在地,西距县城 15 公里,辖贾尔藏、年坝、林马等 15 个自然村,早在民国时期,这里就设过“土门关镇”。我国称“土门关”的地名有多处,山西太行山的井陉关也称土门关,号称是太行八陉中的第五陉,2200 多年前的汉、赵大战中,淮阴侯韩信破赵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那里。甘肃临夏的大夏河边上也有个“土门关”,为明代二十四关之一,作为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分界线,过了土门关,就到了甘南。西宁的土门关远没有前面说的那两个土门关名气大,但它也是小南川一处很有名的地方,从这儿可以去田家寨(古称“乞塔城”),再过丹麻,翻左侧垭壑便可出平安三合川;如果顺沟而北行,过李家台、红土庄,可直通西宁小峡;向西经东沟滩,就到了上新庄镇。在过去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如果取道土门关,就可以绕过重兵把守的西宁城。交通虽四通八达,但路系于一关,土门关真可谓是南川一隘。明初著名僧人宗泐在《河湟漫兴》一诗中就有“雪峰西面是羌浑,天设奇关限土门”的句子。

土门关一带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岭,绵延近 30 里,名叫“马槽岭”。它尾接拉脊山,首连土门关壮河,山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猫儿刺,远看就像巨龙身上的鳞甲,因而民间就有了“斩龙脉”、“补风水”、“五个和尚打天下”的美丽传说。鉴于这里地形险要,过去常有拦路劫道者,为了便于盘查护卫,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春三月,当局在马槽岭“龙须”处修建了一段土夯城墙和一座城堡,修筑时一层土加一层猫儿刺,所以工程非常坚固。城墙通道处用砖石砌成一个高 2.5 米、宽 2.3 米的门洞,门洞顶端上书苍劲有力的“土门关”三个大字,人称“砖门洞”。当你从田家寨一路走来,仰望关后,是一抹陡峭的山梁,关



前是块块缓坡农田,砖门洞拦道,马槽岭城堡高耸,真有一点宋代欧阳修《渔家傲》词中“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味道。

解放后,偏僻而闭塞的土门关渐渐有了新的变化,尤其2004年10月民(民和川口)湟(湟中国寺营)公路开工后,这儿作为公路经过的一个重要地段,不但使交通更加便捷,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加快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也迎来了众多商机。人们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特色养殖,试种成功高山嫩豆苗、娃娃菜、白菜花等蔬菜,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另外,村上把劳务输出也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砖门洞”已被湟中县政府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过去作为南川一隘的土门关已成为民湟公路上的一处普通路段,只有马槽岭上的城堡、城墙遗迹,仍向人民诉说着一个渐行渐远的故事。

近郊六寨

自西汉元狩年间建西平亭以来,中原汉族陆续进入了河湟谷地,到唐代

中期,湟水流域已形成了不少以汉族为主体的村落。贞元二十年(804年)冬,唐御史吕温出使吐蕃,途经吐蕃占领下的河源军(在今西宁)时就写有《经河源军汉村作》一诗,其中就有“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的句子。但那时村庄的名字,却史无记载。以寨作地名,在我国十分普遍,如山西就有有名的大寨,重庆有石宝寨,安徽有天堂寨,河北有抱犊寨,湖南有黄石寨等。我国明清小说《隋唐演义》、《水浒传》中就有瓦岗寨、清风寨等地名。河湟地区村庄以“寨”为名,据有关专家考证,起始于宋代。北宋崇宁二年六月,以王厚、童贯为首的宋军第二次进军河湟,占领湟州(今乐都)后,于第二年四月攻入青唐城(今西宁),随后占领了溪兰宗堡(即今湟中县上新庄黑古城)和林金城(今湟中县多巴镇),在改青唐城为“西宁”的同时,改溪兰宗堡为“清平寨”。据称明兵备按察使刘敏宽和西宁卫同知龙膺于明万历二十三年撰修了《西宁卫志》,原书虽已亡佚,诸志不载,但大学者顾炎武汇抄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所收《西宁卫志》的材料中就有“堡寨”一条,上面明确注有西宁周边有临宗寨、德固寨、通湟寨、安陇寨、绥远寨、宁塞寨、

瓦吹寨和清平寨等村寨名,并详细注出其地理位置。

近千年后,上面所说的那些村寨名称早已消亡,而以姓氏为村寨名的却星罗棋布于西宁周边,如张家寨、田家寨、陶家寨、逯家寨、徐家寨、谢家寨、毛家寨、孙家寨、黄家寨、朱家寨、宋家寨、葛家寨等。以家族姓氏为村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为达官显宦落脚此处,留心经营,名人易显,遂以其姓氏命名,为某家寨;二为某氏家族聚居此处,首倡开发,筚路蓝缕,居功颇多,遂以其姓氏命名。其中地近省城,围拱西宁的当数傅、曹、沈、杨、刘、彭六寨了。

杨、刘、彭三寨依次坐落在原西宁城西郊外,扼伯颜川(今西川)川口,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这里是河湟谷地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三寨之中,杨家寨居东,今已融入市区了。据说大量杨姓汉族最早进入青海是在隋朝。当年隋文帝杨坚将皇室女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世伏(世伏死后,依俗嫁其弟伏允)时,公主曾带大批随从,其中多为杨姓,因而形成青海东部杨姓村庄,至今青海带“杨”姓的村庄约有37个。杨家寨地域内有个大名鼎鼎的虎台,今天政府在这儿已建成了典雅幽静的“南凉虎台遗址公园”,土堆上青草萋萋,三兄弟雕像矗立台前,供人们凭吊游览。

杨家寨的西侧不远处为刘家寨,它和比邻的彭家寨现已划入筹建中的海湖新区了。据有关资料,青海刘姓始见于隋代大臣刘权。刘权曾置河源郡积石镇。明正德年间,湖北麻城人刘天知曾督理河西,创筑从巴暖三川到西宁的山城共17座,绵延200余里,形成了西宁、民和等地含“刘”姓的村庄,今西宁刘家寨便是其中之一。

彭家寨在刘家寨西,经数十年治理,村南荒山已披绿装,浅绿深翠,蔚然一片,今山下已建成“湟水森林公园”,长廊短亭,诗碑幽径,以解放渠为腰带,以碧山为屏风,大气磅礴,令人心旷神怡。

彭刘二寨地域由于开发历史悠久,村庄周围留下来的汉墓很多,这里和湟水对岸的吴仲、巴浪地域,北川陶家寨一带当年封土高耸,墓冢累累,曾出土过许多陶器、装饰品和铜器,刘家寨村边也树有“刘家寨汉墓群”的碑碣,但不久可能又将要被一片高楼取代了。

沈家寨位于南川口麒麟河西岸,面对凤凰山,真是山河灵秀,尽占祥瑞。曹家寨位于城东湟水南岸,两村原是西宁东西郊外较大的村落,今已成为繁



华街衢,终日熙熙攘攘,已看不到清代西宁诗人李荣树《登南禅寺孔雀楼》中所写的“岚气回环映水光,麦花吐秀菜花黄”景象了。

傅家寨地处小峡西口、湟水北岸,当年兰宁大道经过村前,锁钥之地,地势险要。19世纪中叶,因这里出了一个“袁道”而名闻遐迩。袁道名守道,生于1851年,25岁时出家南朔山,是道教龙门派二十代传人,1952年羽化,享年101岁。有关袁道的逸闻趣事,至今仍流传不绝。

深涧堡·张家湾

西 宁西川、湟水河南岸有个较有名气的山,名叫阴山。它断崖千尺,

人行其下,抬头仰望,遮天蔽日,因而称为“阴山”。由于山高陡峭,常会发生滑坡,曾记入《西宁府续志》中。阴山的西侧是湟中西堡川,俗称“石灰沟”,东侧是水槽沟,由于两沟流水的切割,兀立的阴山更显得雄伟高大。石灰沟中常年有水,北流入湟水,此水即《水经注》中所说的“龙驹川水”也。《水经注》是北魏伟大地理学家酈道元所著,其中写到湟水时,说“(湟水)东入戎峡口,右合羌水(今药水河),水出西南山下,经护羌城东,有东北经临羌城(湟源南古城)西,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卢溪(今盘道磨河)水注之。……湟水又东,迳临羌新县(今多巴)故城南,右合溜溪(今共和尕布沟水)、伏溜(今维新水)、石杜(今汉东川水)、蠡(今甘河水)四川,东北流注之。湟水又东,龙驹川水(今石灰沟水)注之。左合临羌溪水(今西纳川河),水发新县西北,东南流”。准确而清楚地记载了湟水南岸、阴山附近的五条小河。而水槽沟中平时没有涓水,但夏秋一遇暴雨,因沟脑流域面积大,常会形成山洪,咆哮的洪水冲向沟口,沟右侧却是汉庄(史书上称为“旱台庄”)高地,只得沿旱台下北泄,奔向湟水。天长日久,旱台下形成一条长长的深沟,青海人称其为“涧沟”。涧沟西侧,是阴山经常年冲刷而形成的台地,很早就有人在此筑墙垒屋,形成村落,村落东侧由于临涧,所以史称“深涧堡”,《西宁卫志·堡寨》中就记有深涧堡的村名,说“西川二十里有深涧堡,又五里为乌思巴堡(今堡子村)”,但现在已改称“张家湾”了。

《西宁卫志》是明万历年间由西宁兵备道刘敏宽和同知龙膺编修的,它开创了青海地区现存编史修志的先河,对了解西宁地区方志源流、考证明代青

海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见,早在 400 多年前,张家湾村就叫“深涧堡”。因种种原因,村庄改名的例子并不鲜见,像王同堡已改为了“小寨”,陶家大堡已改为了“大堡子”,新园堡已改为了“新平”,杏树庄已改为了“幸福庄”,伏羌堡改为了“徐家寨”,镇海堡改成了“通海”,徐家堡改成了“双寨”……400 年前就有的深涧堡改称了“张家湾”,也许和出生于这里的张仙有点关系。张仙,名讳现已无从查询,但史料记载,他是西宁张家湾人。据说当年湖南道士苏某云游至西宁,收张家湾张姓小孩为徒,二人同在西元山(今南佛山)桃源洞(青阳洞)修行,后有家喻户晓的“一鱼点化,二仙成道”的美丽传说,师徒二人先后羽化成仙。后人将张道肉身塑像供奉于前山佛沟殿中,人称“张佛殿”。从那时起,南佛山就声名远播,被誉为“终南之尾,西源之巅”;张、苏二仙作为南佛山斩棘开山之祖,路人皆知,尤其张仙作为徒弟,却先于师父而成仙,一时传为佳话。

张家湾东侧的深涧是过去西川南路上的一处险要之地。那时,涧沟上只搭有几根横木,两侧并没有栏杆,路旁也没有任何警戒的标志,而且桥面比两侧路面窄。从西宁西行,过了早台庄,一溜急下坡,拐弯处即是深涧位置。如果你不熟悉路况,或稍一疏忽,在这儿常会出事。所以在过去运输主要靠畜力的年月里,车曳马驮,这里是一处揪心的地方。如今,以深涧为界,东侧已划入新成立的海湖新区,西侧已成了楼房矗立的街巷,店铺林立,作坊相邻,其间的深涧已得到彻底治理,作为 109 国道西川南路的一部分,如果你不仔细寻找,再也找不到哪儿是当年的深涧了。

西 宁西川古称伯颜川,伯颜为蒙语,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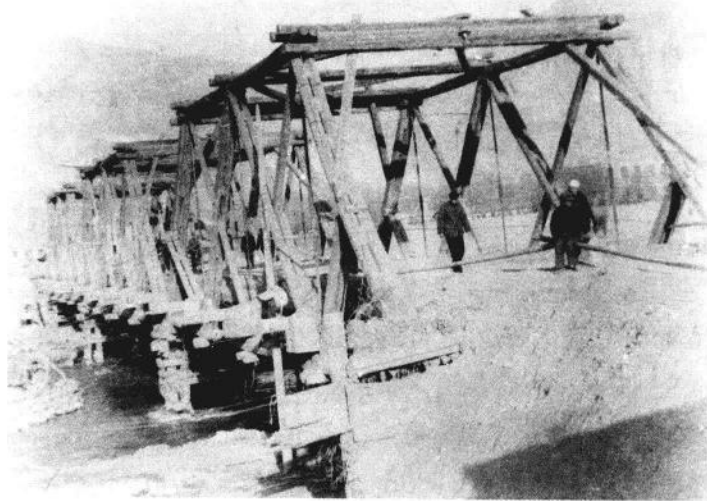
即富,财物多。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就说:

“如伯颜者,富也。”西川土地平阔,湟水纵贯,西宁历史上有名的临羌新县、临蕃城就在这里;明代著名的“湟中三捷”之一的西川之战和清代罗卜藏丹津之乱的主战场都发生在这儿,这儿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青海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西川全长 20 余公里,西尽头湟水北岸有一村名叫“扎麻隆”,过村不远,南北山相聚成峡,那就是有名的“西石峡”,现在人们已通称为湟源峡了。

扎 麻 隆



黄河路修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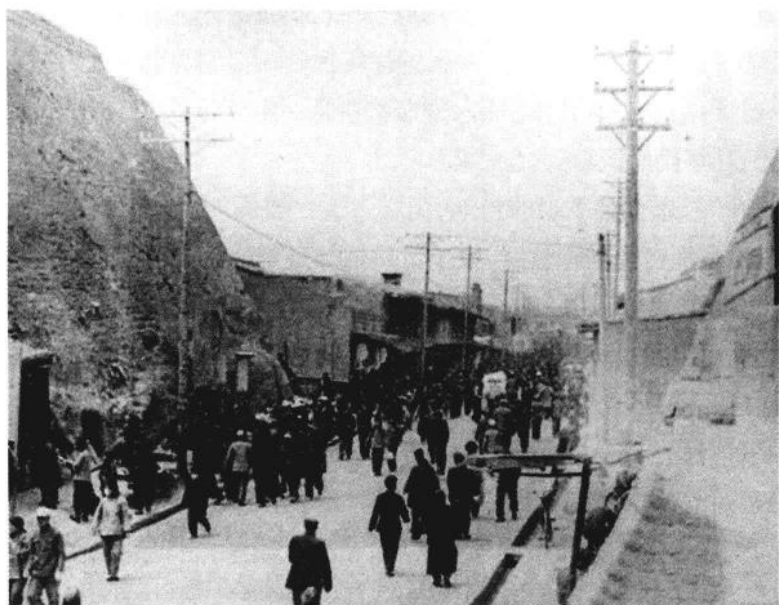


五一桥

丹噶尔城外的
商队



黄河路路面铺设完成



城墙下的旧街道



有人说,扎麻隆是藏语,意即“坛子口”,按地理地貌说,的确很形象。我省有名的藏学专家谢佐先生有次给我说,“扎麻”就是猫儿刺(一种丛生小灌木,耐干旱,枝上有小刺),扎麻隆是否就是长猫儿刺的地方?扎麻隆的山上确实长有猫儿刺,而且湟中就有个村庄叫“猫儿刺沟”。明代刘敏宽、龙膺等所修的《西宁卫志》中把扎麻隆记为“割麻隆”,说那儿住着割麻隆族,是属于藏族隆奔部落的,它的东面是“赏失蕃营”。赏失族所居住地现在称为尚什加村,它的东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多巴体育训练基地。当年为了抵御西海蒙古入侵,扎麻隆村西不远处就建有连接边墙(今已归明长城的一部分)的西石峡峡榨和山城,作为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西石峡峡榨曾制定有严密的防守预案:“虏零人,则割麻隆族蕃御榨,西川兵出佛尔崖,西宁兵出赏失蕃营,分御。虏大人,则诸兵于割麻隆蕃营上下合击之。”可见,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扎马隆一度还是抵御“海寇”的前线。

扎麻隆地处湟源峡东口湟水北岸,东距西宁约 32 公里,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年月里,从西宁走到这儿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所以村中大道两旁,设有车马店、小商铺和几家饭馆,俨然成了一段不长的街道。扎麻隆虽与隆奔部落的大本营——国师营隔河相望。但如去西川湟水南岸必须过河。冬天尚有冰桥,其余时间渡河,仅为临时搭建的便桥,常常水冲桥断,人们只得望河兴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丹噶尔人张永寿慷慨捐资,倡议修建扎麻隆桥,修成后,极大地改善了这里的交通状况。张永寿修桥的壮举得到人们一致称赞,《西宁府续志·建置》中就记有其事。张永寿所修桥是一座“握桥”,位于今扎麻隆村前,上世纪 60 年代尚能看到其残迹。

扎麻隆村前和村东全是平坦的川地,但在过去一没电、二没提灌设备的岁月里,眼看着湟水从村前哗哗流过,数千亩田地却是旱地。上世纪初,扎麻隆出了一个名叫周先、字绍年的人,他带头从官府义仓中贷青稞一万斤作为劳资,发动村民从西边石板沟开渠引水,浇灌田地。因渠道要经过“上头尔”地段的回族坟院,经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的马麒调停,得以顺利建成。扎麻隆渠长 3 公里,建成后,村上 1 500 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地。1921 年,村民在峡中渠道经过处的“牛将爷卡子”悬崖上刻“渠水活民”四字,勒石铭功,以示感激,作为一顿彰显民族团结的珍贵实物,半个世纪来,一直高悬在 109

国道进峡处右侧的悬崖上,可惜在上世纪 70 年代,被无知的采石者只为蝇头小利,而惨遭损毁。

如今,扎麻隆村后被称为“凤凰山”的山上建起了九天玄女庙,当年大队的苹果园里游人不断,作为西宁邻近的一处重要的观光景点,这里神像庄严,殿宇轩昂,过去只作为一个路边住宿、歇脚的普通农村,现已成了宣传大美青海、展示昆仑文化的重要一环,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离 西宁,沿西川南路西行 10 余公里,就

乌思巴堡

到了石灰沟与大西川的交汇处,这里有个

村庄,名叫阴山堂,过去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从阴山堂南望,陡峭的阴山西侧,石灰沟河东岸,却是一抹高阜,那里疏杨冉冉,院墙掩映,有村名“堡子”。堡子村地处石灰沟沟口东侧,与佐署村隔河相望,属湟中县西堡镇的两个自然村。你只要出堡子村北行下坡,便又到了西宁市城西区的阴山堂村。

堡子是古时“乌思巴堡”的简称,现在已很少有人这样称了。之所以称为乌思巴堡,是因为这里过去是乌思巴尔部落的领地。乌思巴尔部落是隶属于宗喀十三族中隆奔族的一个小族,时称“隆奔乌思巴尔”。隆奔族管辖区域以今湟中县国师营(今讹写为国寺营)为中心,“居牧塞内,列帐塞外”,西至湟源峡响河,甚至到青海湖东南方向的夏格日大山,南至大小康缠、折科,北至扎马隆、尚什加、奔巴尔、拉科、白杨口等地。洪武十三年被招抚后,明廷授隆奔族昂素贾尔什得以“国师”名号,备受恩宠,其下属乌思巴尔族居牧今湟中石灰沟,头人张答里麻筑堡于沟口左岸,人称“乌思巴堡”,当时石灰沟也因此而称为“乌思巴尔沟”。明永乐年间,张答里麻被明成祖授以“佐觉义”的封号,于是选址建署于石灰沟河对岸,人称“佐觉义署”,左署右堡,这就是后来佐署村得名的原委。春风得意的张答里麻在乌思巴尔沟连续建起花园、羊圈和部落供养的寺院,并在沟南端建起东西二堡,这也就是后来花园村、羊圈村、寺尔寨村、西堡、东堡村得名的原因。不久,夜郎自大的张答里麻竟起兵反叛,被西宁土官会宁伯李英“捣其庐帐”,张答里麻被生擒后“磔死”,“籍其家”。这在近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中国简明通史》中也有记载。

此后,乌思巴尔族安静了近百年,但到了明正德十四年(1519 年),乌思巴



尔族头人又不满西宁卫官员的管辖，联合驻牧于今互助台子乡的巴哇族、大通景阳川的密那族“起事反明，谋掠北川”。乌思巴尔起事后，西宁卫指挥同知李淳奉命率兵征讨。李淳，湖广襄阳府人，有胆略，性刚决，因战功丕著，被加封忠勇将军。其先祖李仲贤曾随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常遇春东平海甸，南定苏州，西征昆仑，北取罕东，以功劳被赐戴太子冠，封琼花侯、骠骑将军，并恩准世袭西宁指挥同知。指挥同知为从三品武职外官，可见级别是很高的。李淳出征北川后，“先后十余战，诸部悉平”，是年冬十月，回师征密那部时，途经今大通景阳川庙沟时，当地“山险而狭”，朔风劲吹，草木迷目，部下多有劝缓进者，但李淳却大意轻敌，督兵直入，草莽间密那伏兵突起，他虽冒死血战，“所骑白马为赤”，不幸中矢阵亡。李淳阵亡后，明武宗朱厚照览奏后曾慨叹：“朕之忠勇臣也！”钦准在阵亡处立庙祭祀，后人称其为“李王庙”，这就是大通县新城“庙沟”地名的来历。

乌思巴尔族经此一役，从此一蹶不振，所遗族众流散到附近班沙尔、六（鲁）沙尔和昂藏等地，直至衰亡。头人张答里麻所居的乌思巴堡也被人渐渐简化，叫成了“堡子”。

上世纪，堡子村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莫如志先生，赵宗福先生曾赞誉其书法“范郎神采传真迹，于体风骚树正宗”。莫如志，字能容，号牧牛翁。他的字雄豪劲健，宽博宏大，为世人所敬重，书法家樊华先生曾在怀念莫如志的文章中称赞“他一生潜心于《泰山金刚》石刻，所作金刚体隶书古朴雄健，宽博厚重。他的草书则以‘于体’为楷模，同时将自己的感受融于其中，给人一种洒脱奔放、飘逸超然之美”。莫老仙逝已有数年了，堡子村有幸，古与今，都有能被人们提起的话题。

刚岔村

沿 西宁西川北路西行 10 余公里，路北另

有一川，名曰云谷川。云谷川俗称“鳌迭沟”，亦称双龙川，一川冠三名，这在河湟谷地是很少见的。进云谷川不远有个卡约村，卡约村因发现大量商周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而名闻史学界，后被史学家以它的名字定名为“卡约文化”。卡约文化是青海古代各种文化遗存中数

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地方文化，主要分布在我省东部农业区及黄南、海南、海北等地，涉及我省 10 多个县市，有 200 多处遗址，比较集中在两湟、大通和互助，其中尤其以大通上孙家寨、湟中下西河潘家梁、湟源大华中庄最为出名。卡约文化是中原青铜文化的承袭和发展，它集中地反映了青铜时代居住在青海河湟流域的先民们生产、生活的状况。卡约文化的发掘，为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一份极为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料，证明先民们早在史前时期就在青藏高原、河湟谷地繁衍生息，为丰富的中华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过卡约村，一路烟树村桥，北行数公里，路西有村，名曰刚岔村。说起村名的来历，还得从数百年前刚察部落从西藏迁移到长江上游的果洛地区游牧说起。刚察部落后又移居到环湖地区，明正德四年（1509 年）后，因故又迁往黄河南岸的达日朵云地区，即在今贵德到循化的狭长地域内。其间，族中个别人受亲戚引荐，或自谋生路等原因，曾流落到湟中县云谷川一带聚族而居，渐渐成为村落。为了不忘故族，仍以“刚察”为村名，并集资修建了“刚察寺”。后在书写的过程中，由于随意性，写成了“刚岔”。古老的刚岔寺建于刚岔村村西、娘娘山一条支脉的二级台地上，人称那儿为“上、下拉加台”。这儿山势奇特，从山脚上行，坡分五台，其中最大的第二台地上土地平阔，前临平川耕地和云谷川河，靠山面水，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刚岔寺历史悠久，也屡见于史册，如《西宁府续志·卷之四·田赋志》西宁县一章中就载：从实征仓斗粮中“内支刚岔寺、塔尔寺等共喇嘛 2 240 名，每名岁支衣单口粮 1 石 6 斗，共支粮 3 590 石 4 斗”。经考察史料得知，能由官府核发并岁支“衣单口粮”的寺院，一般是规模较大，得到官府认可的在籍寺院。可惜这一著名的寺院竟毁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河湟之乱。之后历经 100 多年雨雪风霜，废弃的刚岔寺原址台地上当年筑屋痕迹仍在，墙垣纵横，佛殿、僧舍遗迹依稀可见，并遗留有一些柱础、屋脊吻兽之类的寺院遗物。

刚岔村因地处卡约文化遗存的中心地带，村东的开阔川地里，是卡约文化遗址密集区，断崖上两寸多厚的文化层清晰可见。村西河边缓坡上有一股长年流淌的清泉，水质纯洁，经省上有关部门化验，泉水富含锶等微量元素，是不可多得的矿泉水。由于这里是川道最开阔的地段，北有碧波荡漾的李家



山水库,西有蜿蜒的云谷川河,漫步村外,四周青山绿水,茫茫尽良田。

合 尔 营

湟中拦隆口镇有个村庄,名叫“合尔营”。它的东北方向有一条山岭,就

叫“合尔岭”;西北方向还有个村庄,名叫“合尔盖”,只不过它属于上五庄乡管辖,由于人口繁衍,已和乡政府所在地邦巴村连在一起。合尔营周围还有几个以“营”为名的村庄,如勺马营、图巴营、伯什营、麻子营等,以前这里曾设四营乡,因撤乡建镇,四营乡现在已不存在了。拦隆口镇和上五庄乡所在区域古称“西纳川”,因过去是西纳部落居牧地。历史上由于从这里经水峡,曾是赴青海湖、柴达木的重要交通要道,作为军事要地,一些险要地段,一直派驻营兵防守,因而川中还有扎什营、班仲营、端巴营、铁家营、千户营等这么多以“营”为地名的地方。合尔营所在地东通鳌跌沟(今李家山),西连西纳川,从西宁去海西,进鳌跌沟,过合尔营,斜出白杨口,再穿水峡,进入同宝部落驻牧的海晏地区,比绕黑嘴儿再进西纳川要近得多。

不但湟中有以“合尔”为名的地名,我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也有以“合(贺)尔”命名的地名和村名,如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乐都县也有以“合尔”命名的村名,如合尔红、合尔茨等。“合尔”因书写的随意性,有些材料中写为“霍尔”或“贺尔”,如互助红崖子沟五十乡附近有条山岭,人们就称它为“霍尔岭”。据史料记载,“霍尔”是藏族对青海境内黄河以北部分游牧民族的通称,可能是由汉语“胡儿”一词转换而来。在汉文史料中,“胡儿”泛指生活在北方、甚至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古诗中提到“胡儿”的诗句俯拾即是:“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汉家旗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明妃(指王昭君)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就连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的诗中,也说:“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同样,在汉文史料中,把北方、西北方称为“胡方”,把从那儿传过来的许多物品和食物统统冠以“胡”字,如胡服、胡床(即马扎子)、胡琴、胡壘(即土坯)、胡瓜(即黄瓜)、胡椒、胡罗卜、胡麻、胡桃(即核桃)、胡豆(即蚕豆)等,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呢。《西藏一统志》就将吐谷浑译为“霍尔吐谷浑”,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有关于

“霍岭大战”的描述。藏语中,称汉人为“加”或“加米”,称土族为“合尔、霍”,看来,合尔(贺尔、霍)的地名是与土族有关系的。

土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关于它的族源,史学家们有多种说法。因土族人自称是“吐昆”,有人说土族族源与青海历史上由鲜卑人建立的吐谷浑有关;又因土族人自称是“蒙古尔”、“察汗蒙古尔”,且蒙古族称土族是“白鞑靼”,据此,有人说土族族源与蒙古人有关。据《土族简史》说“土族是吐谷浑人与当地其他民族人民交错杂居,经过世代互相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了新的共同体——霍尔,后来又有一部分蒙古人与当地霍尔人长期相处,最后发展而成的”。据《秦边纪略》在记载西宁十七边堡形胜险要时,内容涉及明代和清初土族人数和分布情况,其中提到不要说西宁及周边地区,就连归德堡(贵德)也“城中皆土人,兵皆土人”;保安堡(今黄南同仁)也“堡中皆土人,兵皆土人”;庄浪土司驻牧的连城(今甘肃永登)也“土民繁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从上述史料中可以得知,当年土族繁衍生息的地域是很广的,后来通过人口的迁徙和融合,一些地方只留下了“合尔(贺尔、霍尔)”的地名了,湟中的合尔营和合尔盖便是这种历史痕迹。

石灰沟位于西宁市城西区阴山的西

侧,长约 10 余公里,今属湟中县西堡镇

管辖,也许人们为了雅化,有时写作“实惠沟”。石灰沟古称“乌思巴尔沟”,过去是宗喀十三族中隆奔族的天下。因人们书写的随意性,隆奔族亦称隆卜族,其下辖的小族中有一支称为“乌思巴尔族”,就居住在这里,所以被称为“乌思巴尔沟”。

明朝初年,随着明军大举西进,河湟各族首领为了部落自身的安全,纷纷上表表示归顺,后隆奔族因每年向明王朝贡马 100 余匹,供明军防守边塞之用,首领札省吉尔伽还被受封为指挥僉事,以示恩宠;下属乌思巴尔族头人张答里麻也被明成祖授予僧录司“左觉义”的封号。“觉义”是明王朝为了笼络民族宗教或部落头人的一种封号,明太祖时,“西番僧”星吉监藏曾到南京,落脚于玄武湖畔的鸡鸣山,后被朱元璋封为“右觉义”。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 年)建鸡鸣寺于山上,并让星吉监藏“别为院(于)寺西以居之,

佐署



(允许他)结坛场,广施度济”。鸡鸣寺是明代南京八大寺之一,也是明成祖迁都之前留京藏僧主要挂锡之处,乌思巴尔族头人张答里麻能受封“觉义”名号,也是很简单的。

早先,乌思巴尔族在阴山西侧、石灰沟河东岸台地上筑有寨堡,称为“乌思巴尔堡”(今堡子),张答里麻就住在那里,今受皇家封为“左觉义”名号,使他大喜过望,于是选址筹建“左觉义官署”。最后选定石灰沟河西岸台地,与乌思巴尔堡隔河相望。左觉义官署建成后,靠山面水,左瞰大西川,右拥花园(今花园村)、羊圈(今羊圈村)和佛寺(今寺尔寨),再往南,有东、西堡围拱,真是雄踞一方,不可一世。

张答里麻受封“左觉义”后,虽皇家“恩宠日增”,但他不思为国“保境安民”,却称霸一方,勾结其他部落,“骄蹇放恣”,侵夺其他寺院山园田地,窃取途经自己辖地的进贡财物,甚至招纳逃犯为僧。“官府欲捕获严惩,不料其逃往蒙古边境,继续为非作歹十余年”,公然反抗明王朝。后西宁卫土官李英“发其事”,率兵“捣其庐帐,张答里麻(不但)被磔死,(而且)籍其家”。显赫一时的左觉义署从此人去屋空,顷刻败落。也就是在这前后数10年里,明王朝从江南征调数以千计的民户来西宁卫从事军屯和民屯,有的是举族迁移,有的是犯罪官吏和平民,一些人就在“佐署”(今约定俗成,写作“佐署”)地界安家落户,于是就留下了“佐署”这一村名直到现在。

葛家寨

葛家寨位于湟中石灰沟上段,村名

的来历,可能与最早开发这里的葛氏

家族有关。葛家寨东南通赵家庄,过蚂蚁沟可去南川,北连两旗,南与李九、河湾两村相邻,可以说也处于交通路口。“寨”是民间以家族为主的军事防卫结构,青海地名中带“寨”的,大多始于宋代,像《西宁卫志》中就记有清平寨(今湟中上新庄黑古城)、绥边寨(今互助威远镇)等,看来,葛家寨的得名也许已经很久了。

葛家寨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但有一件事儿却在青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那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距今已整整100年了。在那清王朝统治

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夏历六月,偏僻而落后的西宁西川拦隆庄爆发了以李旺为首的“黄会”起义,义军攻打丹噶尔城失败后,李旺等义军首领被捕杀。两月后,武昌起义爆发,陕西新军在张凤翔等的领导下,响应武昌起义,光复西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驻兰州的清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升允急忙组织东征军反扑,陕甘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为了牵制东征军,派人到甘肃(当时西宁属甘肃管辖)各地活动,重新点燃了河湟地区反清的烈火。西宁人乔寿山(又名乔占魁)是“黄会”中掌管西宁西川及鲁沙尔地区的行动负责人,逃脱缉捕后,一度偃旗息鼓,陕西新军起义的消息传至西宁,人心振奋,他在任得慧、孙大旗、卢生斌的协助下,一边在西宁各川堡联络广大贫苦农民,一边打算仿效陕西新军的办法,积极联络西宁大营盘的巡防营士兵,准备利用葛家寨10月15日庙会之际,再次发难,计划首先攻占镇海堡和多巴,然后联合巡防营士兵夺取西宁,以响应武昌革命。但他们沉醉于武昌起义后的大好形势,自以为有西宁大营盘新军的支持,10月11日,在乔寿山的带领下,在与葛家寨一山之隔的甘河滩元山尔供李上天(李旺)灵位,建纛祭旗,消息竟被镇海营千总白尚珍侦知。镇海营东距西宁仅50里,消息传至西宁,新军与乔寿山的联系遂被切断。乔寿山察觉事情败露,遂于13日黎明前仓促率起事民众前往葛家寨,打算提前举事,西宁市总兵张定邦亲率清军前往葛家寨镇压,一阵血战后,义军很快被击溃,被俘者百余人悉数被杀于西宁西门河滩。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反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西宁各族人民闻风响应、奋不顾身的革命积极性,在青海近代史上留下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

葛家寨地处拉脊山与湟水谷地的过渡带上,是脑山油菜籽外售和山外日用品进山的必经路线,所以很早以来,村上就有专门靠贩运、兑换油菜籽为业的“油客”。当年,石灰沟有些地方土壤缺碘,有些地方土壤含氟高,因而有些村上患甲状腺肿大、有些村上患褐斑牙病的人数较多,于是就有了“某某(恕不报村名)庄的黄牙,某某里的喧娃(吹牛鼻);葛家寨的油客,某某里的疙瘩垒锤(甲状腺肿大,俗称“沙絮胎”)”的顺口溜,可见,葛家寨的油客早就出名了。改革开放后,葛家寨新一代的“油客”再也不把目光局限在西宁周边,再不是小打小闹的时候了,他们早已把触角伸向格尔木、拉萨,据说在西藏的林芝、日喀则等地就有200多家葛家寨人开的清油店。



葛家寨除了“油客”外，每年的社火表演，像西纳川千户营社火中的“高台”一样，社火表演时的“弦索（指乐器）”也远近闻名，不少邻村人曾专门前去录制过。除河湟社火中常见的高跷、秧歌、旱船和舞龙、耍狮之外，村上的“出僧官”（俗称“喇嘛社火”）是特有的节目，节目中有装扮成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僧人”和“活佛”，吹法号、法螺，表演“跳欠”，场面隆重热烈，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据说“喇嘛社火”始于1934年，是为了纪念一位云游至此的喇嘛，人们希望通过这一欢娱形式，以祈求社会的祥和、平安。

海 马 泉

海 马泉与湟中县城只有一

山之隔，从鲁沙尔西行，过土

南门，北行不远，就是海马泉。有人以“海马泉”为题写过诗：“闲愁难写旧时笺，春后人寻海马泉。无语沙湖常寂寂，空心芦苇自年年。风牵云梦不留影，柳系琴声乱入弦。临水一枝如瘦笔，倩谁忆取杏花天。”过去，海马泉可以算得上是一处名胜：从拉脊山延伸出的一溜青山，到海马泉处戛然而止，山脚下却有一眼汩汩清泉从沙砾间涌出，蜿蜒北流，汇入石灰沟河。泉边上建有一座神龛，几株古杨虽树皮龟裂，虬枝横斜，但生意盎然。沿泉水流经处，一路芳草萋萋，不时有牛羊前来饮水撒欢儿。夕阳残照中，人们为祈求平安吉祥而缠于树上的红布分外耀眼，真有南宋诗人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的味道。泉水东侧是一抹赭色大山，青海古长城（边墙）横跨石灰沟河，就从海马泉前爬上山坡，沿山岭蜿蜒伸向土南门。

海马泉的得名，还有一段凄美的传说：当年这儿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一日偶过南佛山，不幸被山中恶神看中，欲强娶为妾，姑娘誓死不从，惹得恶神大怒，化为巨龟，封天雨，吸河水，使百里赤地，人们叫苦连天。姑娘得知原因后，悲愤交加，遂纵身跳入山涧，欲以一死谢苍生，不料却变成一匹枣红海马，腾空而起，在这一带施撒甘霖，最后化为一眼清泉，以滋润家乡土地。上界感念姑娘悲壮义举，派天兵擒获恶神，并用巨石将其压于泉底，让他永世作镇泉之龟。人们感念姑娘恩德，遂称此泉为“海马泉”。据说清康熙皇帝派张廷玉进藏时，张廷玉还特地来这儿游览过，从而使海马泉名声大振。

上世纪30年代，统治青海的军政要员纷纷在西宁周边择地建宅，就在马

家军中的达官显贵、显赫人物马彪、马得胜、马步康、马忠义等在西宁近郊的中庄、褚家营、韵家口等地修建豪宅的时候，而马麒的大女婿马庆却选中了远离喧嚣、风景秀丽的海马泉。马庆，经名“麻尼”，仗着其是马麒女婿、马步芳的姐夫，炙手可热，时人均称其为“麻尼姑父”。不久，海马泉北侧一块占地数十亩的大宅院建成了，高墙大屋，周围环绕松柏，“侯门一步深似海”，自从海马泉建起马庆宅院后，这里虽处交通要道，但人们经过时，还得要小心翼翼。宅院西侧有石灰沟河，东侧有海马泉水，两水环绕，真应了“二龙戏珠”的佳话。

马庆有子名马呈祥，字云章，生于1914年，后娶大舅父马步青之女为妻，亲上加亲，藉外公之威，在马家军中历任连、营、团、旅、师长，1944年初以中将衔任陆军骑五军军长，奉调入新疆。据说骑五军进疆时，马步芳曾以“立马天山第一峰”的锦旗相赠。骑五军进疆后，曾为保卫国家领土，于1947年6月5日与入侵势力进行了有名的北塔山反击战，并取得了辉煌胜利。新疆和平解放时，骑五军经过改编，正式加入了解放军行列，其副军长韩有文曾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北塔山反击战过去37年后，王震将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韩有文等新疆代表团，当时还对韩有文说：“北塔山那一仗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保卫了我国的领土。”

几十年后，海马泉一带的地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斜阳古柳、清泉蜿蜒的旧景已成为人们的追忆，随着甘河工业园区的发展，这里高楼林立，大道纵横，如果你想打问一下当年的海马泉，只有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们，还能给你“遥指杏花村”。

现 在的苏尔吉只是湟中西部共和镇

苏 尔 吉

大山丛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它东邻

花勒城，西连山甲子，北面不远处是转嘴子，出了转嘴子，也就是西宁大西川了。苏尔吉可是一个出过名人的地方，因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山祖师宗喀巴大师的母亲香萨阿切就是这儿的人，村上的苏姓家族就是大师的“娘家人”。香萨阿切后嫁鲁本格，据《塔尔寺志》记载，鲁本格家族为卫藏十八大姓之一，鲁



本格是曾任“达鲁花赤”的地方官员。当年,鲁本格夫妇在黄鼠湾(今甘河工业区东区)一带放牧,后随牧转场至黄鼠湾东侧的鲁沙尔(意即新牧场)。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就诞生在塔尔寺所在地莲花山中。

宗喀巴降生后,正在附近曲噶尔静房(今湟中马场)修行的曲结顿珠仁钦大师闻讯曾亲往祝贺;后噶玛噶举派第四世活佛若比多杰受元顺帝召请,途经平安夏宗寺时,鲁本格曾带时年3岁的宗喀巴到夏宗寺拜见若比多杰,并受近事戒,此后前往化隆夏琼寺,拜曲结顿珠仁钦为师,开始学习佛家经典。明洪武五年(1374年),宗喀巴时年16岁,奉师命前往西藏深造,史载他长期修学,“忏悔叩拜,指端俱裂,磨拭盘坛,腕部全损”,经艰苦努力,博通显密,声名渐著,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并对佛教戒律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即善规),被誉为“第二佛陀”。

相传大师降生时,其母香萨阿切剪脐带时有血滴落地上并渗入土中,数年后这里长出一棵白菩提树,枝叶繁茂,香气四溢。更为惊奇的是,每片叶子上竟显示出一尊狮子吼佛像。这就是塔尔寺被称为“衮本贤巴林”,意即“十万狮子吼佛像弥勒寺”的缘故。大师去藏6年后,香萨阿切思儿心切,托人捎去自己的一束白发和信件,盼望大师见发思亲,回乡能见上一面。但大师为学佛学而难以返里,修学和尽孝难以两全,只得含泪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一幅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并嘱托“若能在我的出生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和我见面一样”。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香萨阿切在信徒们的支持下,依照宗喀巴的嘱托,在他出生的地方建塔,取名“莲聚塔”。香萨阿切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见到儿子一面;同样,自16岁离开家乡后,宗喀巴再也没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明永乐十七年(1419)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一代宗师宗喀巴圆寂于他所创建的甘丹寺,享年62岁。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仁钦宗哲坚赞在塔侧建起一座小寺;万历五年(1577年),又在此基础上建起了弥勒殿,至此,塔尔寺才初具规模。……坐落在莲花山中的塔尔寺作为大师的诞生地,将永远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块圣地。

宗喀巴大师圆寂后,苏尔吉村苏姓族人闻讯即在村上修建了三间佛堂,

专门供奉从西藏请回的大师生前衣物、用品、经卷等物品和大师绘像。塔尔寺建成后,寺院曾出资、并派工匠前来苏尔吉,在原有的佛堂基础上,建成一座四合院,内有坐西向东、与塔尔寺相望、上下各三间的二层木楼,内供塔尔寺所赠的一尊宗喀巴鎏金铜像。由于佛堂与塔尔寺的特殊关系,不仅成了当地信教群众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其他地方前来朝拜者也络绎不绝。1958年,佛堂供物及佛像被移往转嘴子村附近的噶住寺收藏,作为宗喀巴母亲出生地的苏尔吉,至今那儿还有一些佛堂遗迹供人们凭吊。

班沙尔是湟中的一个村庄名,

班沙尔·大閤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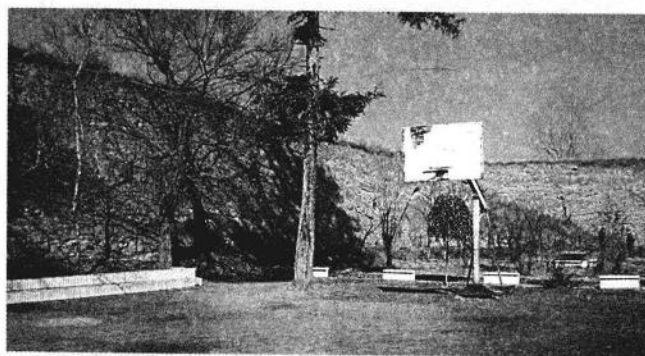
它西临甘河工业园区,东与鲁沙尔

隔山为邻,南通南佛山,北出石灰沟川口,就是西宁城西区的阴山堂。它过去隶属于西堡乡,后因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现归甘河滩镇管辖,由于人口繁衍,现已分称为上营和下营了。班沙尔村地处川中凸起的台地上,四周土地开阔,石灰沟(雅化为实惠沟)水(《水经注》中称为龙驹川水)流过村东,过去那儿还有个风景优美的“海马泉”,湿地成片;村西翻红岭儿、穿红花滩,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小康缠。元、明以来,这里属于西宁周边十三大族之一的西纳部落的管辖范围。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代,西纳部落就居住在“塞内湟水北”,即在今湟中多巴北,至今人们仍称其地为“西纳川”。南宋宁宗赵扩嘉定年间,出身于西纳部落的西纳格西和家族成员前往上都投靠成吉思汗,因而受到器重。此后,出身于该家族的第一代西纳喇嘛喜绕益西曾为护送八思巴回藏受戒之侍从,被元朝授职为宣政院院士,赐给其家族成员西纳贝本三道虎头牌,加封为宗喀万户,因而地位十分显赫。明代又先后为西纳部落封国师、禅师,赐土地、百姓、象牙印章和银印,《西宁卫志》中就说当时的西纳族有1370户,有寺,有多巴禅师,其势力范围西北与今海晏交界,北达金娥山(娘娘山),南跨湟水河,西与隆奔族接壤。正因为如此,原驻牧于湟水南岸的许多小族统归西纳部落管辖,像加尔即族、昂藏族、坡家族、隆思干族、扎扎族、班沙尔族等。这些小族的族名后来都成了地名,分别是现在的加尔即村、昂藏村、隆思干村、坡家村、扎



西宁旧街巷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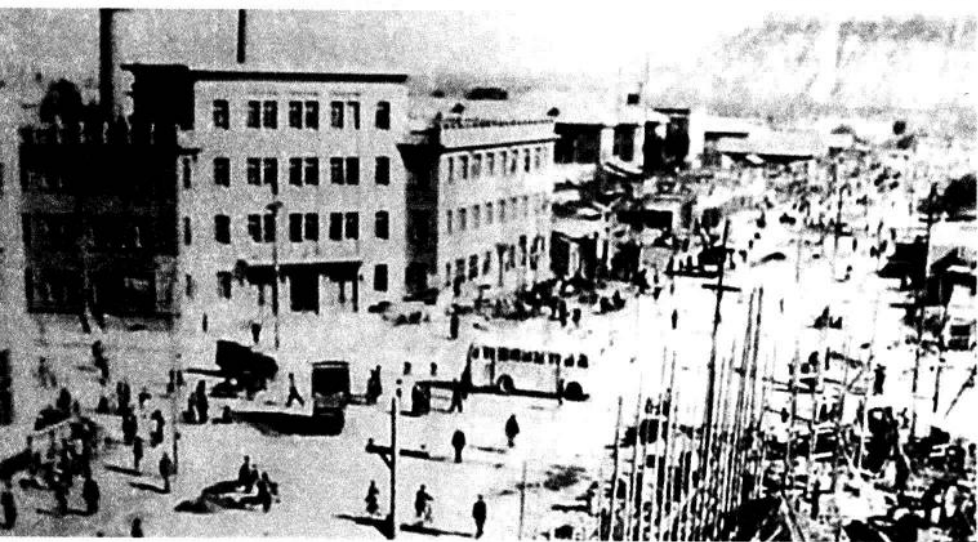


旧城堡里的学校



解放军一军干部在马步芳公馆泉眼留影，图中可见“泉眼”下流出的泉水

改建中的大十字





扎村和班沙尔村，这也就是班沙尔村名得名的来历。

元王朝被推翻后，蒙古贵族退向朔漠。到明正德四年（1509年），因内部矛盾，蒙古亦不剌、卜尔孩部率部西进，占据了青海湖地区。之后，俺答、丙兔、火洛赤部等先后拥众进入，据史称“环海尽虏矣”。从1512年进犯西宁北川起，到1541年进攻碾伯，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西宁南、北、西三川战火纷飞，明王朝驻西宁卫的指挥、总兵等武官相继战死，一时间西北防务成了明王朝心腹之患。为了加强西北防务，明穆宗朱载堉听从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的杨一清建议，下令“修筑边墙，以备夷骑，其制小于长城，以便守御”。其中一条边墙起于甘肃永登，延伸进入我省互助北山，经东閤门（今互助南门峡），出大通东峡，过西閤门（今大通南门滩），越娘娘山沙尔岭，入湟中，过喇课、拉沙、汉东、坡家，横穿班沙尔，翻鲁沙尔西山垭壑，从塔尔寺后面伸往贵德。

拉沙到暖泉沟这一段边墙的筑成阻断了蒙古贵族从西石峡、大磨石沟峡、门担峡侵扰西宁的路线，有效地保护了边墙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班沙尔族驻牧的这一块地方因地处石灰沟前往今大源的交通要道，所以边墙上设有一个高大的閤门，以供人们进出。相对于东南方不远处的鲁沙尔西山垭壑閤门（过去叫“土閤门”，此处已形成村落，叫南门村），班沙尔閤门雄伟壮观，人称“大閤门”。几十年前，老人们把班沙尔又叫作“大閤门”，随着那一代人的逝去，“大閤门”这一称呼也即将寿终正寝了。

当年，逶迤的边墙从四方坡山脊下来，过红岭儿，再爬上班沙尔台地，过台地，又下坡横跨石灰沟河、海马泉。高阜处矗立有带门楼的边墙閤门，两侧马面高耸，垛堞罗列，每当夕阳斜照，登上閤门一望，川原沟壑，尽收眼底。几百年岁月流逝，被国家正式承认为明长城一部分的青海边墙大部已倒塌殆尽，而班沙尔大閤门却能保存到现在，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作为青海明长城上遗留下来的惟一閤门实物，它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

朔屏台前汉东川 湟

中名山南佛山亦称“西元山”，

又叫朔屏台。南佛山是整座山的名字，而朔屏台只是指山顶的平台。南佛山因号称“终南之尾，西源之巅”，曾被

道家尊之为道藏之第四太元极真洞天。天下名山千千万，此山只有它的奇绝处，山顶平如削，近十里间开阔如砥，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朔屏台”。长夏期间，站在朔屏台上放眼四望，高山蝶悠闲起舞，金露梅一片金黄，照壁山如屏，金纳水似练，山风徐来，青翠满目，真令人心旷神怡。有关朔屏台的故事很多，其中包括苏道跳崖成佛、药王洞的传说、舍身崖的来历等等，由于这些轶事典故的陪衬，更使得朔屏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朔屏台正北就是汉东川。汉东川是西宁西川南侧三条小川中最西侧的一条，和东侧的甘河川、西堡川相比，它因地势低、川面宽、土地肥、产量高，当年被誉为是湟中粮食丰产区“五朵金花”之一（其他“四朵”指西川、西纳川、南川和平安）。汉东川开口处是有名的镇海堡，今天已改称“通海”了。从通海进川口的李家庄，再到川脑的占林村，20多里间，有着大大小小近20多个村庄，一路上沟渠纵横，田畴相连，“桑麻翳野”，真可说是一片锦绣天地，分属汉东镇和大才乡。川道东侧，通过马莲沟、上错隆，分别连着甘河滩镇和大源乡；川道西侧，通过押必沟，可去维新、共和镇。只有南侧，被朔屏台所隔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你驱车从川口一路南行，远望朔屏台就像一面硕大的青色屏风，横亘在前，绿色笼罩下的甘家、前沟、中沟、后沟诸沟像“屏风”前飘曳的轻纱，褶皱分明地映满眼帘。天造地设的壮观景致，真令人击节叫绝，难怪古时人们为了这块富饶的土地，曾多次兵戎相见。

“汉东”一词与明代“塞外四卫”之一的罕东卫有着直接关系，汉东川就是史书上多次出现的“大康缠”。

元末，在西宁州西北直至青海湖，南及今贵德黄河北岸的一大片区域里，有一支以游牧为生的罕东部落。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凉国公蓝玉率兰州诸卫将士征罕东，罕东部众逃散，西宁名僧三刺为书招降，散亡牧民又重聚故地放牧。洪武三十年，罕东首领锁南吉刺思入贡，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设立罕东卫，以锁南吉刺思为都督佥事。洪熙初，西宁土官李英奉诏西征安定、曲先卫，罕东卫指挥绰里加率部众随军出征。战事结束后，绰里加怕曲先卫等前来报复，请求“移近西宁以居”，因得明宣宗准许，遂在今西川一带居牧。明洪熙、宣德以后，因种种原因，大部分罕东人离开原来的牧地，越过祁连山，来到玉门、安西、敦煌一带游牧，随着牧地中心的转移，罕东卫亦移到玉门、安西附



近。罕东卫移往敦煌、安西以后，仍有约 17 300 余人留居今汉东堡一带。随着正德初年蒙古亦不剌掠西海、犯西宁，罕东部众又“散徙”，仅剩 50 余人，只得依附邻近较强大的西纳、申中部落。驰骋青海湖畔、日月山两侧数百年的罕东部落终于在岁月的研磨中消亡了，只留下了以部族名命名的“汉(罕)东堡”这一地名留传至今。

罕东部落消亡后，原辖地被笼统地称为“康缠”，地域包括今湟中西部的甘河、汉东、大才、维新、共和和盘道(折科)地区，由于地域跨度较大，人们把汉东和甘河(原坡家)称为大康缠，汉东川以西称为小康缠，在明万历年间“湟中三捷”之一的西川之战中，明军与西海蒙古交战的主战场即在大康缠，所以“康缠”一词曾多次出现在史料中：“倾巢海寇伺康缠，猛士云屯奋欲前。”“康缠边外惊尘绝，白石崖前酋影灭。”……在这次事关青海稳定的战斗中，喇卜族作为内应，为明军不但提供了情报，还阵前倒戈，立有大功。事后还受到嘉奖，“(因)前后助西川之功，敕受国师、指挥以下有差”。今汉东川拉布尔村即当年喇卜族居住地。汉东堡西南不远处的半截沟阴坡上，当年绿树冉冉，芳草萋萋，这里是有名的塔尔寺高僧闭关修行的静房。从汉东堡南行，过冯家滩，前面原野里矗立着一座古城堡，城为矩形，堡墙原高三丈(今高 6 米)。原墙根厚一丈三(今厚 3.3 米)；东西 96 米，南北 86 米，外周长 364 米。古堡原来仅有一城门，朝东，堡墙上有女墙，东北和西北角各有一马道，东马道下有水井。古城原为防备战乱而建，但后来却成了整个汉东川最早的学堂。学堂创建于 1938 年，当时全称为“文峰、大才、朔屏三乡联合中心国民学校”，城内学校自西而东分为三部分：东侧是操场；中间部分靠北是一幢二层土木结构的教学楼，楼前两排、共四座教室，两侧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伙房等；西侧是花园，种有十余株杏、李和花卉，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一样，给在那个学校读过书的人留下过美好的记忆。在上世纪那个识字人极缺的年代里，这个学校曾是湟中西部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曾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甘 河

西 宁经济开发区有个甘河工业园

区，位于西川大康缠东边，随着园区的扩建，这里已改称为甘河工业园区的东区，它西面的汉东川即将成为甘河工

业园区的西区了。甘河工业园区依托省内丰富的电能、天然气、矿产、盐湖等资源优势和原有的产业基础,已初步形成了以冶金、化工为支柱的工业体系。通过几年的整改、建设和发展,年产值已达若干亿,逐步成了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加工基地和化工产业基地。今天,“甘河”已被人们誉为是一条流金淌银的“河”,当你来到这里时,就会被那林立的厂房、宏伟的车间所震撼;园区内道路整洁,规划统一,在雄伟的拉脊山映衬下,简直就是一座宁静、平和的新城,但谁能想到几十年前,干河滩还是寒苦、贫穷的代名词,是闻名县内外的苦地方,“有女不嫁干河滩,吃馍不易吃水难”,那里癞蚂蚱有的是,庄子里光棍汉多的是。

干河滩本来是一条干涸的河滩。发源于大小石门的金纳水清流蜿蜒,但流经南佛山、照壁山夹峙的金纳峡,一出大牛圈,迎面便是砂石累累的荒滩,一下变得羸弱的金纳水就从那儿销声匿迹,直到坡家营才探出头来。20多里间,荒阜相望,涓水难存,因而留下了“干河沿”、“干河滩”、“干河”、“干河门”等让人心酸几天的地名;两侧的山湾里,也许还有些绿色,成了那年月牛羊眷顾的地方,因而留下了“帐房湾”“赶牛路湾”“大牛圈”等地名。但是,金纳水也偶有发脾气的时候,当南山里突降暴雨,咆哮的山洪就会裹挟着山柴、灌木、石块,一路耀武扬威,冲出大牛圈,横扫下游荒滩上补丁一样的旱田,再将一些带不动的乱石扔在红花滩冲击扇面上,扑向干河口外的川地,又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大水滩”的地名。大水滩就是现在的109国道旁的“新墩”,它与湟水河北岸的多巴隔岸相望。

几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可奈何地打发着贫穷而单调的岁月,也盼望着有朝一日干河能变为“甘河”,上世纪50年代初,位于沟口的干河村,翻身农民首先将自己的村名改为了“甘河”。1958年,在那个无畏的年代里,随着成百上千农民的“一声吼”,地处干河滩中段的黄鼠湾建成了水库,从那时起,干河滩上的几百亩旱田一下变成了水地,接着人们开始壅土造田,红崖河滩、前滩、中滩等荒滩很快变成了农田。又经20年的努力,青稞、白麦、燕麦等早熟而接口的农作物,因产量低而被人们渐渐淘汰,一些单产高的品种很快被引进,过去稀罕的白面馍成了家常主食。人们常说,福无双降,祸不单行。但“福”在干河滩却双降了。在人们尝到了水库好处之后不久,1969年,随着青海钢铁厂和青海第二化肥厂在那里落户、铁路专用支线的修通,干河滩的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真正使这里的人们仰起头来的,还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

自从甘河工业园区成立后,当年的红花滩已成了“广鑫大道”,“帐房湾”、“赶牛路湾”前原来歪歪扭扭的进村土路,一下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面,不但人行道、车行道、下水道、路灯、道旁绿化树一应俱全,而且有了自己的名字,分别被称为“甘东一路”、“甘东二路”……“甘东五路”;当年肩扛铧犁,驱牲畜下地耕田庄稼人,竟身着不同颜色的工作服,在一家家工厂里忙碌。只有圆山顶上的古城堡,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默默地俯瞰着脚下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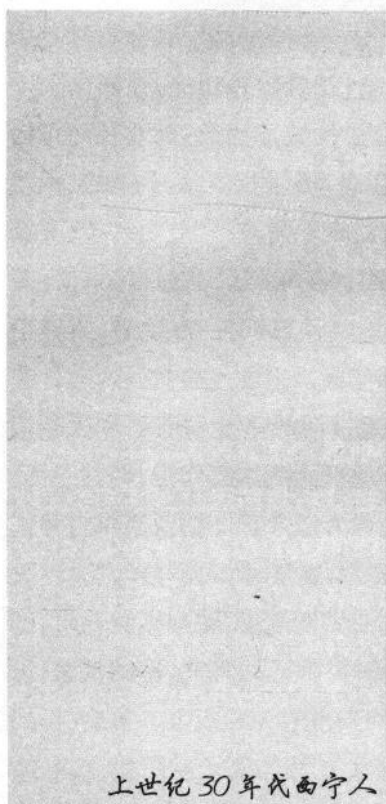
圆山古堡

甘河工业园区有个元山村,村庄得名于村口有个圆圆的山。村庄后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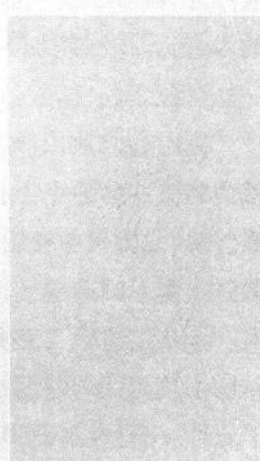
高高的大山,大山前面簸箕形的山湾里,有依山而建的几十户农家庄廓。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村上虽未出过赫赫有名的高官,但村民们依然坚信,村口圆圆的山就像一颗大印,将来总会出一个掌印的,所以人们在炫耀家乡时,又称它为“印山”,平时只叫它为“圆山尔”,左邻右堡的人们渐渐把村庄也叫“圆山尔”,因书写方便,渐渐写成了元山尔。

元山村地处妇孺皆知的苦地方干河滩,除了村后山湾里有一些山地外,村前圆山后只是一片荒凉的沙滩,从南山佛沟峡流出的金纳河,像偏偏与它作对一样,一流出大牛圈,就没了踪影,荒滩上除了长着寸把高的毛毛草外,再就是一墩一墩的馒头花,一夏天这里是长着猩红翅膀蚂蚱的天下,所以人们把这里叫做“干河滩”。干河滩里有的地方沙石裸露,寸草不生;有的地方表层有一两寸土,下面便是沙夹石,而土层稍微厚一点的地方,人们便捡石成堆,开垦成耕地。这些依土层情况而开垦的耕地形状各异,有的叫“坨坨地”,有的叫“脸曲连”,有的叫“切刀把”,有的叫“双尾巴”……它们像大地的补丁一样,零零星星撒落在荒滩上。千百年来,“有女不嫁干河滩,吃馍不易吃水难”,干河滩成了荒凉、寒苦的代名词,作为干河滩里的元山尔,依靠村后和村前那千百亩山旱地,养活了一代代衣着褴褛的村民。

19世纪下半叶,正值多灾多难的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国家内忧外患迭起,西北干戈连年。“汉回人民空亡大半”,“率皆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



上世纪 30 年代西宁人





星各残堡逃回难民”，肥沃的河湟谷地尚且如此，贫瘠的干河滩更是雪上加霜。强盗横行，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杀戮，由元山尔村民牵头，联合附近上中沟、下湾、隆寺干几个小庄，倾村出力，自带饮食，花费数月功夫，在圆山顶上筑成一座土城，土城分内外两重，因依山势构筑，外城呈梯形，南北长而东西窄；内城偏南，亦呈梯形。内城建土屋若干间，以备动乱时老弱妇孺避难；内城中有一高台，以供瞭望。高约百余米的圆山独立于干河滩上，登山一望，方圆十余里尽收眼底，北可见去多巴大道，西可俯瞰去汉东川的马莲沟、东湾、黄鼠湾各垭口，南可观察去班沙尔、红花滩的各条路径，只要一有动静，鸣锣击鼓，村民即可迅速登山躲避。据乡间先辈说，当年圆山上曾发生过几次攻守战斗，村民们的防守武器除棍棒刀矛之外，再就是从河滩里捡的石头和打碾用的碌碡。因圆山西侧陡峭，攀爬不易，当年由一些健壮的妇女守卫；其它三面，除南侧稍陡一点外，东、北两侧坡度较缓，全由男人们守护。据说当年村民们为了保护家园，免遭劫难，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无战事时，人不分老幼，不论哪村，全体出动，青壮年奋力将碌碡拉运上山，加固堡墙，妇幼则瓦缸储水，准备卵石。匪徒几次来攻打和偷袭，在震天的呐喊声中，石块横飞，碌碡乱滚，虽有村民在战斗中不幸捐躯，但城堡未破，匪徒均未占上大的便宜。事后，作战勇敢者曾被授于六品蓝翎衔，有的被西宁办事大臣豫师授予军功状，迄今族人引以为荣，将奖状保存于《家谱》之中。自从圆山上有了城堡后，人们把圆山改称为“城城子”，一直叫到如今。“城城子”攻防战成了元山人的骄傲，百年后的今天，元山村新长大的一代人每说到“城城子”当年的战事，免不了要流出一丝自矜之色，都为自己先辈的勇敢而自豪。

圆山的北侧山脚下，建有一座小而简陋的山神庙，除了一个堆满卵石的俄博和俄博前的小小神龛外，再就是围绕俄博栽的五六棵虬枝横斜的杨树。人们说，元山村山神庙供的是“黄飞虎”，黄飞虎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曾是殷纣王麾下的武成王，后被姜子牙封为“东岳泰山大齐仁圣大帝，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层地狱”，究竟如何成了护佑元山村的“山神”，不得而知。但人们总结圆山攻防战的胜利原因，自然联想到神的庇护，尤其是黄飞虎在战事中“显了灵”。于是在离山神庙不远处，选址建起了一进两院的大庙，从庙前的照壁开始，有山门，有廊坊，青砖砌成的硬山式大殿矗立在向南的台阶上，苍松遮

院，翠柏常青，成了进元山村的第一道景观。不久，就在这座大庙里，发生一件轰动青海、甚至惊动清王朝的大事。

清宣统三年夏五月的丹噶尔“黄会”起义失败后，西宁人乔寿山逃过缉捕，在元山村私塾教师卢生斌的掩护下，秘密来到村上，以图再举。两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陕西新军响应，成立了陕西军政府。在此背景下，深受鼓舞的乔寿山即联络驻防西宁大营盘的清军，准备农历十月十五日利用葛家寨庙会再举义旗，以图推翻清王朝在西宁的统治，响应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号召。宣统三年夏十月十一日，乔寿山在元山村大庙奉丹噶尔“黄会”起义首领李旺牌位，召集民众，“建纛祭旗”，后因事泄，十三日仓促率起事队伍前往葛家寨，被西宁镇总兵张定邦残酷镇压，一百多起事民众被杀于西宁西门河滩。事后，清陕甘总督长庚与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致清王朝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代奏电”中，上奏了这次“祭旗造反”的事件，这就是散见于青海地方史料中有名的“元山尔起义”。“元山尔起义”失败后，有人竟是这样总结失败原因的：都怪起事和前往的地名不对。元山尔即“原杀尔（你）”，到头还是把自己杀了；葛家寨即“个家宰”，即自己把自己宰杀了。

“元山尔起义”后47年，干河滩迎来了“大跃进”的岁月，穷则思变，上级决定，集附近几个村庄之力，在滩西的黄鼠湾修建水库。在当年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人们用两年时间，凭着一股改天换地的精神，硬是用铁锹、板镢、木制独轮车、石夯等简陋工具，削去了湾口北侧的半拉山，筑起一道数百米长的土坝，清澈的金纳河水被引进库区。接着又运土造田，水库下游万余亩荒滩被改造成了水浇地，红花滩、红崖河滩、中滩、碱滩等让人心酸的地名随之也淡出，只留在了受尽苦难的老一辈记忆里。

又是十年后，新中国迎来了建国20周年，干河滩也迎来一个改变命运的年份：1969年，上级决定在这里兴建青海钢铁厂和青海第二化肥厂，并从青藏铁路的双寨车站引出支线，直达钢铁厂厂部。荒寂千年的干河滩又一次沸腾了，圆山古堡的西面，当年健壮妇女曾镇守的那一侧山脚下，建起了高炉，一座座厂房和烟囱顿时把大滩占了个严严实实；圆山古堡的北侧、“黄飞虎”神庙的跟前，也成了由这个塔、那个塔组成的青海第二化肥厂的地盘。多少年来，荒寂的圆山古堡早已曲终人散，成了村民的耕地，而这时却成为工人们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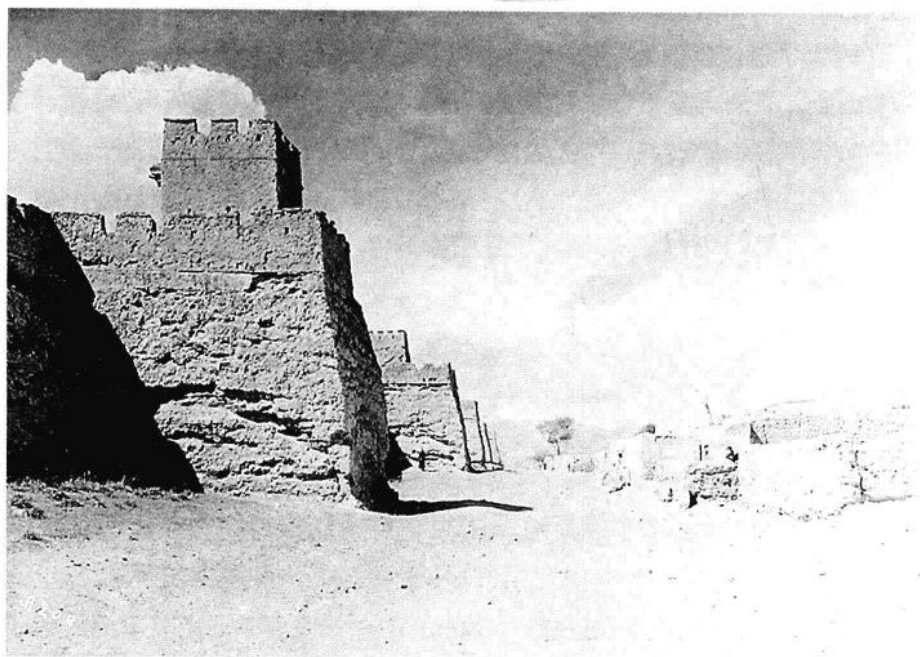


1933 年的西宁城墙



东城门外的湟中
牌坊（父子元戎
坊）

驮羊毛的骆驼队来到丹噶尔城



丹噶尔北城墙外



丹噶尔城外的驮队



暇时结伙散心的地方。尤其甘河工业园区成立后,白天,在火车的轰鸣声中,透过烟囱冒出的烟雾,古老的城堡像个年迈的老人,在默默地俯瞰着脚下的巨变。夜晚,深邃的夜空依旧,山脚下厂房里发出的桔红色火光却照亮了斑驳陆离的残墙。过去,“城城子”下野狗乱窜,是扔夭折孩子尸体的地方,而现在却人来车往,恍如白昼,转瞬之间的巨变,使人倍感岁月的沧桑;如今,这里又成为甘河工业园区的中心,雄伟整洁的厂房和办公楼、横平竖直的街衢、林荫夹道的绿化区,覆盖了当年的累累沙砾,又一条铁路岔线通过高高的桥涵,开山劈岭,沿圆山东坡,过“尕垭壑儿”,沿水滩涝,向班沙尔奔去。古老的圆山古堡上,建起了通讯发射塔,在街灯的照射下,一轮圆月、一座铁塔、一段古墙、一座孤山,在诉说着这里日新月异的巨变。拉羊皮不沾草的干河滩,竟成了年产值达若干亿的金窝窝,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

隆 思 干

甘河工业园区东区所在地原来叫作

“干河滩”,是个妇孺皆知的苦地方。在

那长约 10 多公里的河滩上,除了下端(坡家以下)土层较厚外,中上部多是荒滩。因土地苦焦,养活不了多少人,因而只有两侧的山岔里有六七个贫瘠的山村,现在那里已经改称“甘河滩”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从吮嘶啰时起,那里就是西纳(亦写作洗纳、斯纳)族的天下,说确切点,是隶属于西纳族中坡家小族和弄干小族驻牧的地方。坡家小族和弄干小族驻牧的地方已经将族名变成了地名,即今天的坡家村和隆思干村。几百年来,因人口的迁徙和住地的变迁,坡家村已经成了一个纯汉族村,而隆思干村和它对面的上中沟村至今仍是干河滩里惟一两个有藏族居住的村庄。随着老一辈人的渐渐故去,他们的后代中已很少有人会说藏语了,但他们的宅院设施、节庆民俗,仍保持着浓郁的藏民族传统。如崇拜山水,称这里的山神为“阿米隆益”,宅院中央和院墙四角树有挂着经幡的“达什角”;丧葬采用土洞墓,葬具不用棺木,而用“座儿”;每遇节庆,穿着鲜艳华丽的藏服,腰勒彩带,女的背带辫套和银饰。

隆思干村地处甘河滩中部西侧的山沟里,沟呈北南走向,深约 3 公里,沟

口北距坡家村约 1.5 公里,隔滩与下湾相望。当年沟口外因土层薄,是长着馒头花(狼毒草)的一片荒滩,但进沟却土地肥沃,沟岔平缓,遥想当年,一定是肥美的牧场,可能弄干族就是看中这里山场宽阔、牧草丰美这一点而来到这里的。现在多是浅山农田。沟脑尽头是垭壑,翻过垭壑下坡,不远处就是汉东镇。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弄干人由以畜牧为主渐渐变为以农耕为主,沟中缓坡平地已被开垦为农田,尽管他们还喜欢养牛养羊,但已退到次要地位。惟一使弄干族值得炫耀的是,就像一世西纳法王出生在西纳坡杰(即今坡家村)一样,五世当彩活佛罗桑崔臣晋美嘉措清咸丰六年(1856 年)就出生在今天的隆思干村。“当彩”在藏语中是“虎啸”的意思,又称塔泽仁波切。当彩活佛是塔尔寺活佛之一,据史料记载,上世纪初英军入侵西藏时,处境艰难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1906~1909 年间到过塔尔寺,曾得到五世当彩活佛的经济资助。不要说这件发生在百年前的事情,就连五世当彩活佛出生在隆思干村这样的大事,村上也无人提起,生长在隆思干的年轻一代,已经没人知道村上曾有过这样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拉布尔是湟中汉东镇的一个村名。

拉 布 尔

它地处大康缠川道中,与上扎扎、李家

庄毗邻,要说起村名的来历,还得从历史久远的刺卜尔族说起。据《西宁卫志》、《秦边纪略》等史料记载,刺卜尔族初居塞外(指日月山以西),明代为火洛赤所掠,万历十九年(1591 年)被经略尚书郑洛招抚,移居近边,归镇海营地方参将管辖,因而成为西宁周边十三大族中隶属西纳族的一个小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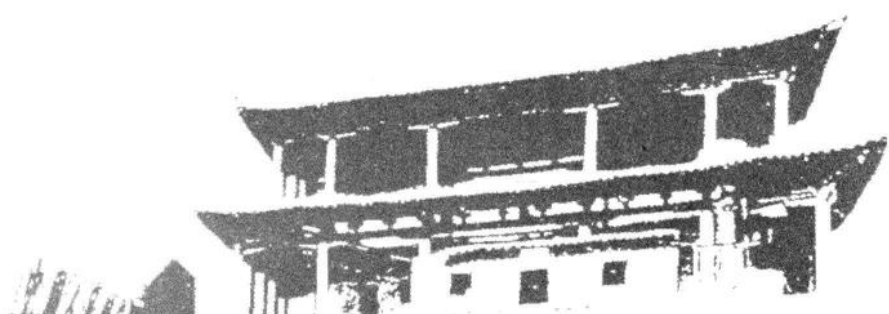
明正德四年(1509 年),蒙古亦不剌、阿尔秃厮部因反抗达延汗失败,西走青海湖一带驻牧。从正德九年起,卜尔孩、吉囊、俺答、火洛赤、永邵卜部相继进入青海。他们不但攻掠原在此驻牧的藏族部落,使“诸番逃亡,遂据有其地”,而且互相攻伐,使青海湖地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这就是青海历史上有名的长达数十年的“海寇之患”。从正德七年“海寇”抢掠西宁北川起,西川、南川、碾伯、瞿昙寺、沙塘川、燕麦川、下川口、红崖堡、杨官沟……相继遭劫。嘉靖十六年,“海寇”甚至抢掠到了西宁北山寺脚下的铁佛寺。他们“不三日而五犯内地,循环出没,此劫彼戮,岁无宁日,掠走牛马不止数万,男女不止千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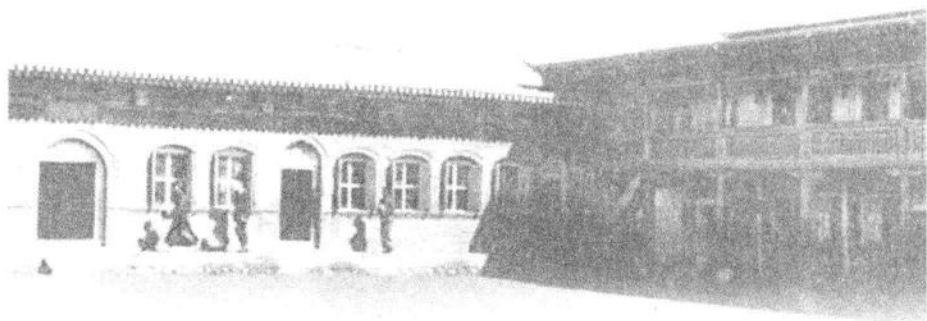
号泣声彻，山谷皆动”。从这些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湟水谷地遭劫后的悲惨景象。在这场劫难中，西宁卫指挥、总兵等相继战死，一时西北防务成了明王朝心腹之患。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军在甘肃巡抚田乐等的率领下，取得甘山、南川大捷。失败的永邵卜又纠合瓦刺他卜囊、火洛赤、真相等部，伺机再犯西川。居住在西川的西纳族、刺卜尔族获得这一消息后，迅速密报西宁卫当局，田乐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诱使火洛赤等部进入西石峡。当年十月十三日，永邵卜部倾巢而出，瓦刺他卜囊在前，火洛赤、真相后继，共15000余骑，号称二万，“连绵数十里，冲出西石峡，先图刺卜尔寨”。田乐使人密告刺卜尔族头人完卜：“若力能守，坚守十日；我必破贼；若不能守，佯合于贼”，伺机作为内应。于是，刺卜尔族合族假降了永邵卜部。据《西宁市志》记载，当时刺卜尔族中一名叫刺柱子的人暗中专门负责与明军联络，互通消息。

二十二日，战斗在今汉东川展开，明军在主将达云和柴国柱、龙膺等的率领下，包围了永邵卜等部，当战斗进行得最激烈时，(明军)密呼刺卜尔，刺卜尔族阵前倒戈，“收精壮，斩虏奔出”，从而加速了永邵卜部的溃败。西川(康缠)之战前，刺卜尔族“侦探御敌，预泄其谋，数得其力”；大战中，不避锋镝，奋勇杀敌，所以大捷后，总督李汶、巡抚田乐等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对刺卜尔族等有功部落给予破格奖赏：“合官军以御敌者，刺卜尔、大咎喱、西纳、申中等族也。(朝廷)借蕃以为藩篱，蕃仗我以为主宰，(希望)皇上特旨钦赏如国师名号，择部中之威信服众者量加一二名，以千、百户名号，以系众望，且坚其心。”后明神宗朱翊钧敕授刺卜尔族小国师、指挥等名号和官职，史载“刺卜尔(因)近得国师，诸夷羡慕”。到清乾隆时，居住在汉东川的刺卜尔族已有近300家、700多人。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刺卜尔族，住居大康缠，郡城(指西宁)西南六十五里，有庐室，相连隆奔族，共二百八十户，岁输马一百有奇”。刺卜尔族族名今已成为所居地的村名，由于人们书写的随意性，约定俗成，今已通写为“拉布尔”了。



旧 校 追 忆



西宁城乡和全国各地一样,自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办新式教育以后,当时由于缺乏公共设施,条件困难,往往多以庙宇祠堂屋舍作为教室,纷纷设立学校。

西宁第十四中学

西 宁第十四中学校址

即原来明代创建的儒学

和文庙的部分土地。西宁地处边陲,历史上战事不断,过去虽有东汉赵宽“教诲后生”、南凉史嵩“开庠序,训胄子”的零星记载,但真正开创官办教育,是从明代史昭开始的,所以后世称赞他“芹藻泮林谁创始,千载同仰史昭贤”。史昭是安徽合肥人,明宣德年间,因政绩卓著而升任右都督,1427年自凉州移镇西宁。他认为,西宁是河西巨卫,山谷险阻,风气亢然,必须实行“教先于政”的政策,才有利于地方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来宁头一年,他即上奏“请建孔庙,开学校如中土(中原)”。明宣宗朱瞻基从其请,批准在西宁建文庙,修儒学。1428年,文庙、儒学修建工程在史昭的主持下开工了,从此,“孤悬天末”的西宁卫有了“供生员读书”之地,青海教育从此翻开了重要的一页。开办新式教育后,

西宁道尹公署将原设在“报恩生祠”(今省政府址)的兴文两等小学校迁入儒学,几经演变,成了今天的西宁第十四中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西宁这块土地上,办学教育历史最长的,非这里莫属。

西宁第一中学现在的校址基本上是

西宁第一中学

原来的广福观,但此前校址却在西侧的

统领寺。广福观,明朝会宁伯李英筹建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祀北极真武之神。永乐二十二年,李英陪永乐皇帝征朔漠,在回师榆林途中,永乐皇帝朱棣以名马宝刀赐李英,并诏许在西宁建真武庙。真武庙建成时,永乐皇帝已驾崩,由宣德皇帝赐观额,名为“广福观”。清同治十三年,西宁府知府龙锡庆在广福观西侧购置民房,建起“北义学”。1924年,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的马麒捐资维修了北义学,并将广福观屋舍亦扩建为校舍,以北洋政府颁给自己的“锐威将军”名号为校名,改称“锐威学校”。解放后,更名为观门街小学。后来,观门街小学与宁市第一中学对调校址,观门街小学迁往统领寺。

西宁第五中学校址基本上是原来的

西宁第五中学

清军前营三圣庙。清王朝灭亡后的第三

年(1914年),当局将清军前营三圣庙拨给原设在印心寺(今南大街省劳改局址)的蒙番学校,随之学校从印心寺迁往今五中操场一带。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学校先后曾易名为宁海蒙番师范学校、青海筹边学校、青海省立第一中学、民办文峰中学等。

西宁市西关街小学

西宁市西关街小学

原校址(指因修建中

心广场而被拆迁的校址)是海神庙。清光绪三年(1877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因西宁久旱,“官民无祈雨之所”的缘故,在西门外购地修建海神庙,光绪皇



帝于当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曾亲颁“威靖河湟”匾额。海神庙建成 34 年后,清王朝土崩瓦解,无人照管的海神庙斑驳陆离,一片荒芜。1933 年,原省立一中蒙藏班迁入海神庙,成立了青海蒙藏师范学校。后该学校迁往大通后,西宁县在这里设立因利乡小学。……解放后,定名为西宁市西关街小学。

西宁市观门街小学

西宁市观门街小学现

在的校址是原来的统领

寺(原名昭忠祠)。观门街小学原来确实在广福观,名实相符,后与西宁市第一中学对调校址,才迁往统领寺。说起统领寺,还的从刘锦棠说起。在清末同治年间的社会动乱中,清军北路统帅刘松山在攻打宁夏金积堡时丧身,刘松山之侄刘锦棠被钦差大臣左宗棠以三品卿衔,任命为北路统帅,阵前戴孝挂职。同治十一年,刘锦棠在今平安地区经 50 余战,历时两月多攻占西宁。后在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等的举荐下,湘军统领刘锦棠因“敏锐善战,谋勇兼优”,被任命为分巡抚治西宁道。刘锦棠坐镇西宁后,为纪念其叔刘松山及历次战斗中丧生的湘军士卒,以“昭国典,励忠节”,1872 年就在西宁后街(今兴隆巷)筹建祠堂。同治十三年祠堂建成,定名“昭忠祠”,因是湘军统领刘锦棠所筹建,老百姓俗称其为“统领寺”。开办新式教育以后,青海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在这里设立,几经变迁,1958 年 8 月,定名为西宁第一中学。后与东侧的观门街小学对调校址,观门街小学迁入“统领寺”。

西宁市南大街小学

西宁市南大街小学校址

是原来的南古寺。清乾隆四

十九年(1783 年),博学多才的冷文炜出任西宁知县,他认为西宁蛮荒之地,要“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而讲学既无专地,安望学业之相与有成?”于是,他选中西西南古寺旧址,筹建书院。乾隆五十年,在他的首倡下,官民捐钱 30 万,用工 4 000,历时两月而竣工,定名为“湟中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开办新式教育以后,湟中书院改为西宁县立高等小学堂,1942 年,更名为西宁南大街小学。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

校址是原清西宁府经

历署所在地。民国二年(1913年),西宁县警佐明璋(湖北人)与毕业于湖北女校的妻子黄淑兰在官井儿(今民主街)借民房创办“西宁县女子小学”,这是我省设立最早的女子小学。民国五年(1916年)迁至府门街(今文化街)百子宫与西宁巡警局之间的原经历署废地,并购置部分民宅作为校址,改名西宁县立两级小学校。民国八年(1919年),增设简师班和初中班,1929年青海建省后,曾改名“青海省女子师范学校”。

西宁市解放路小学

西宁市解放路小学

学校址是原来的药

王宫。药王宫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早在清乾隆年间修成的《西宁府新志》中已记载有药王宫。1928年,当时的西宁区行政长官林竞鉴于西宁卫生条件落后,尚无医院设施的现状,积极筹建平民医院。也许是药王宫与治病救人的卫生事业有点关系的缘故吧,当时平民医院就设在药王宫。青海建省后,平民医院改为省立中山医院,迁往北大街,1946年,在这儿设立了护士培训班,1948年改为省高级护士学校。解放后,学校与解放军一军卫校合并,改名为青海省军区卫校(省卫生学校的前身),迁往北门外。1964年3月,政府在这儿创办了解放路小学。

西宁市玉井巷小学校址

西宁市玉井巷小学

是原来的葆宁寺。清初,江

宁(今南京)和尚旭止来西宁建寺,在得到地方官员的允许后,在城内北城墙根建起寺院,定名“葆宁寺”。经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上世纪初,寺院已破旧不堪。1929年青海建省,西(宁)互(助)地方法院在这儿设立。解放后,法院迁往别处,1965年3月,政府从观门街、解放路、大同街三所小学中抽调部分师资,在这儿建起了玉井巷小学。



西宁市大同街小学

西宁市大同街小学校址

基本上是原来的清军右营三

圣庙。清王朝灭亡后,作为官产,1921年,经当局改建,在这儿设立了甘肃省第四师范附属小学(当时青海省尚未建省)。1929年青海建省后,又改为青海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名几经变换,即今天的大同街小学(校院内右营三圣庙前香厅作为古迹,至今仍在)。

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

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

校址是清代的回民社学

旧址。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西宁道金事杨应琚在知府刘弘绪等的支持下,在回族聚居的西宁东关创办了回民社学。在推行新式教育的浪潮中,回民社学改为西宁县立高等小学。为了加快本民族教育的发展,时任蒙番宣慰使的马麒改为“东关同仁小学”,聘请当时社会名流到校任教。1931年,随着青海回族促进会影响的扩大,又更名为会立第三高级小学,1942年又改称昆仑中学附设第三小学。解放后,曾一度命名为西宁市第五完全小学,从1969年起,正式命名为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

西宁市保育院

西宁市保育院院址是清代的五

峰书院旧址。清同治末年,分巡抚

治西宁道张宗翰在办理西宁事务大臣豫师、西宁知府邓承伟的支持下,筹银13 000多两,在西宁西大街创办了“五峰书院”。“匡庐岳麓岂寻常,此地重开六艺堂”,在陇右享有极高的声誉。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后,五峰书院改为西宁府中学堂,是当时西宁地区最高的学府。1913年后,先后曾称西宁七属两等小学堂、海东师范学校、甘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青海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简易师范学校,直到解放后,改设为牧区弟子保育院,后易名西宁市保育院。

西宁市五四大街

小学校址是清代“安

西堡”旧址。清同治年间,湘军统领刘锦棠攻占西宁后,在这三川要隘之地筹建大本营。青海平定后,清光绪四年(1878年),统领安西军提督喻胜荣在原址督工筑成长宽各两里的城堡,作为驻防之地,定名“安西堡”,而老百姓却把它叫作“大营盘”。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这儿设立了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后因种种原因,1940年学校被国民党教育部接管,更名为国立西宁师范学校,后又改称国立西宁边疆师范学校。解放后,一度曾称为“青海师范”,并继续办附小部,1964年,定名为西宁市五四大街小学。

在西宁东关同仁

小学校长邵鸿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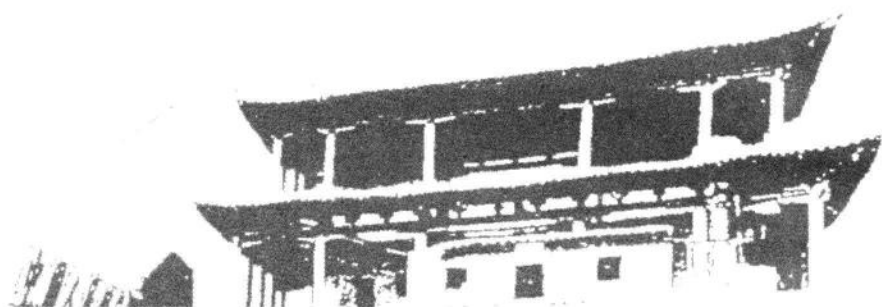
建议下,1922年,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创立了“宁海回族教育促进会”;1929年国民军进入青海后,国民军师长、河北保定回族安树德改宁海回族教育促进会为“青海回族教育促进会”,并自任会长,不久即购买东关大寺西侧曹姓当铺及祁土司牌坊一带房地产,兴建了会址楼,内设回族女子小学。后回族师资讲习所,会立初级中学曾先后设在这里。1945年改名为昆仑中学附设第二女子小学,1952年改为东关回族女子小学。

西宁市五四大街小学

东关回族女子小学



青海省第二中学校门牌坊
(今西宁十四中)



历史名人



先秦时羌人首领，名爰剑，曾为秦国奴

无弋爰剑

隶，因羌语称“奴隶”为“无弋”，故称为无弋

爰剑。公元前 476 年，爰剑乘机逃脱，“亡入河湟间”，羌人因爰剑在追逃中被火焚不死，并把在秦国学到的农耕技术教给他们，遂拥戴其为首领。爰剑的后代“多娶妻妇，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

西汉军事将领，因战功累累，受封骠骑将

霍去病

军、冠军侯。汉元狩二年，一代英主汉武帝为

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断其右臂”，以打通河西走廊，开辟西域，派霍去病出兵河西。同年，过临津渡，进入湟水流域。后来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在今西宁地区建立军事据点——西平亭，“于是小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焉”。

西汉军事将领，因功受封营平侯。汉宣帝

赵充国

神爵二年，赵充国受命率吏卒万人来河湟地

区“垦殖羌人故田”。他三上《屯田奏》，计划从临羌到浩门垦田二千顷，开沟渠，兴建驿舍，修桥梁，治理湟峡以西道路 70 余处，为河湟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缅想汉营平，千载称其贤”，人们怀念他开发河湟的功绩。



秃发三兄弟

秃发三兄弟中的秃发乌孤原是后

凉吕光手下的河西都统，后在河湟地区建立了南凉地方政权。原属漠北鲜卑族拓跋部。晋太元二十年，秃发乌孤率部翻越廉川大山，进军湟水谷地，击乙弗、袭折掘，开疆河外，雄踞河湟，终于建立了以乐都、西宁为中心的南凉政权。南凉统治者为了炫耀武力，曾在今西宁杨家寨修筑阅兵台，并以三弟秃发傉檀儿子的名字命名为“虎台”。在强邻四逼的环境里，南凉抗西秦，战后凉，虽立国不易，但败在穷兵黩武的秃发傉檀手上，立国仅 18 年而已。

源贺

西平人，南凉秃发傉檀子，名破羌。南凉灭亡

后，投奔北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奇其才，说：“朕与卿同源，可为源氏”，于是替他改名为源贺，太延年间因功受封西平公。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与源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西宁府新志》中赞曰“破羌以亡国之俘，改氏分茅，为中朝元宰，其正色固推孝文帝嗣位一事，至今犹有生气”。后官至太尉，死后谥“宣王”。

唃廝囉

青海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本名欺南凌

温，号瑕萨(997~1065 年)，是吐蕃雅隆觉阿王系后裔。据《宋史》记载，他“绪出赞普之后，生于高昌磨榆国”，12 岁时，被在高昌经商的河州吐蕃商人何郎业贤发现，带到河湟地区。其特殊的身份很快就引起了吐蕃各部落的关注，不久，便被宗哥(今平安)僧人李立遵等拥立为王。离开邈川(今乐都)西进鄯城，改称鄯城为“青唐城”，建立了吐蕃政权。唃廝囉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在邻有强敌、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湟水谷地创建了一个与西夏抗衡的地方政权，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藏族地区传说中一个英雄人物，得以入选《历代藏族名人传》。也正由于他的威望，在他死后青唐政权以他的名字作为国名，世称“唃廝囉”。

宗 教改革家(1357~1419年),经名罗桑札巴,

宗喀巴

被尊称为“第二佛陀”,出生于青海湟中县。他的

出生地藏语叫做“宗喀”,所以称为宗喀巴,意为宗喀地方的人。他幼年出家为僧,16岁到西藏求法学经,拜各教派高僧为师,吸取各家之长,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书,成为一个造诣很深的佛教学者。为重新振兴佛法,宗喀巴周游四方,讲经传法,吸收门徒,并提出宗教改革的主张。在各教派中,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一派。但由于宗喀巴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恢复了佛教的权威及其号召力,既有僧侣广泛的拥戴,又得到中央王朝的尊崇和支持,所以格鲁派后来者居上,成为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141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在西藏拉萨甘丹寺圆寂,为纪念,此日即定为“燃灯节”。

明 代军事将领,安徽合肥人。宣德二年(1427

史昭

年)以总兵官的身份自凉州移镇西宁,在任期

间,他认为西宁是河西巨卫,山谷险固,风气亢然,必须实行“教先于政”的政策,才有利于地方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为此,他上奏“请建孔庙,开学校,举屯田”,请设学校如中土。明宣宗朱瞻基从其请,批准在西宁建文庙,修儒学。1428年,文庙、儒学修建工程在史昭的主持下开工,从此,为“孤悬天末”的青海教育翻开了重要的一页。“芹藻泮林谁创始,千载同仰史昭贤”,他创办西宁官办教育的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明 朝军事将领,今大通景阳人。明万历年间,

柴国柱

曾任西宁卫中军守备,史载在西川之战中“壮勇

足智,善骑射,勇冠三军”,升任都指挥僉事。后来,柴国柱因西川之战,又因石灰关之役,“以孤族击猖狂之寇,中矢带镞力战,斩二十一级,名闻京师”,而擢升总兵官,镇守陕西。后又加右都督,移镇沈阳。1627年,一代名将柴国柱不幸病逝,消息传至京师,天启帝朱由校下诏给“故总兵祭葬”。6月仪式在西宁隆重举行,后归葬金娥山麓的今大通清水沟。



罗卜藏丹津

清代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首领，固

始汗之孙。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承袭其父达什巴图尔的亲王爵位，成为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贵族的最高首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令罗卜藏丹津与右翼贝勒察罕丹津、达颜等，同领青海和硕特蒙古右翼，以平衡青海蒙古各派势力，使罗卜藏丹津深感不快。康熙皇帝去世后，镇守西宁节制各路进藏军队的皇十四子允禵，离开西宁回京奔丧。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乘机召集青海厄鲁特蒙古各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起兵反清。清廷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调兵平定叛乱，罗卜藏丹津失败后逃往新疆准噶尔。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在新疆平定准噶尔攻占伊犁时，罗卜藏丹津被俘，清廷免去他的死罪，将他软禁于北京。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叛乱，严重破坏了青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力发展，给青海厄鲁特蒙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杨应琚

清代著名地方官员，字佩之，号松门，辽海

汉军正白旗人。他两度任西宁最高地方官员，

在任期间，修史撰志，倡办教育，不遗余力建贡院，修儒学，创义学，足迹遍及西宁府所属县、卫、所。为了青海的开发，他在近边要地设营堡，建桥梁，修社仓，应军需，解民困，开创社会公益事业，为西宁地区的开发倾注了不少心血。尤其其他鉴于西宁“边地质野，文献无征，屡经兵火、典籍云亡”的实际，利用公暇，焚膏继晷，历时一年多，终于写成了30万字的《西宁府新志》，弥补了西陲文献无征的缺憾。《西宁府新志》上溯秦汉，下迄清乾隆十二年间西宁府所属县、卫、所历代大事及有关文献，旁及明塞外四卫及青海、西藏。在“清初众多方志中，不愧为名作之选”。

左宗棠

字季高，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于湖

南湘阴左家垅。左宗棠被誉为清季“中兴名

臣”，过去，人们就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事，指责较多，但他用兵新疆，反击

阿古柏入侵,认为“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与张骞、班超并驾齐驱。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可见对其评价之高。左宗棠幼时家境贫寒,拿他自己的话说“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20多岁时,虽因家贫依居妻家,以教书、种田为生,却书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张挂在门厅。夫人周怡端曾以“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的诗句来安慰他。1851年1月,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举事,这时的左宗棠已到不惑之年,才受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参赞军务,真可谓是“大器晚成”。之后,受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起,将建国十三年、略地十一省的太平军结束在嘉应州的黄沙嶂,因而官封一等恪靖伯。

西北边疆本来是清王朝的军事要区,由于东南战事连年,陕甘兵卒抽调出征,地方驻守兵力严重不足,粮饷短缺,加之爆发了以白彦虎为首的农民起义,“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各省自顾不暇。就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同治三年,喀什噶尔境外的小国浩罕有一个名叫阿古柏的竟趁新疆边境空虚,聚众从安集延窜入新疆,攻陷了南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占据了天山南路,并自称“毕条勒特汗”,进而入侵天山北路,意欲夺取伊犁河谷。至此,南至和阗以南,北至玛纳斯、呼图壁,东到吐鲁番、诺羌,西至边境的一大块国土,竟沦入阿古柏统治之下。阿古柏在占领区开征地税,要求人们按安集延“光顶圆领”的习俗,改变服装。陕甘烽火连天,国势危如累卵,俄军也乘机寻找借口,侵占北疆伊犁河谷。新疆眼看不保,朝廷内又有“海防”、“塞防”之争,当时竟有人认为新疆“地处僻远,师行困难,内地经十多年战乱,元气大伤,筹款不易,暂以度外置之”。左宗棠则力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同治五年十一月,在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间,调任陕甘总督。同治六年二月,左宗棠督军从汉口出发北上,兵分三路入陕,力挽西北危局。就像他在《书牍》中曾说“欲图数十年之安,不争一时战胜攻取之利”,经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战,平定了陕甘,在“新复之地,发牛种赈粮”,尽力做好善后恢复工作,为集中军力进疆解除了后顾之忧。并命自泾州至玉门夹道种柳,使之“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左公柳”。6年后的光绪五年,杨昌潜应左宗棠之约西行,沿途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触景生情,曾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进疆路途遥远,粮糈运输困难,加之清军所控地盘只有经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到济木萨和塔尔巴哈台这狭长一线,其余地方都在阿古柏控制之下。清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驻节肃州(今酒泉),督办军务。他采取缓进速战的方略,决定首夺乌鲁木齐。六月二十九日,刘锦棠率军攻取乌城,随后在金顺和伊犁将军荣全的配合下,三军会攻,到九月二十一日收复新疆北路。

阿古柏失去乌鲁木齐后,集中兵力坐镇托克逊。为把住南疆大门吐鲁番,召集余部死守达坂城。为彻底消灭阿古柏入侵者,左宗棠迅即调兵出关增援,光绪三年三月初一,刘锦棠进军达坂城,张曜从哈密西进屯盐池,徐占彪率军出巴里坤。初七日,攻克达坂城;同日,张徐两军攻占七克滕木;十三日,会师吐鲁番,“乘敌不备,殄尽守城贼寇”,星夜兼程,攻取托克逊。大兵压境,风声鹤唳,阿古柏在喀喇沙尔授命爱伊德尔呼里代表自己,表示愿献南疆八城乞降。乞降之事未果,四月初十,阿古柏逃往库尔勒服毒自杀。刘锦棠等挥军越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分兵两路,攻取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和阗。至此,南疆八城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新疆南北两路收复后,只剩伊犁尚在俄罗斯占领之下。当年俄军初入伊犁,曾声明: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收复后,俄方却毫无归还伊犁之意。光绪六年正月,清政府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与俄方磋商收回伊犁;四月,左宗棠不顾年已六十九岁的高龄,正像《三国演义》中魏将庞德抬棺决死战一样,车载着棺材,率军离肃州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五月,驻军哈密城西凤凰台,并决定兵分三路,进驻库拉克拉乌苏、精河,做好了收复伊犁的军事准备。正是文有曾纪泽折冲之才,武有左宗棠干城之勇,清政府才以偿还俄罗斯九百万卢布“代管费”的代价,收回了伊犁。这是晚清外交史上仅有的一次胜利,正如左宗棠死后,有人在挽联中所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左宗棠死后,清廷谥‘文襄’)”。

早在同治十一年九月,正当平定西宁的战事进行时,左宗棠就在安定(今定西)大营命三品衔刘锦棠戡定湟中后,“凡乱前所毁学校、书院、义塾等,均

需第次重建”；冬，左宗棠知道西宁自经“河湟事变”后水利失修，田园荒芜，曾命西宁各厅县详细调查境内荒废渠道，准备夫料，以待来年春实施兴修。据《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介绍，在他的关注下，“修复了府城（西宁府）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约一里许，创修碾伯（碾伯时属西宁府管辖）栖鸾堡一带沟渠20公里。至于小峡外曹家堡一带，兵燹而后，烟户萧条，渠道虽废，就没有人力修复”。西宁战事结束后，他在兰州曾书写对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表达了自己欣喜之情，并为西宁昭忠祠题写楹联“黄河东注，湟水南来，任浊浪纵横百折，终须趋巨海；胡笳勿悲，羌笛休怨，认灵旗恍惚千载，犹闻颂大昭”。还应请求，为西宁小峡风神祠书写一联“律协静条鸣，试看豹驾螭骖，作雨成霖，都承清景；化行知草偃，听罢胡笳羌笛，阜财解愠，更谱虞琴”。进军新疆期间，虽南北疆烽火连天，但左宗棠认为，没有河西走廊，不能保新疆，也不易保陕甘；没有宁灵（指宁夏）和河湟，也不能保新疆。所以在新疆用兵时，为防御敌兵溃散时窜向敦煌，进入青海，做了积极的防范准备。

西北大局平定后，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在西宁小峡口南北两岸各修建一关，作为平乱后的一组纪念建筑物，伫立在西宁东的军事要地上。两关修建工程竣工后，豫师特派专人去左宗棠处请求写篇《记》，以记其事，他不辞辛劳，欣然命笔，写下了已收入《西宁府续志》中的《西宁小峡河新筑南北两关记》。左宗棠在《记》中说“西宁城东，悬崖陡壁，对立千仞，湟水中流，霆惊箭激，山径狭隘。……守者得此，以一当十；攻者逾此而入，则西宁不可复守……。光绪三年，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公于河南北筑两关扼之，屹然相向，形势险固。南关曰武定之关，志兵威也；北关曰德安之关，饬吏治也”。清末西宁诗人张思宪曾以《石峡清风》为题，写下了有名的一首七绝诗“石峡新修武定关，东西流水南北山；行人莫嫌征尘污，两袖清风自往还”。我们可以想象，小峡两峰高耸，苍崖苔染；关楼屹立，一水中流。是一幅多么雄浑的边塞图啊！上世纪20年代初陇上名士周子扬经过小峡时，见到“两岸有关，北完南圯，路左有左文襄所撰《创修南北二关碑记》。今‘德安’独存，而‘武定’半圯，岂乙未再变时所毁耶？”可惜90年后，这里不要说“半圯”的武定关痕迹无存，就连德安关也灰飞烟灭，更不要说左文襄公所撰的《创修南北二关碑记》了。



左宗棠



马 麒



马步芳

朱 绣



周希武



王治宾



马 麒

青海近代史上著名人物（1869 ~ 1931

年）。从小跟着父亲马海晏，在董福祥军中任哨官，因在平定“河湟事件”中屡立战功，曾获“六品军功牌”。1900年奉调入京，扈驾途中西太后传旨任旗官，后经马安良提拔，任循化营参将。先后曾任帮统、副将、提督銜总兵、宁海军总统、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青海省主席等诸多官职。尽管有“残暴掠夺的一面”，但他在任期间，禁种鸦片，倡办教育，尤其在1919年通电反对西姆拉会议，派遣朱绣出使西藏等重大决策，爱国守土，是不可否认的庶政成绩。

黎 丹

字 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1865 ~

1938年），民国时期活跃在西北政坛上近20年。期间，致力于青海的经营开发，屡出良策，在青海建省时，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维护西藏主权，禁绝鸦片，保护人民免遭兵燹之灾等方面均做出过卓越贡献。特别是忧于西北文化底蕴之薄弱，一生致力于西北文化教育事业，还将毕生收藏图书4万余册，悉数捐赠青海图书馆，其中有许多海内孤本，对现今从事文史研究者帮助甚大。在兴办青海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方面业绩更是独树一帜。其门下多出名噪一时的政治家、教育家及杰出翻译家，如朱绣、杨质夫等。

朱 绣

字 锦屏，青海湟源县人（1887 ~ 1928

年），近代青海名士，一生积极倡导创办实业，兴办文化教育，树绩良多。西藏问题是民国初年西北边陲史上的一件大事。1913 ~ 1914年间，中英双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英方单方面拟定了一个《西姆拉条约》，划分出内、外藏，要求西藏独立，中国不设官，不驻兵。依此，不仅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青海、新疆、云南、四川大片土地也会被划入

外藏而丧失。民国八年,北洋政府同意入藏谈判,青海方面以朱绣为入藏特使,前往西藏与达赖喇嘛谈判,最后敦促达赖坚持爱国立场,主持正义,劝息兵事。朱绣等几经努力,最终与达赖达成协议,促成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他为维护民族团结、安定边陲做出了贡献。著有《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海藏纪行》和《拉萨见闻录》等书稿。1928年7月,朱绣在民和老鸦峡莲花台遇刺身亡。

字子扬,甘肃天水人(1885~1928年),

周希武

清末民初杰出的文化名士。自幼颖悟异常,

深受学使叶菊裳器重。1906年考入甘肃武备学堂,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得在甘肃都督府供职的湘潭人士黎丹赏识,推荐给甘肃省督张广建,办理公署公文。民国三年(1914年),为解决玉树二十五族的归属问题,周希武毅然前往玉树,作勘界调查,后著成《玉树土司调查记》(后称《玉树调查记》)一书,书分上、下二卷,不仅为人们认识玉树提供了翔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玉树的神秘面纱,还驳斥了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准备承认玉树地区为外藏的荒唐行径。返回西宁后,在黎丹的推荐下,成为马麒智囊团的一员。民国十七年(1928年),因国民军入青问题,马麒派周希武、朱绣等前往兰州,行至民和老鸦峡莲花台罹难,年仅44岁。

字子香(1902~1975年),国民党军高级

马步芳

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甘肃河州人。早年

随父马麒投西北军,从出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少校参谋起,曾历任营、团、旅、师、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是民国时期中国西北本地人中,势力最强、统治地区最广、影响最大、官阶最高的边疆大吏。曾派兵阻止英国经西藏向内地渗入的青藏战争,参与抗日战争,后又积极“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反共内战。1949年8月兰州解放前夕逃往重庆,10月即被国民政府以擅离职守之名给予撤职处分。之后在埃及开罗购置产业,学经做寓公,1975年病故于沙特阿拉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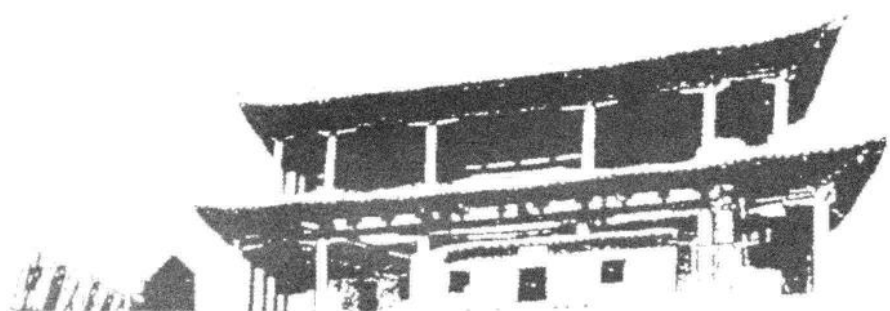


王洛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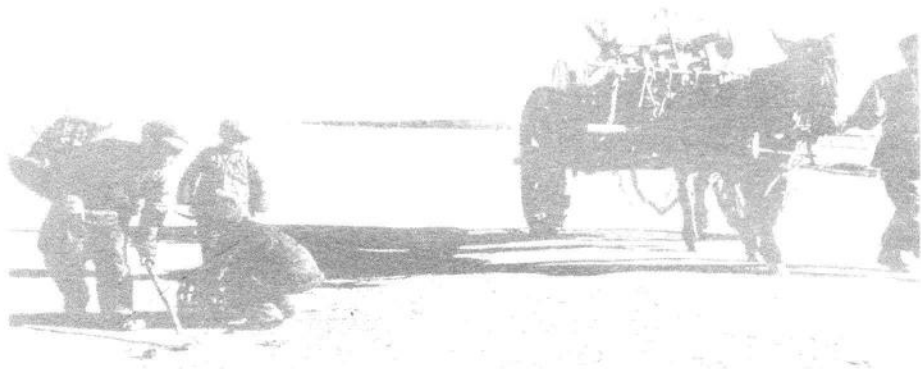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艺术家，北京人（1913～1996

年），193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系。1937年11月在山西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5月在兰州参加“西北戏剧团”，后进入西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经典作品。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随军进入新疆。他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毅然奔赴抗日前线，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为传播和发展祖国的西部民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中国的西部民歌不仅流传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被选录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已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沧 桑 留 迹



吃人命

吃人命是过去民间解决人命案的一种方式，

现在也许听也没听说过，也是那时候一种命案“私了”的形式。很小的时候，我曾遇上过一次。据说邻村一家的公公和儿媳妇关系一直很不好。有一天早晨，公公趁儿媳妇到井边挑水，就躲在门道一侧，没防备的儿媳妇刚迈进大门，就被公公突然用榔头（一种打土坷垃的农具）打死。娘家人闻讯，真如晴天霹雳，就招呼族人前来“吃人命”。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沿着红坡上的山路，跑到二里外的邻村去看热闹。刚转过邻村西面的山梁，远远就看见村里场（打麦场）边孤零零的一棵歪脖子大树上，吊着一个被反剪双手的人。跑近一看，那人的脚尖还挨着地，痛苦地耷拉着头。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打死儿媳妇的凶手。旁边的地上扣着那年月用荆条编的粪箱（拉粪土用的农具），透过粪箱缝隙，可以看见挺在地上的儿媳妇尸体，几支带叶的杨树枝苦在头部，看不清死者的面容。死者家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厨房里烟熏火燎，炕头上、院子里很多人在吃饭。有人还在招呼外面看热闹的人们也去吃，有人在喊：“今天就是要把他家吃光挖尽！”在过去吃喝非常紧缺的年月里，这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报复方式。屈死的一方尽量招呼自己的族人，甚至不太相识的路人，都去凶手法大吃大喝，任意挥霍一顿，让他们油尽粮断，以求通过这种让另一方付出巨大经济损失的方式，取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达到泄愤和报复的目的。后来才知道，这种处理命案的方式就叫“吃人命”。

现在有了打火机，火柴也渐渐退出了市

柴皮子

场。在过去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岁月里，火柴也是一件罕见之物。也许最初曾是进

口之货，人们把它叫作“洋火”，有些偏远地方的老人至今仍把火柴叫作“洋火”。那时，人们家中用火，冬日常常从炕洞里扒出余火，手拨口吹，引燃柴草；夏日只得在灶火里留下火种。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前期，“柴皮子”还是家中引火之物。制作柴皮子也是一项技术活：首先选取一段没结节的杨木（因杨木质软而材料易找），然后一手扶木，另一手反手握住磨得飞快的匕首，由下而上削取。在熟练者手中，洁白而薄的柴皮子像如今的刀削面，长约五六寸，片片飞出，一会儿即可削出一堆。然后捋齐柴皮子，将一端在熔化的硫磺中一蘸，硫磺遇火星极易燃烧，于是柴皮子就成了那年月引火的最好材料。那时候，常见抽烟人一手端水烟壶，一手以柴皮子在灯盏上引火抽烟，显得悠闲而自在。

青海的冬天很冷，农村家家都盘有火炕，

扒炕灰

而那时城市里多用板炕，炕面用木板制作。

火炕因盘炕的材料不同，分石板炕和打泥炕两种。石板炕的炕面用石板拼盖，表面上抹草泥；打泥炕先用木质柔韧的枝干棚盖，如用榆树枝干，然后在抹长草泥，敲打瓷实。再用一种叫作“鼻邈邈”的野草叶使劲擦拭炕面，直到炕面呈光滑的墨绿色，不但好看，而且又不易开裂。当年农村的火炕除寒冬取暖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解决肥源问题，利用炕灰作为肥料种地。土炕里空间较大，人们在里面垫上厚厚的一层干土，干土上再铺垫麦衣、草秸、牛马粪等易燃物，送进火种让其自燃烘烤炕面，供人取暖，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围定亲人热炕上坐，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送土、燃料和出烟的开口在屋外，叫炕洞门，由于长年烟熏火燎，黑乎乎地，特难看。燃烧过的灰烬有一定肥力，也许受烟窜火烤的原因吧，老祖先们说，火炕里面垫的土也有肥力，这种土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炕灰”。垫在牲畜圈里的土和厕所里的叫“家肥”，在过去没有化肥、广种薄收的年月里，这点肥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炕灰是农家肥中的“主力军”。



在严寒的冬日里，每过五六天，人们就要将炕洞里的土换一遍。换出的土作为肥料，要送到田里去。换土这种工序，就叫“扒炕灰”，扒炕灰是一种很脏很累的农活。第一步，先用火铁锨将炕灰上面没烧尽的余火扒出来，放到一边，留作火种，然后把炕灰掏出来。尚有余温的炕灰土质细碎，尘土乱飞，人们为了掏出它，佝偻着身子，灰头土脸地用铁锨、脑钩（一种长把、像宽刃锄头样的农具，可以勾出炕里深处的土）扒，再把它用背斗背到庄廓外的粪场里。第二步，要从土场把打碎的干土背回，再填进炕洞里。第三步，在新土上铺垫燃料，随后送进火种。至此“扒炕灰”的活儿才算完成，但这时的人也变成了一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明丢丢地发亮。炕灰里究竟有多少肥力，没有人测算过，这种“黄土搬家”式的苦累活，在河湟谷地一直坚持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红崖滑坡

地质学上的名词“滑坡”是个新鲜词儿，而

过去青海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山走了”。但史料中却文绉绉地称为“崩”，如《西宁府续志》中就记载“清光绪元年元旦，阴山崩，水渠壅塞，张（张家湾）、旱（汉庄）、彭（彭家寨）、刘（刘家寨）、苏河（苏家河湾）五处数千亩沃土，几作石田”，可见灾难之重。红崖是现在甘河工业园区西侧的一座山，过去，当地人把它叫做“高红崖”，确实是那一带比较高的一座山。山阳半坡较平缓处开有几块田地，临近山脚处，过去曾建过石灰窑。山前是一片干涸的河滩，过河滩是一片草滩，草滩东侧有几块田地，田地的东侧是“中滩”，过中滩又是田地，再往东走近百米，才是东山，可见那时高红崖东侧的川道是比较开阔的。1958 年，高红崖南侧约六七里处的山湾里，开始修建“黄鼠湾水库”，限于当时的条件，水坝是人工夯筑的。修成后，金纳峡的水被引水渠引进水库，千百年有名的干河滩里第一次有了一个碧波荡漾的人工湖。就在水库注水后只有一年的 1960 年农历八九月间，正是秋收季节，一天，村民前去高红崖山湾收豌豆，当他们爬上半坡时，突然看见山坡上一条宽约两寸的新裂缝横在眼前。对此，村民们谁也没有在意，跨过裂缝，再爬一段山路，来到豌豆地边开始收田。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突然看见高红崖主峰上尘土冲起，半个山坡已经下滑，断面上大块大块的土块在坠落。好奇的年轻人跑到

高红崖最高处观望,只见下滑处断崖已达数丈,近二尺宽的裂缝沿着山坡,翻过山梁,向北一直到中沟路,向南一直到赶牛路湾,大概长约三里。但村民们却见怪不怪,依然镇定自若地在收田,直到收工时才来到深不见底的裂缝边。人们跨过黑黢黢的裂缝,才发现原来陡峭的上山路已变得较为平缓,下滑的山土拱起了山前河滩的砂石,形成了一堵高高的沙梁,原来宽宽的河滩已变得很窄,河滩东侧的草滩已近在眼前。回头一望,那高红崖阳坡很陡的庄稼地,随着下滑的山坡,几乎快要成为“梯田”了。

滑坡的原因也许是它南面的黄鼠湾水库造成的。黄鼠湾水库建成后,由于地表压力的改变,加上渗水流入下游高红崖下的河滩,造成了地表地质结构的变化,因而造成了山体大面积滑坡。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首有名的诗,叫《白

席 芨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名句。岑参是在今新疆天山北路的轮台戍所写这首诗的,这里说到的“白草”,据《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乃“西北一种草”。《万里行程记》是清代西北史地学奠基人之一的祁韵士被贬谪戍守新疆伊犁时的行记,文中写到他行至甘肃玉门六道沟时,见到“塞外产芨草,草中有呼为集吉草者,其茎极坚韧,高数尺,可做簪,又可编为帘,不亚于竹,到处皆有之”。《莎车行记》也是清代咸丰年间副都统、蒙古族倭仁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时的行记,他在文中写到“夜行百二十里至芨芨草子(地名),入巴里坤界,见芨芨草。”芨芨草一名塞芦,即《汉书·西域传》之白草,西域处处皆有之。今人或以为簪,俗呼为集吉草,又曰芨芨草。”据专家考证,这里的“白草”指的就是芨芨草。说“芨芨草成墩状生长,茎细节长,长约米余,甚至最长者可达两米。茎实心而坚韧,生长期为绿色,成熟后为白色。可编织筐、篓、席,常被用来扎成清扫街道和院落的大扫帚”。

青海的山间、草原上也有很多芨芨草,不过不叫“芨芨草”而叫“席芨”。有的地方还以它为地名,如贵德黄河岸边有个席芨滩,互助南门峡有个席芨沟。虽然专家说芨芨草可编织席,但青海人用它编席的倒不多见。席芨确实是防



风、固沙的忠诚卫士,在那干旱少雨的半荒漠地带,它因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确实“成墩状生长”,细长的叶片像剑芒,拥簇在一起,迎击着漫天的风沙。一支支茎杆像箭簇,从根部窜出,挑着淡紫红的禾穗,无畏地唱着夏天短暂的歌。塞外的冬天来了,荒原一片枯黄,狂风像铁扫帚一样,吹走了地面上的碎草,刮走了地面上一层层浮土,而顽强的席芨墩却巍然耸立在风雪中。只要你留意,青海湖边,塔拉滩上,到处都有它倔强的身影。青海“花儿”里也曾唱到“三根席芨扎笤帚,尕场上要扫个雪哩;现在的尕小伙不受苦,光谋着领丫头哩”。

席芨确实是个宝,除了防风、固沙外,它的茎用处可多了,青海农村主要用它编背斗、扎笤帚。背斗和扫帚是农家最主要的用具,背土、背草、背粮食、拾粪,样样农活都离不开它,不是说“若要庄稼成,背斗不离身”吗?清扫家院、打碾粮食、收拾柴火、扫雪、清场,同样样样活儿也离不开扫帚。编背斗、扎扫帚,是一般粗手艺,农家男人基本都会做。每年秋后,等席芨杆长结实后,人们会抽出一点时间去拔席芨。拔席芨是一个苦活儿,席芨杆根部长得很牢,要抓住一根,用力使劲拔,才能拔出来。一次抓得多了,根本拔不动。拔时要顺着茎杆的方向拔,如果把茎杆挽起来拔,就会造成茎杆碎裂,失去了使用价值。拔回的席芨扎成捆,再把根部用火燎一下,烧去残叶和根须,就可以用了。现在人们为了图方便和省力,用镰刀割席芨,其实,席芨杆的底端部分是最结实的,这样割下的席芨既不结实、又不耐用,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浪费了席芨这种资源。

硬柴

硬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冷僻的名词,也许

年轻人并不知道什么叫“硬柴”。硬柴其实是指只能用来做柴火的木头(不管是劈开的还是整块的)和破开的树根,但不包括草、树梢和山里砍的小灌木等,它比这些要耐烧得多。《西宁府新志》中,就标有当时西宁城内有“硬柴市,在北古城街”。在过去,虽然人们取暖、做饭,原料有煤炭、硬柴、山柴、草、牛马粪等,但能用得起煤炭、硬柴的,一般都是殷实之家,寒苦人家只能用柴草和牛马粪烧饭和冬日煨炕了。

羊

脚巴是过去抽烟的用具，现在抽烟

人都抽纸烟(也称香烟、烟卷)了,而且是带过滤嘴的。那时家境好而年长的,抽着水烟。他们一手端着水烟瓶,一手拿着柴皮子,点燃嘴里的水烟,抽时“咕噜噜,咕噜噜”的声音,至今想起来,仍恍如昨天。有烟瘾但家境不好的,就地取材,自己做一个“羊脚巴”充当烟具。“羊脚巴”材料易找,制作简单,那时农村许多人的腰带上都别着一个。“羊脚巴”取的是羊的后腿股骨。在股骨大的一头侧面钻个洞连接股骨的骨髓腔;另一头从正面打通,连接骨髓腔。那年月空子弹壳多,再用半截子弹壳(壳底钻个小孔)塞住侧面的洞,敲打严实,原理就和后来出现的烟斗一样。抽时,将烟末捻成团,塞入“弹壳”点燃,噙住小头就可以抽。烟末装在用布或皮子做的烟袋里,抽罢后,人们把“羊脚巴”往烟袋里一塞,再用栓口绳一缠,像枪一样塞入腰带,携带起来很方便。在那个年代里,水烟瓶和“羊脚巴”也成了身份的象征。

上世纪 50 年代初,随着一包有 50 支,只售 5 毛钱的《耕牛牌》香烟问世,“羊脚巴”也渐渐冷落了。《耕牛牌》再不好,也是香烟,比起抽“羊脚巴”风光多了。伴随了贫寒庄稼人多少辈子的“羊脚巴”,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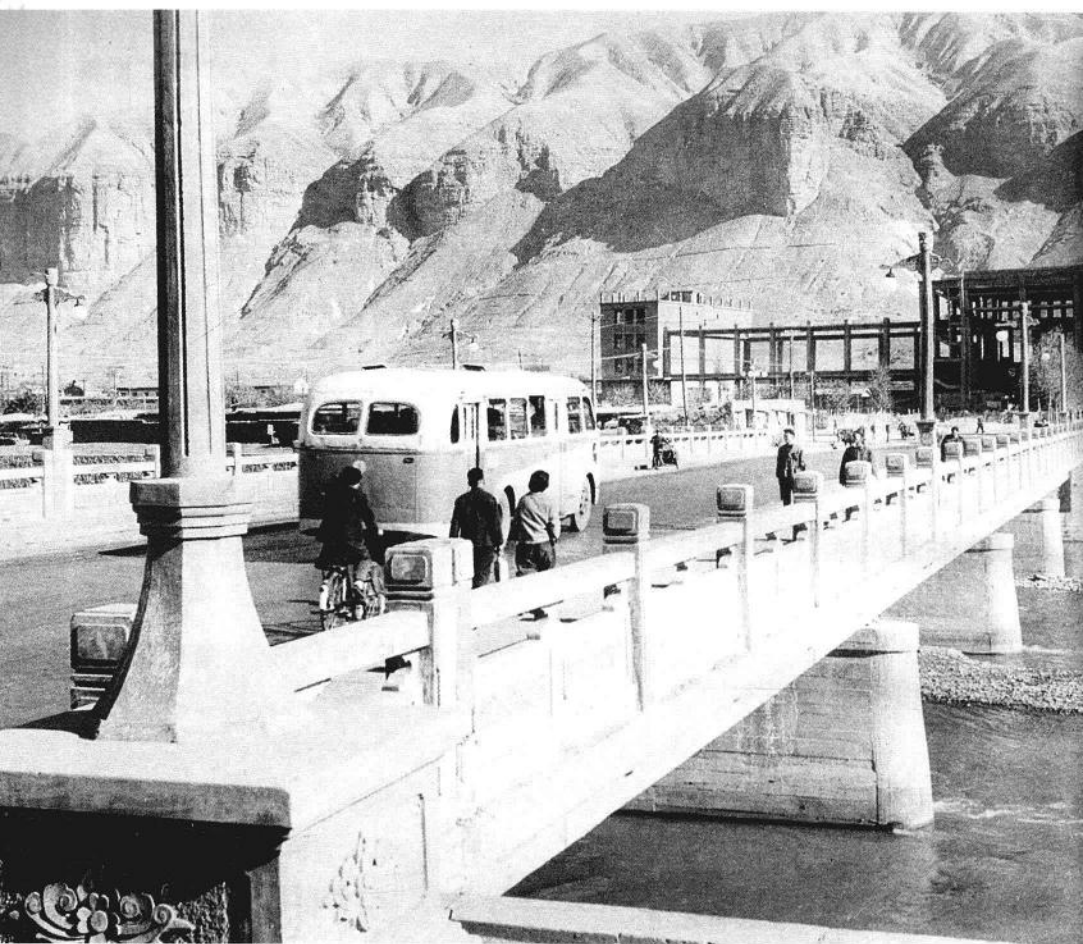
羊脚巴

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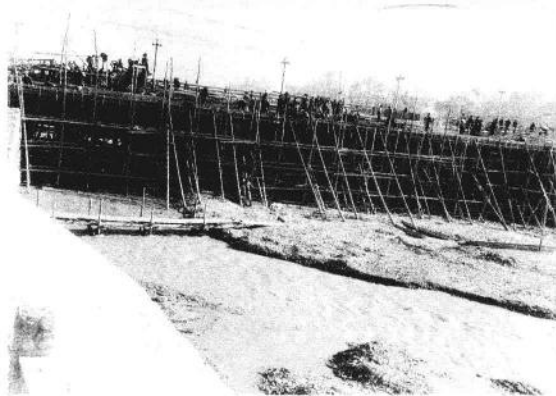
子是人人家里必备之物,

材料有昂贵的,也有便宜的。昂贵的如象牙筷、银筷、乌木筷等,一般的就是普通木筷、竹筷。但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用的却是胡尔条筷子。胡儿条是山里的一种小灌木,茎杆土红色,蘖枝多,长着指甲盖大的卵形叶。它有个特点,就是一尺多高的茎杆很直,没有结节。由于这个特点,在过去,它被许多人家用来做筷子。人们从砍回的山柴中,挑选粗细适中的胡尔条,截成长短一致的木棍,再用刀刮去外皮,就成为“筷子”。由于长年使用,油渍渍的“筷子”很光滑。每逢村上婚丧嫁娶的大事,村民们都要互相借用碗盏盆筷,但胡儿条筷子却“狗肉上不了大席面”,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所以,一些人家也备有一把涂染红漆的竹筷,以专供亲戚或红白大事使用。那时候,一把红漆竹筷竟成了节庆或红白大事上的专用物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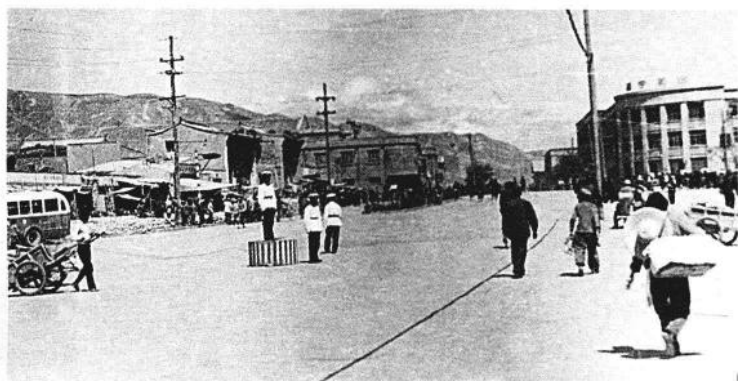
胡儿条筷子



建国桥，远处框架建筑物为因种种原因停建的火车站大楼



修建中的西关大桥



上世纪 50 年代的西门口(右侧为西宁饭店)



西宁大街一角



湟中农协成立大会



不见“胡尔条筷子”已经好多年了，现在的人家里，一把普通筷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换新的。而一次性筷子充斥于饭店和小吃摊上，看到这大把大把“完成任务”后散落满地的“一次性”，使我不由地想起当年的“胡尔条筷子”来。

贴钱马

贴“钱马”和贴春联是过春节的

重要象征，为了表示节日的喜庆和祥和，至今很多人家仍保持着贴春联的习俗，但除了农村个别人家之外，现在很少有人再贴钱马了。

钱马用的是黄表，类似现在上坟用的烧纸，但薄而纸质较柔，现在卖祭祀用品的商店还有卖的。大年三十，人们贴春联时，贴罢横额，即在横额下方涂上浆糊，再将一张黄表沿角对折，成三角形，将斜边贴于横额下方，三角垂于横额下，这就叫“钱马”。钱马一般和春联同时贴在房门和大门上，到正月初三送神时，就用火燎去，它的“寿命”也只有短短的三天。从除夕到正月初三这三天“年”里，看家家红彤彤的春联，看黄澄澄飘卷的钱马，确实给节日增添了一股喜气。但是，贴钱马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按过去的民俗，凡是借了别人家钱或物的，必须要在年前给人家还清；凡是自己借出的钱和物，也要力求讨回来，讲究个过年“家全物全”。在过去，很多人家都借有别人的钱和物，一时确实还不起，“富人过年，穷人过关”，只得外出躲账（债）。按过去的习俗，只要人家门口贴上“钱马”，要账的再也不能登门去讨账，不然会对自己不利。从除夕开始，家里请来福神，外有门神守门，你要是再登门讨账，就会晦气沾身。看来，门上贴钱马，也给穷人们留出了舒心过年的三天时间。

初三晚上是送神的时间，随着“神”的回宫，受神保护的期限也到了，送神仪式结束后，人们用火燎去“钱马”，已经按捺不住的账主们，又可以上门催账了。

打醋罈

打醋罈是过去农村除夕晚上敬神前除秽洁庭

的一项重要工作。年前，人们就从河滩里捡来鸡蛋大小、干净而无破碎的几块河卵石备用。大年三十做晚饭时即将石块放在

灶火洞或炉子上烧,贴罢春联,洒扫庭除后,把烧得几乎通红的石块夹入脸盆中,立即在石块上撒些柏枝叶(柏香)、浇上醋,盆中即发出“嗤—嗤”的爆裂声,在柏枝燃烧和醋味四散的时刻,再倒入滚烫的开水,夹杂着柏叶清香和醋味的氤氲之气,顿时充满了房间。人们端起盆子,依次在各个房间进出,有人喊:“端低一点!端低一点!”端盆者尽量弯着腰,将散发着清香的水气带进各房间的角角落落,最后将没有一点水气的残水和石头倒在水洞眼上,至此,“打醋罈”这一项活儿到此就算结束了。

据民间传说,醋罈也有神,叫作“醋罈神”,他的神位是很大的,因为是《封神演义》中辅佐周武王打下天下的姜子牙。打败殷纣王后,姜子牙登上封神台大封诸神,由于受封的人多,等轮到封自己时,才发现所有神位统统都被封完了。没办法,他只得给自己封了一个“醋罈神”!因为姜子牙功高盖世,威名远震,虽然“醋罈神”其位不扬,但足以让一切魑魅魍魉匿名逃遁。“打醋罈”时,如果把放有醋罈的盆子端高了,会让家里请来的诸神在姜子牙面前很不自在,所以人们要喊“端低一点!端低一点!”其实,燃烧柏叶时发出的香气和醋酸蒸发的气体都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如果端得高了,热气上升,就无法对低处进行杀菌消毒。在过年的喜庆日子里,室内用“打醋罈”的方式进行杀菌消毒,简单易做,确实是一个好习惯。

“丢钢儿”和“拌馒头”是旧

丢钢儿和拌馒头

时娃娃们用铜钱争输赢游戏

的两个玩法。在中国几千年的钱币交易中,圆形方孔钱使用的历史最长,尽管民国年间已使用纸币、银元和铜元,但老百姓手里还是有许多“孔方兄”。失去交易价值的方孔钱,便成了孩子们“丢钢儿”和“拌馒头”的本钱,其中有点赌博的味道。游戏开始,首先在地上画出一个长一尺左右、宽五六寸的矩形方框,然后在距离方框三四米左右的地上画一条直线,孩子们站在直线外,就像赛跑运动员一样,按先后顺序和规定,将手中的一枚或两枚铜钱依次掷向方框内。如果扔出的铜钱落在线上或框外、或落在框内后又滚出框外者,即丧失了参与下一步的机会,所掷出的铜钱已经输掉了。落在框内者,以框内落点高



昔日的莫家路桥(远处可见城墙一角)



街头小吃摊



建成后的新宁桥



修建中的新宁桥(桥北侧可见上世纪 30 年代西路军战士参与修建的惠宁桥)

二牛抬杠





低排名,距上边线最近者为第一。这种游戏就叫“丢钢儿”。

通过第一步决出名次后,然后集中参与者掷出的所有铜钱,由第一名摆在自己摊开的手掌上。因旧铜钱一面有字(清代钱两侧都有字,一侧为汉字,一侧为满文),游戏规定,要么有汉字的一面全部朝上,要么没汉字的一面全部朝上。然后找一块地面没有浮土,地面较硬的地方,晃动摆钱的手掌,再迅即抽出,让所有铜钱在瞬间落地,由于地面反弹,造成有些铜钱翻转。凡翻转的铜钱都归第一名所有,未翻转的再由第二名依次进行;有时,直到排名最后的一名玩罢,有的钱仍未翻转,第一名可再次参与;直到剩余的铜钱全部玩尽,这一轮游戏即告结束。这就叫“拌馒头”。

“白方儿”和“咕尔典”

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岁月里,人如果有

小病小恙,有的就会根据病情去打问个“白方儿”(偏方),然后按“白方儿”的要求,寻找材料,进行治疗。如感冒不愈时,采用线扎手指,直到指尖青紫,然后针刺放血等。民间流传的许多“白方儿”材料易找,操作简单,效果显著。因为它是老百姓通过千百年反复实践经验的总结,口耳相传,可以说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人生百病,有许多病确实是“白方儿”难以奏效的。

记得小时候,如果有人生了病,小病一般都“抗着”(忍耐着),稍微重一点,就到处打问“白方儿”;再严重,就请“咕尔典”(蒙古语,神汉)法神(做法事)。“咕尔典”也叫“法拉”,实际上就是巫师。如果“咕尔典法神”仍不见效,就会无可奈何地说:“他(她)的阳寿到了”;病人如果岁数较大,就会说:“这是老病”;如果病者是个小孩,就会说:“他是你们前世里的一个账主儿”。有不少人很年轻时就去世了,人们认为通过“法神”都没治好的病,那真的是没救了。到药铺请先生(坐堂大夫)看病抓药,那是有钱汉家的事,平头老百姓能请一个“咕尔典”法神,就算已经是尽到心了。所以,常见麦草包裹的“死娃娃”,野狗和狼常常光顾那里;翻开《族谱》,享年60岁以上者寥寥无几。正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曾多次看过“咕尔典法神”。

那时有一个姓马的“咕尔典”,人们不太叫他的名字,直接叫作“马咕典”。

马咕典平时和大家一块送肥、种田、收割和打碾，干着一样的农活。但他会“法神”，到时却会代“神”说话，不但能预知人的吉凶祸福，而且能禳解灾难、治病救难。“咕尔典”有自己专用的衣冠和法器。做法事时一般在晚饭后，到时他会招呼患者家准备好若干物品，然后穿戴停当，独立堂屋，面对供品，凝神闭目。数分钟后，突见他浑身颤抖，大口呼吸，双目圆睁，而且动作越来越大，加之法冠上装饰的彩带大摆，柜上供的油灯灯影摇晃，更助长了神秘和恐怖的气氛。患家伺候者尽管和“咕尔典”是一块儿长大、戳牛板筋的庄稼汉，但这时却跪伏在地，不敢抬头仰望，不断地哀求：“求大老爷恩典！解救病人的苦难！……”“咕尔典”却“六亲不认”，声音怪异地大呼：“拿青盐来！拿五色粮食来！”患家急忙“诺诺”答应，大气不敢出。突见“咕尔典”从腰间抽出一支铁签（叫口签），自己从脸颊右腮戳进，从左腮穿出，竟面无一点痛苦之色。伺候者双手举起青盐和粮食，只见脸带口签、面目狰狞的“咕尔典”一手接过东西，随手抓起一把，狠劲甩向屋子四角，在青盐和粮食“噼里啪啦”的下落声中，“咕尔典”却大步窜入病人屋内，一脚登上炕沿，继续用青盐和粮食甩打，一边大喊：“看你往哪里跑？”接着抓起桌上的黑瓦坛，一步跳下炕，冲出房门，追出大门。炕上的病人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双手紧捂着胸口，瑟瑟发抖；跪在地上的伺候者们也在胆战心惊，直觉得一股凉飕飕的冷气直冲脊梁。一会儿，在大门外“咚咚”的脚步声中，“咕尔典”又像一股风一样卷进屋内，一手紧捂着坛口，一手拿起朱砂笔，在一沓黄表上急促地画着圈圈和道道，一边嘟囔着一些预备东西的使用步骤。伺候者一边接应黄表，一边不停地答应。“咕尔典”用红布苫住坛口，用五色丝线扎紧，再用“符”（用朱砂笔画过的黄表叫“符”）粘贴，让伺候者快速拿到门外十字路口埋掉。将剩下的有的“符”贴到患者卧室门口或炕头；有的却叫“箴言”，放在碗中，用火燃为灰烬，冲入开水，让病人连灰喝下。并叮咛外人走后，迅速紧闭大门，天亮前家人不准互相说话。一切安排妥当，“咕尔典”已是汗流满面，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瘫了下来，渐渐恢复了常态，“大老爷”又变成了马尕五。

烧“地锅儿”也叫“烧窑”，是指秋天庄稼地里洋芋成熟后，小孩们在田边地头就地取材，烧吃洋芋

地锅儿



的一种方法。秋天,长着墨绿色肥厚叶子的洋芋植株下面,裂开了一道道大大小小的口子,只要顺着裂口一挖,硕大的洋芋就会滚出来。这时候,小孩们如果没事,就会相约来到田边地头,有的去寻找干柴草秸,有的捡来拳头大小的干土坷垃,有的去地里偷挖洋芋。然后在地上挖出一个土坑,留出烧火口,再细心地用土坷垃在土坑上垒成一个中空的土丘。垒土丘是一个细心的活儿,尤其到丘顶收口时,稍不留心,就会垮塌。土丘垒成后,就可以烧了,浓烟和火舌从土丘缝隙中冒出,起初土坷垃变成黑色,后来渐渐变得通红。当柴火烧得差不多时,得十分小心地夹去土丘顶端的几块土块,再把洋芋从土丘顶端开口处,仔细地一个个投进热烘烘的“窑”膛内。投完洋芋后,再将土丘快速打塌、压碎,捂住土坑。再过一个时辰,扒开还有些烫手的土灰,里面就是一个个皮焦内黄、香气四溢的洋芋。吃起来,比家里煮的不知要香多少倍!这就叫烧“地锅儿”。没有吃“地锅儿”的洋芋已经几十年了,每到乡下,当看到那黑沉沉、绿油油的洋芋地时,就会想起小时候的“地锅儿”来。

凉圈儿和沙瓶

凉圈儿是过去妇女们拔草、收田

时,戴在头上的遮阳用具。它以木

条扎成直径约二尺余的木圈(有专门卖的),上绷中心有圆孔的白布。圆孔直径约两寸许,周围饰有用蓝布剪制的云纹或对角花纹图案,下缀两条布带,供戴时勒住下巴。凉圈制作简单,携带轻便,戴在头上,不碍双手劳作,而且遮阳面积大,所以是妇女下地拔草、收田时必戴之物。每当田野里禾苗一片翠绿之时,庄稼地里的杂草也乘机疯长。这时农家许多男主人多外出“搞副业”挣钱去了,而田间除草的活儿就落到了妇女身上。你看哪,在那一块块翠绿的田地里,白凉圈显得格外醒目,确实成了农村夏天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青海“花儿”里就曾唱到它“拔草的阿姐们一溜儿,凉圈儿排成了队儿”;“白布的凉圈儿棋子花(指凉圈上的装饰图案),芝麻呢儿的手帕;一对儿眼睛杏核儿大,一张惹人的嘴巴”。在河湟谷地,妇女们使用了千百年的凉圈儿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大批式样新颖、色彩各异的遮阳帽陆续从城市走向乡间,引领时装潮流的年轻妇女们不但进城上街时戴着它,而且除草收田时也戴着它,尽管个别看不惯的老奶奶们骂她们是“俏皮”、“妖精”,但凉圈儿最

后还是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沙瓶和凉圈儿一样，是过去农家除草、收田时必备之物。在过去没有暖瓶、水壶、玻璃瓶，甚至塑料用具，沙瓶是庄稼人下地时盛水的用具。沙瓶实际上就是一种粗陶器，样子有点像暖瓶胆，双耳、小口，用绳子拴住两耳，可以提。下地前，人们在沙瓶里灌好开水，“双耳的沙瓶里灌开水，阳坡上要拔个草哩”，小心翼翼地提到田间地头，供口渴时饮用。沙瓶虽然价廉，但怕摔易碎，在过去普遍家境比较困难的年代里，打碎一个沙瓶，一时半会也是个难怅的事情。

制 作皮筏时，皮囊不能有半点破损，要求是

皮筏

很高的。据说剥取皮囊时，先杀羊取头，其余内

脏、肉及骨骼均从颈部取出，看来取皮是要有点技术的。皮筏按质地分，有牛皮筏、羊皮筏，使用时皮囊在下，木排在上，成本不高，构造简单，装拆方便，且不怕触礁搁浅。由于皮囊充气，自重轻，吃水浅，所以小的皮筏也能载数人，如果串联的皮囊多，大的“可乘十多人，数百斤物”。有资料说“古时把它叫‘革船’”，周希武的《玉树调查记》中有照片，就是用牛皮做成的船，形状像船而简陋，我想，把它叫作“革船”才对。

皮筏是哪时发明的，史无明确记载，但古诗“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就是写皮筏的。过去，皮筏主要是作为渡河工具使用的。《水经注·叶榆水篇》说“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革船”即皮筏，直到如今，卖皮货的商店仍称“皮草行”，看来皮筏的使用至少已有两千年了。唐宋以来，有关皮筏的记载不绝于史，《旧唐书·东女国传》说“用牛皮为船以渡”；《宋史·王延德传》说“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泛皮船兮渡绳桥，来自鄂州道路遥”。明代著名僧人宗泐（浙江临海人）曾奉旨经青海前往西域求经，他在许多诗中描绘了青海的奇特风光，如《和弟苏平仲见寄》一诗中就写“西去诸峰千万层，帐房牛粪夜燃灯；马河只许皮船渡，戎地全凭驿传乘”。这里所说的“皮船”指的就是皮筏。即就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寺沟峡曾经是青海到兰州的水运通道，皮筏要经过喇嘛石、救命窝、骨岔浪等一连串险关。据说当时兰州到包头的货运和客运业务，全部由羊皮筏承担，最大的羊皮筏竟由600个羊皮囊串联组合而成，长达二三十米，



旧西山湾路(今昆仑路)



城墙下的旧桥



湟先十字改建中



昔日的西门口(左侧是人民电影院)





载重量甚至达到 30 吨,真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皮筏除了用于水上运输外,由于它有许多优点,也被广泛用于军事行动。史载东汉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因护羌校尉张纡诱杀烧当羌首领迷吾等,从而激起羌人大规模的反抗。朝廷后任命邓训为护羌校尉进驻临羌(一说今湟源南古城),在雁谷(今湟源巴燕峡)击败迷唐羌,到第二年(永元元年)河湟地区重归安定。邓训袭击迷唐羌时,就曾“缝革为船,置于箬上以渡河(今湟水)”。这是青海地区皮筏用于军事的最早记载,证明东汉时湟水的水量是很大的。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自云南起兵反清,曾致书约达赖喇嘛和青海诸台吉同时起事。清陕西提督王辅臣闻风响应,攻陷兰州,并迅速占领全甘,接着“逆贼踞兰州,断河(黄河)浮梁,守金城关”。当此危急之时,西宁总兵王进宝“率西宁汉土官兵,乘夜以皮筏暗渡黄河(即今张家河湾),贼未预防,故迅速奏功,又冒雪夜连破临洮等州县。……”正像唐代中期李愬雪夜入蔡州一样,王进宝为平定王辅臣之乱立下了奇功。

1949 年 8 月 27 日,马步芳自兰州败逃西宁。到宁后,他惊魂未定,下令炸毁民和享堂铁桥、循化古什群木桥,以及沿途通往西宁的渡船,妄图阻止解放军解放青海的前进步伐。廖汉生、贺炳炎部在无桥、无船的情况下,得到当地刚刚翻身群众的大力支持,赶制了上百只羊皮筏,并由经验丰富的水手掌舵,在甘肃永靖渡口进行强渡。28 日凌晨,解放军先头部队二师五团三营乘皮筏渡过黄河激流,解放了青海第一座县城——循化。看来,小小的羊皮筏为青海的解放,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搁大粪

“**搁**(gang)大粪”是过去城里人对乡下进城

积肥人员的一种蔑称,带有点瞧不起的味道,就像今天把农村进城寻找打短工的人叫作“站大脚”一样。在这儿“大粪”专指人粪尿。在农业《八字宪法》里,排列顺序是:水、肥、土、种(种子)、密(密植)、保、工、管(田间管理),肥料排在第二位,“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可见其作用之大小。过去,农村人少地多,单产很低,肥料主要靠人畜粪尿。脑山土壤较肥,问题还不大,浅山还得靠烧野灰,川水地区只得把进城搁大粪作为肥料的主要来源。几十年前,城里工厂、居民家多数使

用旱厕，“搁大粪”们为了挣工分，农闲时纷纷进城积肥，有的还常驻城里，蹲点守候。进城积肥时，还得向厕所主人“走后门”，只要在单位上和居民家有认识的人，那积肥的事就有了把握，有“肥”可积了。“搁大粪”不时还得用农家自产的洋芋、蔬菜，去意思意思“东家”，并把人家的“后楼”（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取得主人满意和喜欢，保证自己“肥源”常在。大冬天农闲时候，“搁大粪”们不嫌脏臭，锨挖肩扛，将冻得如铁塔般的粪尿搬运上车，运往家乡田里；三暑大夏，他们将粪尿运往今天的五四桥下的河沿边，转成粪饼，摆在南川河边凉晒，再像垒煤砖一样，装车运往乡下田间，搞得五四桥一带苍蝇成群，臭气熏天，人人掩鼻而过。

随着尿素、二铵、复合肥料等化肥的相继问世，人们挣钱门路的拓展，尽管人们说农家肥不破坏土壤的团粒结构，种出的蔬菜、粮食是“绿色食品”，人们吃着放心，但“搁大粪”们再也不愿进城积肥了。世态便如翻覆雨，还在使用旱厕的人们一下子从“东家”变成了“仆人”，低声下气地央求稀罕见到的“搁大粪”们把自家的厕所清理一下，免得屎尿横流。“搁大粪”们却抬高了身价，视厕所大小，粪的多少，要价就是多少。农村的新一代再也不会到城市里当“搁大粪”了，“搁大粪”这一职业也只留在 60 年代人的记忆当中。

过去，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和金属器皿的缺乏，加上当地

锅罗锅和碗儿匠

很少生产等原因，家里的碗碟和铁锅是很金贵的物件，一不小心损坏了，大人们就要心痛好几天。那时，人们使用的铁锅多是炉匠家用生铁铸造的“车头锅”，这些年已经很少见到了，由于是家里重要的家当，所以也成了那年月贼娃子瞄准的偷窃目标。家里的东西再金贵，尽管很小心，使用过程中有时也免不了要损坏。生铁锅在使用过程中，如炼油、冷热急剧变化、用力不当时，生铁锅底极易开裂。裂缝较小时，人们尚可用面浆糊粘贴等方法凑合，裂口一大，就没办法了。同样，家里的瓷器、碗碟在使用过程中，也常被摔裂或打碎，为了修补这些金贵的东西，当年就有了专门的行当，人们把修补锅的叫作“锅罗锅”，把修补碗碟、瓷器的叫作“碗儿匠”。补锅、修碗虽是一个小本生意，但这些人个个都身怀绝技。尤其修复一些名贵的古瓷，那绝对是绝活。



修锅、修碗碟使用的材料，人们叫作“巴子”，其实就是扒钉，样子很有点像如今的钉书针和建筑工程中用的“蚂蟥”，钉锅的材料一般用铁；钉碗碟的材料一般用铜，小巧而精致。修理时，他们会细心的将碎片按原状对接好，再拿绳子捆扎结实，然后根据裂口的长短、走向，划出所钉的位置和“巴子”的疏密，然后用“金刚钻”细心而认真地钻出巴子孔，再把巴子细心地敲进孔中，起到对接和固定作用。敲击的力度、方向等，每一个细节无处不凝结着匠人天长日久积累的经验和丰富的阅历。但像水缸、瓦盆等普通器具裂开时，省钱的人们一般不用巴子修复，就地取材，用新鲜的羊米肠（小肠）沿着裂口，一圈圈缠紧，等肠子干了后，就会像铁箍一样扎紧裂口，结实得很。修复完全破碎的碗碟，就得要格外细心，先要把碎片按顺序编号，一块块对接、拼合，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假如破碎的器皿价值不大，人们也就不会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去修复了。

冰 桥

明 嘉靖年间任西宁兵备道副使的路珠

曾说西宁“三春未放柳，六月已飞霜”，可是近年来，随着全球气温的逐年升高，冬日西宁周边河上冰封雪盖的景象已渐渐难以看到，即就是三九隆冬，湟水河的西宁段再也难以见到冰封的河面。可你别小看今天那纤细而羸弱的湟水河，当年也有过汪洋恣肆的壮观场面，“把钓人来春涨满”（清人张思宪），“昨夜雨多春水生，一波忽起一波平”（清末基生兰），所以曾经以“湟流春涨”之名，被选入了古“湟中八景”。

湟水流经西宁的一段，因处北城门之外，而且从前水量较大，曾被人叫作“北门大河”。在过去的千百年里，我们的先辈为了渡河，在这一段河道上修建过许多桥，如修建在今新宁桥附近的桥，当年就叫作“西川河桥”、“伯颜川桥”和“小桥”，并因此“小桥”后来成为了地名，一直用到现在。那时，因受修桥材料的限制，每遇夏秋水涨，春日冰融，桥常因“水挟木去”，人们只得“望河兴叹”，饱尝了渡河之苦。可是到了冬季，彤云密布，朔风四起，一夜间北门大河却“顿失滔滔”，一改旧观，宛如一束银链，横卧在萧瑟的大地上。正如明代御史李素的《西平赋》中所说“冰坚丈许兮秋凝，潦涨百州兮冬涸”；清末西宁名士基香斋在《冰桥》诗中所说“一夜北风寒正多，大河冰结静无波”；尚青也说

“昨日还惧渡河险，今见眼前镜面平”，由于大河冰封，渡河时人们再也不必“望河兴叹”，再也不必绕道去寻有桥的地方。所以过去每到冬季，处处皆可安行旅，“何必灞陵始渡桥”。洁白的冰封河面上到处都有行人留下的一道道土黄的小路，行人、车马常行在这便捷的冰道上。

尽管冬日的河面上到处都可以通行，但人们走得多的地方，还是那些路径便捷，且是冰面平整的地方。你别看这下面还涌动着流水的冰层，在寒冷的冬日里，却“壮坚不假人工造，宽原能容车马过”，车曳马驮，其坚如石；迈步其上，脚下如砥，所以人们俗称其为“冰桥”。

在过去冬日那寒风刺骨的日子里，冰桥确实为老百姓的出门提供了不少方便，不但免了许多绕道之苦，而且就近寻路，十分方便。难怪当年的文人雅士的诗集里，也不乏歌咏冰桥之作，像西宁地方史料中，就收有李协中《冬雪行旅》、基生兰的《冰桥》等咏冰桥的诗作。基先生在诗里不仅赞叹了冰桥的壮观和功用，也细腻地描述了冰桥边送别的悲怆场面，“狐走且听心顾虑，客行将别泪滂沱”。

西宁的“北门大河”上，我们的先辈修的这些桥，因水冲、失修等原因，时建时毁，多数已“玉殒香消”，只留在地方史料中。而天公作美的冰桥，却年年如约而至，悄无声息地给人们提供了极大方便。冬天的北门大河冰面上虽然许多地方都可通过，但据调查，这一段河道上因地处路口、交通便捷、来往人多等原因，自然而然形成的冰桥却有12座，它们分别是：湟中公园冰桥（即上五盘冰桥）、喇家巷冰桥（即北水城门冰桥）、上八盘磨冰桥（又叫磨沟沿冰桥）、下八盘磨冰桥（即路口子冰桥）、柴家桥渡口冰桥（在原柴家桥上面）、红崖浪冰桥、白家河湾冰桥、燕子石冰桥、下青崖根冰桥、破庄子根冰桥（即杂旋儿冰桥）、煮牛锅儿冰桥和小峡一窝猪冰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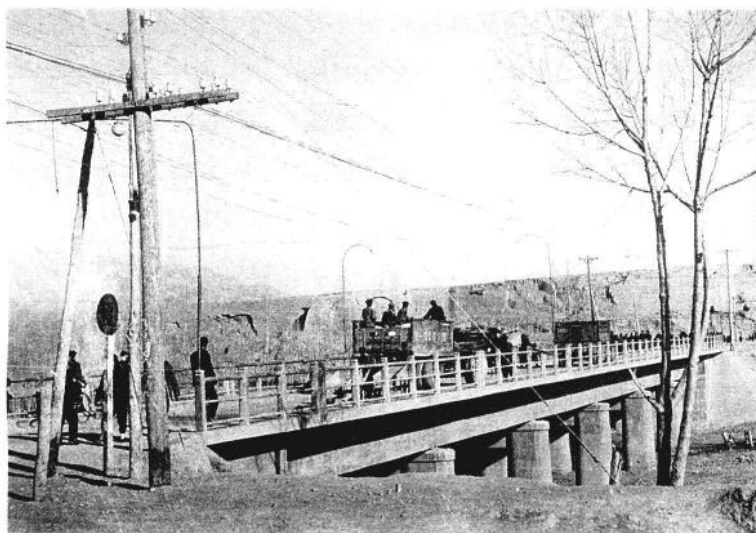
柴家桥北接柴小庄（今火车站王家庄），南通“关厢”水城门，当年名将柴国柱率兵镇守小峡赴西宁大道时，曾在这里修建了渡桥，因名“柴家桥”。后来柴家桥被水冲毁，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修复，因这里地处要道，人们只得在这里设渡口，依靠摆渡过河，所以叫作“柴家桥渡口”。冬日里可仰仗天公所赐的冰桥，来去也很方便，因叫“柴家桥渡口冰桥”。喇家巷冰桥南连水城门，北通今林家崖，当年林家崖就是一个不小的村庄，出水城门，过冰桥去林家崖，最为



西宁城东丰骑沟桥



拾马粪



报社桥



城外一角



欢迎农协成立



便捷,所以叫“北水城门冰桥”。小峡西口北有傅家寨,南有杨沟湾,两村隔河相望。河中有一处巨石相聚,夏季水涨时不见踪影,每遇枯水时则黑魑魑地露出水面,人们形象地俗称其为“一窝猪”。隆冬时这里因山高峡深,白茫茫一片,人们就近过河,甚为方便,因称其为“小峡一窝猪冰桥”。

丹噶尔歇店

歇店是边贸地区专门为来往集市

交易的商人、牧民提供住宿服务和交

易服务的设施,歇店主也同时为来往人员提供语言翻译服务。纵观丹噶尔商贸中心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到,几百年来歇店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曾起到过重要作用,至今尚存的丹噶尔得胜巷15号万兴店则是这段地方歇店文化的最后历史见证。

坐北朝南的万兴店具有典型的歇店特色,一进三院,宽大的大门两侧装饰有华丽的砖木雕刻,下有花岗石门槛,门两侧分别为西四间、东两间铺面,门前的坡道可直通歇店的外车院。进门便是较小的车院,院子四周是明三间的房子,东房一共四间,是来往客商饲喂牲口的马棚。院北对大门的照壁上有“万兴店”三个朱红大字,从东绕过照壁,便是通往中院的二门过道。

里面两院分别叫中院和里院,面积较大,都是南北五间,东西分别为三间、四间。这里是歇店屋舍的主要部分,设置有客房、库房,另外有上、下厨房和厕所、草料房。客房又分为优等和普通两种:优等客房每套两间,里间设有火炕一处,炕上铺设藏毯,置炕桌火盆,置有被褥,炕下地上靠墙处置一长条桌,配置有茶盘、茶壶、茶碗等茶具,置有自鸣摆座钟,能半小时报时。外一间具有办公和小憩的功用,窗前置一大方桌,两侧有太师椅,靠内墙是一单人木板炕,称之为厢炕,炕前两侧与顶部有精美的木雕并油彩漆。普通客房单间一室,是供一般客商往来起居之所,房内设火炕,上铺毛毡,炕上备有炕桌和火盆,放置有被褥,并无其他太多设施。上厨房实际为优等客房而设,备有厨师。下厨房为普通间而设,是客人自己做饭的地方,厨房内具有常用的炊事用具设施。除此以外,里二院房间主要设置为库房,库房有放置大宗畜产品相对简易的毛棚和装修精美的贵重物品库房两种,后一种库房设在阴凉通风的南房和过庭,内部地板、仰板、四壁木板,且设有放置商品的木架阁,这是存放鹿

茸、麝香、熊胆、虫草、羊羔皮、稀缺兽皮等贵重商品的地方。

万兴店,这座约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歇店,伴随着丹噶尔城兴衰几易其主,到上世纪30年代初成为湟源魏氏“海盛源”字号的第二处“歇家房子”,当初曾进行过较大的整修,解放后成为湟源爱国民主人士魏西源——魏协邦家族的居所。上世纪60年代前后曾被县中医院、邮电局征用,在这种公私交替使用中,业主几进几出,致使精美的屋舍院门装饰、传统的建筑风格等基本消失殆尽。尽管如此,魏氏的继承人们还是不遗余力地保护着这丹噶尔歇店文化最后的“梁园遗音”。

清代西宁诗人祁松年曾写了一首

金书铁券

《读李指挥铁券》的诗:“高阳伯出大明

时,树立功勋四海知。定乱安居连奏捷,封茅裂土最相宜。名标史册光千载,勇压西陲服众夷。感动英宗颁铁券,公然宠爱见乎辞。”诗中的李指挥指明代受皇家诰封“高阳伯”的李文。李文(1400~1489年),字孟华,是明朝会宁伯李英的从子,明代大将,宣德年间曾任指挥(武职官名)。当时塞外四卫之一的曲先卫散即思聚众叛乱,李文奉命率土兵随军出征,以功升任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僉事。明代有名的“土木堡之变”后,他又以“迎驾功”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升任都督僉事,出镇大同,再度因功封荣禄大夫、柱国、高阳伯,食禄一千石,后世因之称为“西伯府”,荣极一时(因李英府第称“东伯府”)。古人说“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始作铁券,其内镂字,以金涂之,故名金书铁契”。李文因“负资忠义,秉志纯良,将略素闲,战功克著”的原因,于1458年3月受赐“誓书铁券”,以表明英宗朱祁镇“朕既不忘尔勋,尔亦毋忘朕训”之意。该铁券“如一块黑色瓦片,呈弧形,含腹鼓背,系生铁铸成。体积长为37.5厘米,宽为21.2厘米,厚0.25厘米,重1.3公斤。上有明英宗皇帝诰諭制文,每字1平方厘米,阴文嵌金,金书灿然”。誓书铁券明确规定,受赐者凭着这一铁券,犯法时可以免一次死罪,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免死铁券”。铁券上的文字鎏金,光彩耀目,所以又称“金书铁券”。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89岁的李文在西宁去世,清乾隆年间杨应琚撰《西宁府新志》时,曾记载明代高阳伯李文的墓在县治(西宁县)北十里的“旱坪山下”(今西宁生物科技产业园区西侧),当



时这里的墓地上还树有李文的祭碑。

上世纪 30 年代,显赫明清两朝的西伯府传到了末代土司李沛霖头上,和河湟地区其他土司一样,显赫的权势光环早已淡去,1930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命令撤销土司制度,“粮归大仓民归县”,从此,河湟谷地沿袭了 600 多年的土司特权终于寿终正寝。金书铁券也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传到家居西宁市城北三其村的土司后裔李永蔚先生手上。解放后,李永蔚怕在“运动”中惹来麻烦,便偷偷地烧掉了祖宗十代的肖像,并将金书铁券深埋地下。1980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省著名藏学专家谢佐先生和民俗学家谢承华先生来到三其村,李永蔚先生闻讯,特意去找谢佐先生,让他看看自己珍藏多年的“铁瓦”,多亏谢佐先生慧眼识珠,使明英宗朱祁镇颁发给李文的金书铁券——这颗沧海遗珠得以重见天日。不久,李永蔚先生便将金书铁券捐献给了青海省档案馆。

苍崖遗迹何处寻

因种种原因,上世纪 60 年代,我曾在如诗如画的湟源峡

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那十多公里的峡中道路,除了偶尔坐车经过外,大多数是骑自行车或步行经过的,所以对那段公路的曲直、长短了如指掌,甚至连路侧的山崖形状、林木种类、里程碑位置也烂熟于心。半是翡翠半是山,湟水如线在其间,那时,尽管青藏铁路从峡南侧穿过,绿树掩映的山里修建有长长短短、时隐时显的九个涵洞和隧道,但除了火车的汽笛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偶尔打破峡里的宁静外,行走在绿环翠绕、行人寥寥的路途上,听耳畔湟水的哗哗声、山鸟的啼鸣声,真有点步入世外桃源的感觉。

从石板沟进峡,过北沟口拐过一个山湾,前面便是峡中有名的古迹佛尔崖。由于路基抬高,排水不畅,右侧刻有佛像的摩崖石刻已失去过去伟岸挺拔的气势,整体显得阴暗潮湿,外观猥琐。当年崖前湟水澎湃,隔河青杨冉冉,几亩农田,间或飘出几缕炊烟,那是湟源东峡乡黄草湾村的地界。记得多年前河滩乱石间有块一间屋大小的巨石,朝天的一面刻有二尺见方的榜书大字:“山高水长”。“山高水长”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由丹噶尔厅抚边同知黄文炳所题,笔力酣畅,气势磅礴。当年该石刻高悬于路侧苍崖之上,形色笔画,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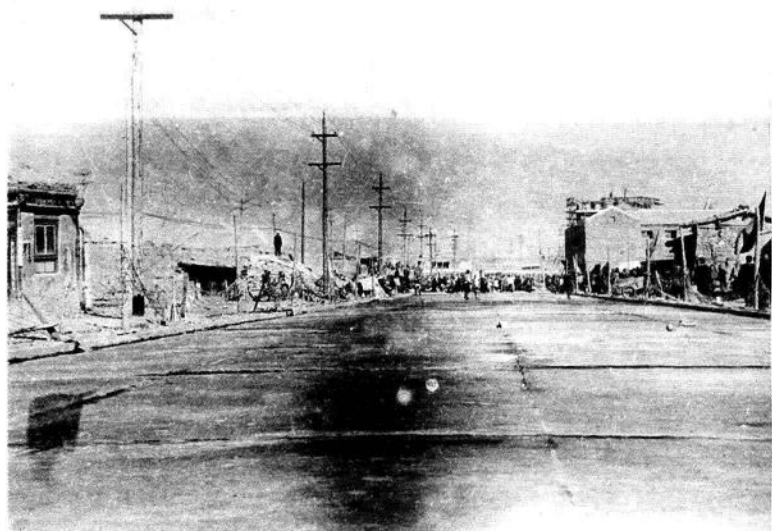
藓之中,山草摇曳,红绿相映,更显得古朴而鲜艳。今西湟高速公路的石板沟隧道西出口在此出山,仰卧河边的巨石已不知流落何方?

过峡中骆驼脖项村(又称下脖项),前行经国米滩(应为郭密滩,汉藏结合地名),上坡拐过山嘴,这里是峡中风光最好的地方,两山夹峙,状如犬牙;湍水汹涌,斗折蛇行;加之青杨白桦,连山接岭,满目苍翠,《丹噶尔厅志》也称赞这里“危峰壁立,南北陡峙,奇石突兀,有虎踞龙蟠之势;湍流湍急,回环曲折,蜿蜒如龙蛇之夭矫;丸泥东封,一夫当关之险”,是峡中风光最旖旎的地方。过山嘴顺路下行,只见路右巨石如壁,石面似砥,更有一堵石梁,从崖侧斜上山脊,山梁东侧岩面平整,遍布苔藓石花。更有野草缕缕如须,披拂崖隙;紫红豆科山花,丛丛摇曳其间。就在这仙境般的苍崖之上,有三帧摩崖石刻,分别为清嘉庆五年(1800年)西宁兵备道鄂云布所题的“海藏咽喉”、清宣统三年(1911年)丹噶尔厅知事康敷镛所题的“转危为安”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丹噶尔抚边同知封启云所题的“海藏咽喉”。

鄂云布,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元年授陕西汉中知府,嘉庆帝以他是喀尔吉善之孙、有良好的家风原因,“即擢升为甘肃西宁(兵备)道,再迁江苏布政使”。湟源峡东连陕甘,西接海藏,云山天横,路通一线。“海藏咽喉”一词,形象地概述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加之阴书行楷,字迹饱满,酣畅流利,神采飞扬地显示了这位大清地方官员高超的书法艺术和对湟源峡军事要冲的高度关注。

近百年后,云南普洱府思茂厅人封启云任丹噶尔厅同知,在那清末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关心民苦,恪尽职守,拿他的话说:“千里云烟飞眼底,万家忧乐系胸中”,表现了其深沉的忧国忧民思想感情。他在游历湟源峡时,因“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只得在鄂云布所题石刻的上方,即前段所说的山坡“石墙”上,朝东横题“海藏咽喉”四字,以表达对鄂云布所题内容的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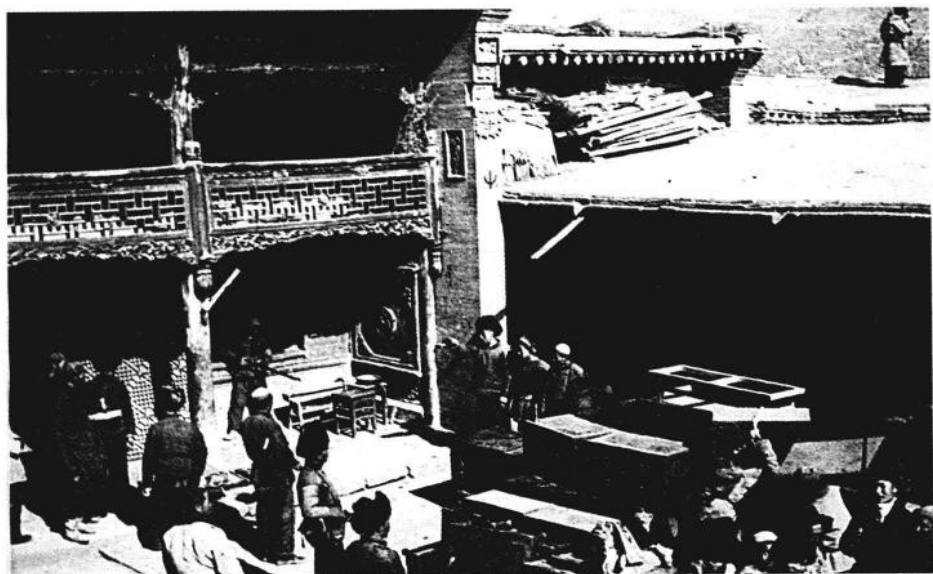
丹噶尔厅知事康敷镛所题的“转危为安”石刻是峡中惟一幅与时局有关的摩崖石刻。康敷镛(1870~1938年),字陶然,西昌礼州人,光绪癸卯科举人,著有《青海记》四卷。清宣统三年夏五月,在义和团的影响下,今湟中西纳川爆发了以李旺为首的“黄表会”反清起义。六月初一,起义农民西攻丹噶尔,



修建中的黄河路

春耕





土改运动中



文昌阁(旧称三层楼儿)



谈心



康敷镛在得到刘朶六的告密后紧闭城门,在西宁府总兵张定邦所派副将邓威林的配合下,起义军全军覆没于湟源西乡纳隆沟,事平之后,康敷镛在峡中勒石铭功,此即这幅石刻的缘由。

随着穿峡而过的 109 国道的拓宽和西(西宁)倒(倒淌河)一级公路的建设,峡中摩崖石刻处能触发思古幽情的风光已不复存在,真使人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尽管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有的摩崖石刻被移位重建,有的已不复存在,连同那古朴苍劲、水乳交融而充满沧桑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已一去不复返了。

人间仙境仙米峡

仙米峡地处我省海北门源县,

是浩门河流经门源盆地后进入北山峡谷中的一段。它的下游是门源县珠固乡,再下面是互助县加定乡,即有名的互助北山。从互助十二盘下来,经巴扎,过甘禅口沿岗青公路向西行,便进入了仙米峡。仙米峡因仙米寺而得名。仙米寺又名“显明寺”,藏语称为“仙米具喜兴旺洲”,位于浩门镇东 36 公里的讨拉沟南端,即今仙米乡政府所在地大庄村,南距浩门河约 4 公里。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明万历十二年(1584 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此倡议建寺,明天启三年,当地僧人袁噶嘉措(即第三世阿穹佛)从西藏叶尔巴寺请来拉日堪钦·才旦顿珠主持修建了仙米寺,不久,郭隆寺(即互助佑宁寺)的小松布旦却坚赞来此主持寺务,开始扩建寺院。在小松布旦却坚赞的策划下,建成四层楼高的大佛堂和有 60 根柱子的大经堂,并设立了显宗学院。后寺僧增至百余人,逐步发展成为海北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冠盖一方。仙米寺是原门源哈尔岱、本加、万果、桑巴、秀保等部落供养的寺院,以风景优美、建筑精湛而闻名于世。仙米寺修成百年后,因罗卜藏丹津之乱,雍正二年(1724 年)五月,在平叛中被清军焚毁。第二年,清廷派一等侍卫、散秩大臣达鼐来青办理善后事务,寺院得以重建,并赐寺名为“显明寺”。寺院周围环山,松柏四围,清澈的讨拉河从寺前流过,加之寺院依山而建,高低错落,远远望去,宛如多层楼台组成,真有“楼台玲珑五云起”的味道。同样,峡谷里还有朱固寺、班固寺。朱固寺,藏语称为“朱固具喜法轮洲”,位于门源浩门镇东 72 公里处的解放村,起始于明代后期,当初只是一座

藏僧修行的静房。清顺治元年(1644年),赞布·顿珠嘉措资助静房僧人仙米尼丹巴等将静房扩建为寺院,定名“朱固寺”,后毁于罗卜藏丹津之乱。清雍正十年,二世敏珠尔罗桑·丹增嘉措主持重建。当初,赞布·顿珠嘉措建成朱固寺后,于1650年开始创建大通县广惠寺,因先有朱固寺,后有广惠寺,故历史上有朱固寺是广惠寺之母的说法。

雄伟壮观的祁连山和达坂山自西北而东南,如巨龙对舞,长虹横空,在河北留出了一块富庶的门源盆地,“门源油,满街流”,蜿蜒流淌的大通河(也称浩门河)经平坦而富饶的盆地,过百里花海,在两山夹持下,最后进入了仙米峡,数十公里间,巍峨陡峭的南北山犬牙交错,无可奈何的大通河只得斗折蛇行,在大山的缝隙中寻找出路,时而南拐,时而北行,一路留下了“骆驼脖子”、“狼舌头”等一些奇怪的地名,也留下了一些肥沃的冲积滩地。这些滩地和河边缓坡上,如缀珠联玉,坐落着一些不大的村庄,从峡西口的索卡滩开始,到峡东口的甘禅口为止,仙米峡里竟有大大小小的村庄数十个之多,其中有一个地处北岸向阳的村庄,竟叫作“梅花村”,好漂亮的名字啊!

从仙米峡西口到甘禅口,岗青公路纵贯全峡,公路的绝大部分地段在大通河南岸。由于峡内山势险峻,河水流淌湍急,许多地段竟有180度的急转弯,特别是被号称为“骆驼脖子”的那一段,从北山伸出的、像鳄鱼脊背一样的一段山脊,瘦骨嶙峋地像墙一样横亘在河道上,逼得咆哮的大通河拐过“墙角”,又立马折回北去。梅花村附近也有座“毛公山”,它是河北岸向南突出的一座山梁,每当夕阳西下,暮色四起,大山成为“剪影”的时刻,你从门源园艺场东侧远望,就会看见伟人仰卧在天地之间,神态安详,就连那颗“痣”也显得十分清楚。险峻的北山向阳而略显干燥的山坡上长着较为稀疏的柏树,这些柏树像大山的瘰子,紧钉在绵延数十公里山坡上,不畏酷晒,不畏干旱,在陡峭的山崖上展现着生命旺盛的绿色。河南岸同样是险峻的达坂山,由于地处阴坡,青翠的松树从山脚开始,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坡面,直到山脊。临近河边的山脚地带,夹杂着白桦、山杨和灌木。山区多雨,因有潮湿的气候滋润,不知名的藤蔓杂草将地面遮盖得严严实实,大山就像穿了一件厚实而华丽的衣服,看不见北山那样裸露的“肌肉”。北山青灰,像男子,充满了阳刚之气;南山苍翠,像少女,充满了阴柔之美。而流淌在峡谷中的大通河,像飘浮在它们

中间的淡青色长绸，千百年来一直与山川共舞。穿行在仙米峡中，真像坐在一叶生命之舟中，在青翠的大海波涛中漫游。

说“腊八”

过去的儿歌中有“过腊八，宰瞎娃（指

猪）”的词儿，每年“腊八”节前后，农村里家家户户忙着杀年猪——这就意味着“年”（春节）快到了，怪不得那些盼望着过年的娃娃们编出了这样的词儿。古人把农历十二月“合祭众神”的祭祀活动叫做“腊”，由此而把十二月叫做“腊月”，腊月初八，自然就简称为“腊八”。腊八是腊月里的大节日，过此节令，“年味”就会越来越浓了。据说“腊八”的由来，起始于宋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天，我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习俗上都要吃“腊八粥”，除了合家团聚食用外，还要敬神祭祖、馈赠亲友。据史料记载，过去朝廷、官府、寺院也在熬“腊八粥”，因这一天据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道之日，故又称“佛成道节”，所以佛徒们多托钵化缘，把化得的各种米、豆、谷和杂果共熬一锅，称之为“佛粥”，施舍给前来寺院就食的穷苦人，以广结善缘。

也许是“十里不同俗”的原因吧？青海人过“腊八”，吃的却是“麦仁”饭。寒冬腊月，河湟谷地滴水成冰，井口边、山涧旁、河沟畔，到处都有晶莹的冰滩。腊八的头几天，家庭主妇们就把打簸干净的麦子收拾好，打发家里人到冰滩上“剥(chuan)麦仁”。所谓“剥麦仁”，就是在冰上凿个冰臼，把麦子倒入其中，用木杵捣，直捣到麸皮脱落，然后拿回家去，簸去麸皮，即成“麦仁”。而在熙熙攘攘的城里，时近腊八，就有人带着“麦仁”走街串巷，给图省事而爱尝鲜的城里人送来过“腊八”的原料。腊八的头天晚，主妇们把洗净的麦仁放入锅中，与切成块的牛羊（猪）肉同煮，外加姜皮、花椒、草果等佐料，经一夜文火，煮熟成乳糜状，此即麦仁饭也。原料虽略有不同，但与内地的“腊八粥”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河湟谷地还有“腊八”献水吃冰的风俗，腊月初七晚，家中长者虔诚地做过一定的燃表点香仪式后，还要很庄重地敬献一碗或一碟清水，以揣测来年庄稼年成的好坏。经过一个严寒的夜晚，清晨一看，敬献的清水已成了晶莹剔透的一块冰坨。长者们拿着冰坨，就像古人能从龟甲的裂纹推测出吉凶

福祸一样,对着冬日透着干冷的日光,端详着冰块里面的“奥谜”。也许是水结冰时物理变化的微小差异,也许是其它的原因,冰坨里竟然有大小不同的圆形、长条形气泡状空隙,老人据此便煞有介事地预言:圆形泡状空隙多,暗示着明年豆类作物将有好收成;同样,如果长条形泡状空隙多,那就是预示着明年青稞、麦类的年景好,并以此作为来年春耕时种何种作物的参考依据。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那些以种庄稼为生的父老们可怜的良好用心。“占卜”完毕,然后敲碎冰,分给家人啃嚼,说“吃了腊八冰,一年肚不痛”。

腊八的早饭,自然是吃“麦仁”了。锅盖一揭,异香扑鼻,首当敬神祭祖,然后长幼有序,依次入座。“麦仁”饭不油不腻,食之可口,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就像五月端午节送韭菜包子一样,作为馈赠亲友的“麦仁”,也给亲戚朋友带去了“腊八”主打食品的醇香和亲人的思念。麦仁饭制作简便,食后唇齿留香,虽是青海的一种节令食品,但作为青海的一种地方饮食文化,从心底里说,确实独具特色。

民谣里说“腊月二十三,灶家娘娘要

说“小年”

上天;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春节还未到,但从这天起,连空气中也充满了过节的气息。腊月二十三,人称为“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从此,春节的序幕渐渐拉开了。盼望着“过年”的娃娃们,早已等不及“年”的到来,街巷里已传来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

腊月二十三的主要节目是“祭灶”,就是祭祀灶神爷。据说灶神爷是天上玉皇大帝封的,他专管普天下各家的灶火,官号是“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其它的神仙在天上各有各的官府,各司其职,惟独灶王爷他“插队落户”到人间,与老百姓“同吃同住”,每天对“东家”进行24小时的监督考察,看你一年内是否有善举,还是有恶行?然后等到腊月二十三,“灶神上天白人罪状”(《抱朴子·微旨》),回天宫向玉皇大帝“打小报告”。玉皇大帝根据灶神爷的禀报,然后对这家进行奖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主人家新的一年内是否平安,就看灶神爷汇报的好坏了。灶王爷短短的7天“述职假”满后,大年三十又打道回府,对这家再进行新一年的监察。正因为他会打“小报告”,人们对灶神爷是很敬畏的,近不得,远不得,生怕惹了他,就像《论语》中说的“与其媚于奥,



参军



一军团进军青海途中



西宁解放前夕，当地洽安维持会等
待迎接解放军



解放军进城



宁媚与灶”。——与其巴结内廷当官的，还不如巴结好灶神爷。

过去，人们家家最圣洁的地方，都供着灶神爷的神位，有的人家还专门做有精雕细刻的“灶爷堂”，即使没有灶爷龕的人家，也要买张灶神的神像，恭恭敬敬地贴到墙上。两边还贴有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回宫降吉祥）”；或“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横额一律是“一家之主”。

民间诸神中，灶神爷的资格是很老的，基本上是神中的“元老”，据说早在我国上古的夏朝，他就成了民间尊崇的一位大神。关于灶神爷的来历，据大学者孔颖达说，（上古五帝中的）颡项有个儿子名叫“黎”，后称祝融，被祀为“灶神”；而司马彪更具体地说“灶神着红衣，状如美女”。而河湟谷地祭祀的灶神是夫妇，更信仰的却是“灶家娘娘”，所以有“腊月二十三，灶家娘娘要上天；腊月二十四，打发伙计家里去；腊月二十五，掌柜的宰下个大年猪”的民谣。也许是女性更能体谅民间的疾苦，所以有“灶家娘娘”在，人们对她“回宫”禀报是较为放心的。

祭灶之前，家中已烙好了“灶饼”，河湟谷地人家的灶饼是按家中人数准备的，人有几口，饼就准备几个；还准备了料瓣（磨碎的豆粒）、象征性的草捆（即两三寸长的小草捆），因灶神上天时“路途遥远”，所乘的坐骑一路上还得饮水、吃草料。正因为如此，城镇上这几天卖炊饼和“灶马”（即在纸上印有备鞍的马）的生意也很红火。二十三日晚饭后，人们在清扫干净的灶神牌位前敬献糖果（灶糖）、灶马、灶饼、清水、料瓣、草捆，然后点灯上香，并虔诚祷告：“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神上西天；有灶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内地还有用烧融的灶糖涂抹灶爷神像嘴的风俗，认为灶神的嘴甜了，就不会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他的坏话。

庄重的祭灶仪式结束后，等到神像前灯灭香尽，人们便撕下上年的灶爷神像和两侧的对联，与草捆、料瓣等一起焚烧、抛洒，以“打发灶家娘娘快上天”。这时，屋外响起爆竹声，也就在这人间无“神”的几天日子里，“年”也一天天到了。

闹元宵



喜庆的春节好像还未过去，元宵节又在连空气中也“充满着甜蜜”的时光里缓

缓走来。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因正月为一年之首,首为元,夜为宵,也是新的一年月亮头一回圆,故称元宵节。至于此节的来历,尽管说法不一,但比较认可的一种是起始于我国汉朝。当年汉明帝刘庄提倡佛教,他听说佛教徒在正月十五日隆重点灯,瞻仰佛祖的“舍利子”,于是就命令这一天不但皇宫和各寺庙要点灯敬佛,士族庶民也要挂灯膜拜。由于皇帝提倡,从此这一风俗就传承到了现在。

河湟地区虽地处偏远,但“衣冠简朴古风存”。元宵节这一天,不要说一街彩灯流银河,满城珠翠过龙门的省垣;不要说民和官亭的“火把节”,不要说乐都七里店的“九曲黄河灯会”,不要说湟源、湟中的牌灯,就是地处穷乡僻壤山村,十五还没到,村里打碾场上也已栽好了秋千架,人家的屋檐下也已树起了高高的“灯杆”;村上新出嫁的姑娘也已按照古老的风俗,在正月十五前带着面带羞涩的新女婿前来娘家“躲灯”;春节后开始的“社火”到正月十五就算达到了高潮,尽管鞭炮的响声没有城镇里的那么密,就像空山放冷枪一样,这儿一声,那儿一声的两响炮,也烘托出了乡下正月十五的欢乐。社火场上,一年难得有几天清闲的人们脸上涂满了厚厚的油彩,穿着大红大绿不合体的衣衫,随着颠狂的鼓点在狂扭;“拉花姐”、“哑巴儿”、“胖婆娘”,或庄重,或诙谐,各呈风采。据说社火进家院能带来福气和平安,那些家里炒好粉条大肉的人家早已在门前摆好香案,以迎接那些耍龙、舞狮、跑旱船的,踩着高跷、头戴绢花的“大身子”。你看哪,浑身冒着酒气的人们唱着“这一个庄廓四四方,四面八方的金砖镶;养哈(下)个姑娘戴凤冠,养哈(下)个儿子状元郎”的歌,正摇摇摆摆地向家里扭来……到处都在“闹”,正像清末西宁诗人朱耀南所说“六街灯火最晶莹,锣鼓喧天闹满城;直与蟾光同不夜,疑是人在雪中行”。人说正月里闹元宵,果然名不虚传。

当月亮爬上东山,各家各户的灯笼里也发出了暖暖的红光,余兴未尽的人们又在自家的巷道里点起连成长串的一堆堆柴草,然后不分男女老少,在飞溅的火星中争先恐后地从火堆上跨过,俗称为“跳冒火”或“跳火落巴”,企盼能除去旧年的晦气,然后一身轻松地开始新的生活。



清明时节

记得有首唐诗是说二十四节气中

清明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至清明，正是河湟谷地柳丝吐绿、杏花扬红的季节，依照古俗是祭祖的日子，清明上坟习俗由来已久，民间小调《孟姜女哭长城》中就有“三月里到了三清明，家家户户上新坟；人家们上坟成双对，孟姜女上坟独一个人”的唱词。但西宁以西农村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很久以来，这一带上坟“烧纸”的事儿早已在田社（天赦）办了，所以人们只把这一天当作三月里的一个节日，拌凉面，吃凉粉。但农事不等人，仍在农田地里忙活，但这只是区域性的习俗调整而已。清明时节，春满乾坤，到处清新明丽，度过灰蒙蒙冬天的人们早已按耐不住外出的欲望，纷纷相携野游，欢乐赏春。

清明上坟祭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的时候，相传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他国。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前程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的一位名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得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忍痛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19年后，重耳回国当上了君主，后来成了著名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执政后，对当初那些追随他并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却惟独忘掉了介子推，后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喊冤叫屈。晋文公猛然想起旧事，心中觉得非常惭愧，于是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让他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就是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原来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亲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派军士上绵山搜寻，可是没有找到。有人出了个馊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面，只要大火一起，介子推肯定会自己走出来。晋文公于是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上山一看，只见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懊悔不已，哭拜之后安葬了遗体，便把烧山的这一天定为介子推的祭日，举国禁火。《荆楚岁时记》中说“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

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则雨雹伤田”，后遂成为“寒食节”。因“清明”和“寒食”时间相近，据《唐会要》记载，早在唐大历十二年（唐代宗年号，即777年）二月十五日，朝廷就专门为此降旨“自今以后，寒食同清明”。从此清明这一天人们既祭祖，又郊游，真是哀乐同在。

《朱子家训》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河湟地区虽属边僻，但对上坟祭祖一事，向来非常重视。祭祖的头几天，人们就忙着准备各种祭品。在过去生活寒难的岁月里，心有余而力不足，人们拿不出多少孝敬祖先的祭品，就是几张薄纸中包裹的几块“油香”，也成了娃娃们祭后争抢之物。随着生活条件的提升，奠的、烧的、摆的、撒的，应有尽有，儿女们纷纷拿上自己家老人们生前没有享用过的食品饮料，摆洒在春草刚刚染青的坟地上，以表达自己对老人们未尽的心意和缺憾。伴随着飘飞的纸灰，望着寂静无声的土堆，追思着九泉之下的恩泽。

人们上坟祭祖除了焚烧纸钱外，以酒肉祭奠逝者的习俗由来已久，《孟子·离娄下》中就有“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故事中说：齐国有一个人，家中有一妻一妾。丈夫每次出门，回家时必定是吃得饱饱地，喝得醉醺醺地。有一次，妻子问他，每次和他一道吃喝的是些什么人？他说全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妻子很怀疑，私下里给妾说：“丈夫每次出门，总是酒醉肉饱地回来；问他和些什么人一道吃喝，据他说全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但我们却从来没见过有什么有钱有势的人物到家里来，我打算悄悄地看看他到底去些什么地方。”第二天早上起来，她便悄悄地尾随在丈夫的后面，走遍全城，可没有看到一个人站出来和她丈夫说过话。最后却见丈夫到了东郊的墓地，向祭扫坟墓的人要些剩余的祭品吃。没吃饱时，又东张西望地到别处去乞讨。他的妻子回到家里，哭着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们终身仰望并依靠的人，而他竟是一个这样无用的人！”妻妾二人在庭院中一边哭泣，一边咒骂着那个窝囊的丈夫。

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依据介子推和齐人这两则故事，曾写过有名的《清明》诗，其中就有“人乞祭余骄妻妾，士甘焚死不公侯”的句子，鞭挞和歌颂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介子推宁肯焚死不受文公封赏，这里有个气节和人格尊严问题，与齐人“乞祭余”而骄妻妾的鄙陋形象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军军乐队庆祝
西宁解放

北门城楼下的演出





解放军进城

城墙下的民居





话中秋

农历八月十五日被称为中秋节，它与元宵、

端午节并列，是我国民间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现在，中秋节已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传统节庆文化，将会得到更多人们的重视。“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的一部著作《礼记》中，说它源于古代帝王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因为八月十五恰好为三秋之半，故名“中秋”。秋日天高云淡，气候凉爽，中秋之夜，皓月如盘，银光满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然会勾起游子思乡的情绪，家人也企盼能阖家团圆，所以人们又称中秋节为“团圆节”。

民俗是历史的活化石。中秋赏月这一民俗由来以久，“天上一轮才推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东晋高士谢尚、袁宏中秋之夜曾在南京牛渚（今安徽马鞍山采石矶）泛舟，吟诗赏月，留下了“牛渚玩月”的历史佳话；北宋名家苏东坡也在中秋之夜写下了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名词。而我们西宁也以“龙池（今苏家河湾药水泉）夜月”入选古湟中八景。有关中秋节的逸闻趣事不胜枚举。说到中秋节，人们自然会想到吃月饼，圆圆的月饼是吉祥、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人们都企盼能阖家团聚，品饼赏月，谈天说地，尽享天伦之乐。中秋之前，湟水谷地自东而西，依次麦熟，各家主妇们都把蒸月饼当成展示自己面案功夫的绝好机会。和好发着麦香的新面，巧妙利用红糍、姜黄、苦豆粉的不同色彩，做出千层饼般的瓢、不同图案的面饰（俗称花花），然后入笼，蒸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艺术品般的月饼，作为中秋节的主要食品。按照传统风俗，中秋之夜“不论贫富，必食西瓜”。所以每当入夜之时，家中长者就会在院中摆上香案，供上月饼和西瓜、沙果、花檎等果品，等候月亮的升起。当皎洁的月光撒下一地清辉的时候，在虔诚的长者率领下，全家表情肃穆地做完繁琐的祭月仪式，然后在欢声笑语中，分食西瓜和果品。也许有的老奶奶会给儿孙们讲起月亮里头有棵梭罗树的传说，也许有的老爷爷还会给儿孙们讲起嫦娥奔月、吴刚献酒、蟾宫折桂的故事。

“每逢佳节倍思亲”，就像端午节河湟谷地人们互送韭菜包子一样，第二天，人们会带上月饼和其他礼品，风尘扑扑地去看望自己的亲戚，尽管亲戚们也同样带着自家蒸的月饼，也忙里抽空前来看望，虽然是互换“馍馍”，但里面

包含的亲情、乡情，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得清的。

如今，到中秋时西瓜早已过了诱人的季节，各种瓜果冬夏不分，争奇斗艳，沙果、花檎早已退隐；而油晶晶、发着焦黄色的月饼却成了中秋节的新贵，包装华美，色彩艳丽，大多数身价倍增，有的又赋予了新的用途。但我们仍怀念那揭去笼盖后冒着热气、像绽开的牡丹一样的月饼，因为它就像质朴、率真的河湟老百姓一样，没有虚伪，没有造作，有的就是直露，有的就是坦诚。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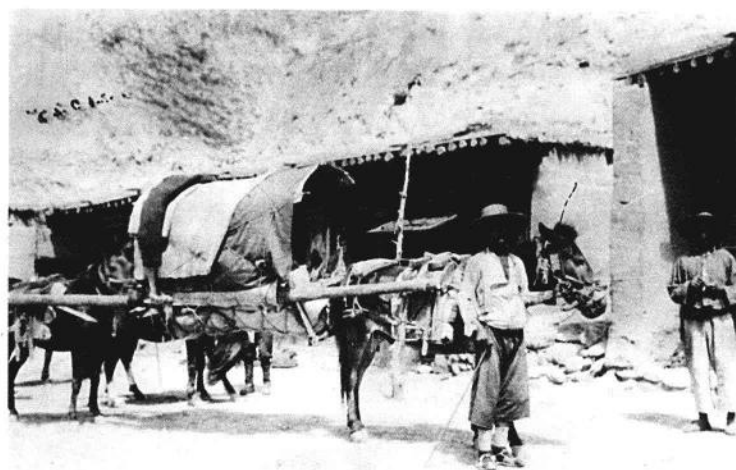
岁岁重阳

毛主席在《采桑子·重阳》一词中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因中国古籍《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农历九月九日，两九相逢，所以自古人们称之为“重阳节”。“九”是数字中最大的数，又因谐音，同于“久”，故人们把它与“长寿”连在一起，企盼能健康长寿，又给重阳节赋予了尊长、敬老的含意。1989年，我国特地定此日为“老人节”，就是这个原因。

据说重阳节形成于我国战国时期，十里不同俗，有的地方人们食蓬饵、佩茱萸，有的地方人们赏菊、登高。如《西京杂记》中就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曰令人长寿。”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一诗，成了重阳节思亲怀旧的绝唱。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还在唱“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飘流在外头”。

佩茱萸、饮菊花酒、登高之习俗，传缘于东汉时桓景的故事。桓景随方士费长房修行，有一天，费忽对桓景说：“九月九日晨，速带茱萸和菊花酒到高山上，佩茱萸饮菊花酒，可避灾。”费大惊而照办。晚归，见家中六畜尽死。从此，相沿成俗，每逢重阳，人们纷纷佩茱萸、饮菊花酒、登高，以求趋利避害。东晋时孟嘉曾任东晋大司马桓温手下参军，重阳这天，桓温邀大家同登荆州龙山，酒后孟嘉迎风远眺，“发短偏遇落帽风”，后人因称其地为“落帽台”。

九月，正是菊花凌霜傲放的时候，故文人雅士又称九月为“菊月”，重阳节为“菊花节”。菊花，以黄为贵，又称“黄花”，以岁寒傲霜的气节倍受人们尊崇



驮
轿

捻
线





驮水



水磨



和喜爱,被列入竹菊梅兰四君子之中,千百年来,人们歌之咏之。唐末起义领袖黄巢称赞它“飒飒西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称赞它“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毛主席称赞它“战地黄花分外香”。闲适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晋·陶渊明) 相约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唐·孟浩然) 在外时,“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 (元·文森) 失意时,“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唐·杜牧) “赏花饮酒过重阳,花自清香酒自香;落叶西风秋寂寞,天教佳色殿群芳。” (晚清西宁名士基香斋) 就像端午与粽子、中秋与月饼一样,重阳与菊花也是分不开的。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西宁早晚虽已略显凉意,但晴空万里,景明眼宽,因而除了赏菊之外,也有登高望远、强身健体的习俗。当年西宁古城墙未拆毁时,就有人选取登城环游方式,远眺四郊,俯瞰万家,以度重阳;而更多的人们在黎明前,扶老携幼,攀北山、登南山,祈求祛除病患,讨个平安康健;文人雅士也相约登高怀古,望远抒怀,同时也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去年此日作重九,曾向山头醉一斗”。清代西宁县令靳昂的诗,形象地描述了重阳节土楼山顶、宁寿塔下的热闹状况,多少“高阳酒徒”在山顶喝得天翻地覆,难辨东西;“众人步至前山巅,举袂凌空欲登仙”、“登高凭一览,多少俗心空”,不但记述了他们畅游的过程,更描述了目极八荒、心驰万里的酣畅情怀。

盛世多喜事,黄花晚节香,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们更把重阳节当作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节日,举办登山、书画联谊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给古老的节日注入了新的内容。

故乡的回忆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忆江南》中

有这样的句子“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说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但我最忆的却是童年时那贫瘠而略带苦涩,但很温馨的故乡。那时,我的故乡是一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后是一堵连绵起伏的大山,村前的荒滩里有一块块农田,20 多户人家很不规整地分布在簸箕形的山湾里。向阳的山坡下排列着六七户人家,可能那是最早来这里拓荒的先驱,选择了穷山村里

最好的居住位置，因而成了村上最早的“坐地户”，人们称他们是“阳坡人”；后来者住在山湾阴坡的山脚下，因人们把山脚俗称为“山嘴嘴”，所以称他们是“嘴嘴上”。阳坡人和嘴嘴上之间，是几片土层厚实的田地，人们按照风水先生的观测，在那里分别扎下了他们的祖茔，让自己逝去的祖先们长眠在穷山村最好的坟地里，以关照子孙们能够更好地繁衍生息。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分家另居者又选择阴坡下的山洼打起庄廓，于是又有了称作“湾湾里”的几户人家。庄廓与庄廓之间有巷道相连，为了保护养活人的田地不被牲畜糟蹋，巷道两侧，一般都筑有一人高的弯弯曲曲的土墙。虽然村上有六七个不同的姓氏，但大家讲究辈份，长幼有序，叔侄相称，记得当年门巷洁净，人们外出相见，拱手作揖，相互问安，很有点“衣冠简朴古风存”的味道。荒滩中虽然有红崖河滩、中滩等地名，但除了夏天偶发洪水之外，河滩里满是青灰色的石头，土层厚的地方，被人们开垦成一片片像补丁一样的庄稼地，地里的石头被一块块捡起，堆积在田边或田中某一个地方。一年到头，人们盼望着老天的雨水，尽管那时我尚年幼，但受环境的熏陶，和大人们一样，心里也充满着对雨水的渴望。也许是“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的缘故吧，尽管就是这样一个“拉羊皮不沾草”的苦地方，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仍然怀念着那里的每一个沟沟坎坎，那里曾流逝过我的童年岁月！那里的“土馒头”下，长眠着我的祖辈亲人！

（一）长空雁鸣

每年秋天，村前村后的地里闪动着丰收的金黄色；蔚蓝的天空也像水洗了一般干净，远处屏风一样的南山也褪去了一夏天雾濛濛的色彩，明净地露出了棱角分明的峰峦。像大山和荒滩的补丁一样的庄稼地里，早熟的青稞、大麦和燕麦已变成了捆子，闪着金黄颜色的麦田也开始收割，只有洋芋地里还是一片葱绿。收去庄稼的土地，就像剪去了羊毛的绵羊，形状丑陋，顿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却成了牲畜们快乐的田地，它们一个个高兴得摇晃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啃吃着原来夹在庄稼里鲜嫩的苦苦菜、莴苣、野燕麦和野苦荞，懂事的农家娃娃们手提笼笼，按大人们的吩咐，低头捡拾着遗留在田野里的麦穗。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勾喽—嘎啦、勾喽—嘎啦”的声音，循声望去，就会看见空旷的天空里，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很有节奏地挥动着翅膀，不知疲倦地向南山方向飞去。它们确实像个大大的“人”字，在秋日明净的天空里，翅膀



上闪烁着太阳银灰色的光。排在最前面的大雁,如旗帜,像镞头,又简直像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而后面的却像训练有素的兵卒,按照固有的队形,在有节奏的“勾喽—嘎啦”声中奋力前进。

南飞的大雁,每年秋天总是如约而来,排着整齐的队伍,划过长空,向遥远的南山后飞去,只不过有时雁阵经过时天色已晚,也许它们的宿营地还远着呢,仰望漆黑的夜空,深邃而渺茫,但从那儿仍旧传来寒雁凄凉的鸣叫声。……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大雁南飞的队伍,再也没有听到过那“勾喽—嘎啦”的声音了。

(二)金黄的树叶

故乡最美丽的景色,印象中除了春天麦苗出土遮盖地面、杨树淡绿色嫩叶初展时外,就算秋天了。在秋高气爽的秋日里,当其他地方的杨树还在抖动着深绿色的树叶时,小湾干沙地上那几排皮粗枝硬的杨树早已挂满了金黄的树叶。秋日明净的阳光穿透了叶片,它们就像一片片灿烂的金箔,在暖和的轻风中尽情地炫耀着自己。

小湾是村南的一块沙滩,也是去邻村必经之地。从我记事时起,那儿就栽有几排杨树。据说耐旱的杨树本来就喜欢在沙砾地中生长,但从我上学到小学毕业,在长长的五六年里,它还是那个样子,只不过树皮更粗了,皴裂布满了树身,完全失去了嫩绿的色彩。据大人们说,跟它同时栽在别的地方的树,大部分已经盖房了,其中有的已经成了栋梁之料,但小湾里的树还是跟人的胳膊一样粗,简直成了杨树中的侏儒!

小湾是一处干旱的沙滩,一夏天里除了偶发洪水之外,这儿一年到头很少受到水的滋润。虽然无力的树根拼命向土层深处寻找水分,但深处仍是累累沙砾,那深褐色的毛根就像沙漠里寻找水源的骆驼,最后还是渴死在沙丘之间。在这么残酷的环境中,几排杨树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不容易啊!

每想到这里,我就更加珍惜那枝头早黄的叶子了。它像春寒料峭的时候,河滩里贴着地皮绽开的小黄花向人们预报春天信息一样,小湾杨树上的黄叶,也向我们预报着萧杀的秋讯。我们把片片坠落的叶片收集起来,用它的叶柄串在一起,套在脖子上,像带着佛珠的寺院和尚一样,双手合十,穿行在金灿灿的树林里。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留下的记忆,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小湾,现在已成了工业园区的一部分,那里机器在轰鸣,车辆在忙碌,记忆中那片闪动着明净、灿烂色彩的杨树林,只留在我的记忆里,它像一幅素雅而略带忧伤的油画,让我不时还会想起它!

(三)雪地的脚印

这几年,家乡很少下场雪,一冬天里,尽管也有过那么几天阴沉沉的天气,但金贵的雪花却像王母娘娘的眼泪,难得落下几滴来。干枯的荒山裸露着毫无遮挡的脊梁,把身上的沟沟壑壑暴露无遗,没有一点水分的野草随着人们脚步,在“嚓嚓”声中变得粉碎。偶尔天上飘下几片瘦削的雪花,毛茸茸地落到地面上,但很快就停了。“才下了一鸡爪儿雪!”人们失望地埋怨着。盼了一冬天,就这刚能看出鸡爪印的薄雪,竟成了一冬天的绝唱!就连往年常被白雪包裹的南山,也寒碜碜地袒露着灰色的峰峦。

俗话说“热雨冷雪”,记得小时候,如果入夜时浓云密布,寒气袭人,大人们就会说将要下雪了。果然后半夜,窗户纸映得一片明晃晃,出门一看,房檐上厚厚的一层雪,遮盖了檐瓦,院子里、墙头上、树枝上,坑坑洼洼里都填满了厚雪,整个屋外就像发酵了的面团,到处显得敦厚而光洁。踏着吱吱作响的厚雪走出家门一看,村外山川一片明亮,除了积不了雪的沟坎、土崖显露出一坨一坨黑黝黝的色彩外,村前的原野、村后的土山,晶莹明丽,简直成了耀眼的童话世界!

洁白的雪地上,早已有了不少鸟兽的足迹,那一行行碎碎的“个”字形,是野鸡的足印;那椭圆形而间距大的足迹,是野兔奔跑时留下的;两瓣而且足迹间有拉痕的,是羊留下的;大而呈梅花形的是狼的足迹,而更碎小、印痕浅的是山鼠的……众多的足迹布满了洁白的雪地,那散落着团团羽毛或兔鼠毛、且雪上有血迹的地方,证明有的鸟兽在这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有些小洞口的雪呈现融化状,说明下面是某种小动物的安乐窝;有些草墩下足迹纷乱,说明小动物曾经在这里嬉戏打闹过。

多少年过去了,由于气候转暖,这里已经很少下雪了,过去一冬天被雪遮盖的阴坡,再也没有了硬邦邦的雪盖,即就是偶尔下一点小雪,雪面上也很少有鸟兽的足迹,那白茫茫雪地里纷乱的鸟兽足迹,早已成了遥远的回忆。



(四)荒滩的兔子

从前,村前有不少荒滩,掘开一两寸厚的土层,下面便是垒垒石头和沙子,土层稍厚一点的地方开垦出的农田东一块,西一块,就像荒滩的补丁。由于荒滩上土层薄,存不住水,只有一些耐旱的野草艰难地生长在那里,其中就有报春花、馒头花、左拧根(秦艽)、毛毛草、扫帚草、狗豆子等。短暂的夏天来临时,那里总有不少忙碌的虫儿,“臭婆娘”、土蛛蛛、蚂蚁、“装槽儿”、瓢虫等,而最多的就是那乱蹦乱跳的蚂蚱。每当天气燥热,它们就会飞到半空,舞动着猩红的翅膀,忽上忽下地唱着“啐—啐”的歌。

荒滩上长的野草中,扫帚草可说是野草家族中的“伟丈夫”,它像荒滩的“痼子”,一墩一墩地耸立在那里,傲视着周围矮小的“弟兄们”。扫帚草未抽茎时,就长着细而长的茂盛叶子,但不知什么缘故,牲畜是从来不吃它的,这也许就是它能在艰苦的环境里鹤立鸡群的原因。到拔节的时候,扫帚草抽出的茎干近一米,上面长着籽粒很小的穗,茎秆柔而不易折,所以成了那年月人家里扎笤帚的最好材料。记得那时人家里打扫屋子、台子,用的都是它。由于荒滩上没有其它可供小动物隐藏的地方,扫帚草也就成了兔子藏身、繁育的惟一选择。记得那时候,天空中常有苍鹰在悠闲地盘旋,没有高大树木和灌木庇护的荒滩毫无保留地袒露着自己,像兔子一类的小动物很难能在这里生存,扫帚草就成了它们惟一的藏身之地。它们往往选择一墩长得比较茂盛、人很少光顾的扫帚草,精心地整理草叶下的地面,不辞辛劳地叨来一些柔软的枯叶,打理成一处温暖的窝。可怜野兔外出寻食时机警地不时仰望天空,来去行色匆匆,即是这样谨慎小心,在这险恶的环境里,能存活下来的毕竟只是少数。有人说,他看见过兔子在走投无路的危急情况下,仰卧在地,四脚朝天,迎击从天而降的鹰爪,人们把这种斗法叫做“兔子蹬鹰”。但处于弱势一方的兔子,常常成为它们的猎物,很难在鹰隼的利爪下逃得性命。

(五)早晨的炊烟

几十年前,在那烧煨奇缺的岁月里,马粪是家乡农家厨房里的主要燃料。村上除了较殷实的几家在隆冬里能生个炉子外,绝大多数人家至多就煨个热炕。没个热炕,睡冰炕还可凑合,但人总得吃饭,厨房里可不能断了烧的。所以那年月,尽管柴火短缺,但每天清晨,人人家家的烟囱里总会冒出一缕缕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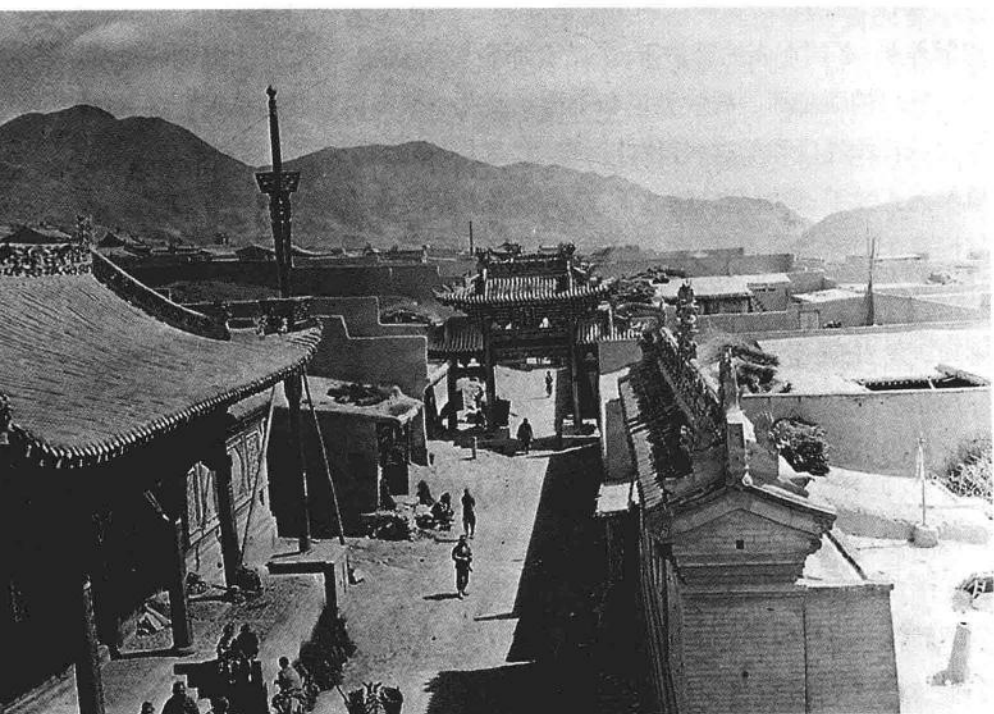
烟。俗话说,“三早顶一工”,那时候,天刚蒙蒙亮,巷道里就有了人语声、马蹄声,懂事的农家娃娃们也离开了暖和的被窝,身背背斗,手拿粪叉,沿着山间小道、平地埂坎,去寻拾马粪了。

从春末直到夏秋,川道和山上的田地里种有庄稼,村上的牲口和羊是不能散养的,必须在人的管护下,去啃食那些埂坎、地边和没耕地山坡的野草,以免牲口糟蹋庄稼。放牧牲口和羊群的活儿一般都由娃娃们承担,人们把集中在一起的牲口和羊群叫“伙儿”,青海“花儿”里就唱“老爷山上云起了,羊伙里羊羔儿喊了;越看尕妹越远了,破皮鞋提上着撵了”。在斜坡埂干上放牧,尕娃们有个明确的分工,负责上方的叫“上帮”,下方的叫“下帮”,前面堵拦的叫“浪前”,后面驱赶的叫“赶后”。每个牛马“伙儿”的后面都跟着几个拾粪娃,以捡拾牛马粪。

从深秋到初春,田野里一片荒凉,村上所有的牛马、羊群都被赶出去,让它们自由随意地到山坡、地边去寻食黄草,饲养惯了的牲畜们会在日落天快黑之前,挺着吃饱了的肚子,蹒跚地回到自己的家。在过去那民风淳朴、自给自足的岁月里,没有人会担心自己的牛羊被偷走,至多一半个羊混进别人的羊圈,第二天又会来到自己的家。由于牛马寻食的地点不一,这就忙坏了拾粪的娃娃们。他们在村前平川和村后大山里,一会儿爬山,一会儿下坡,为了一掬马粪,到处转悠,忽上忽下,累得头上冒着热气。经过多年的磨练,他们一个个练就了鹰隼一样的眼睛,能在数百米外,凭着地表颜色的差异,搜寻到荒草里、犁沟边、雪地上的马粪。在他们眼里,那一颗颗、一坨坨形状不一的牲畜粪便,简直就是大山奉献给自己的宝藏!因为只有它,才能使家里的烟囱冒出青烟。村上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开始烧早饭了,一个个烟囱里冒出的青烟袅袅上升,最后在半空中连在一起,形成一片厚厚的白雾,慢慢地向沟脑方向飘去,空气中弥漫着洋芋熟了的焦巴味,村上几辈子不变的早餐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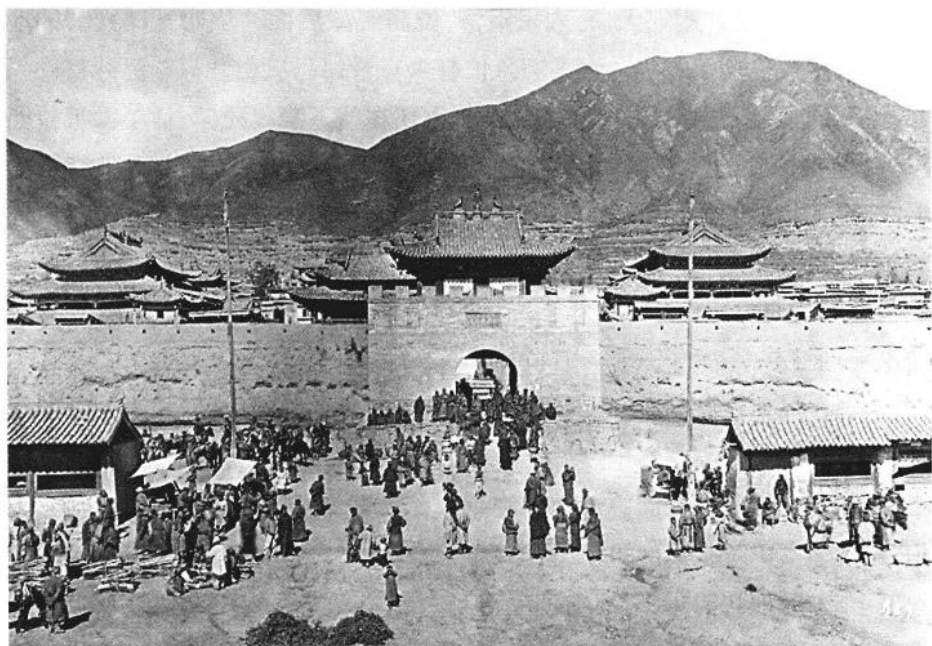
(六)狼

也许是从从小就听了有关狼的故事,心里一直充满着对狼的恐惧。那年月,田间除草是妇女一夏天的大活儿,她们早上出工时,还要将吃奶的孩子用背斗背到地里,喂完奶后,就将熟睡的孩子放在背斗里,以遮挡炎阳的照晒,自己再去田间拔草。据说邻村一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狼叨走的,当妈妈听到孩



丹噶尔旧街(左上侧只见屋脊的殿宇为关帝庙,是当时城内最为壮观的建筑之一)

扭秧歌



远去的古城



牧童读书



子凄厉的哭声时，叨着娃娃的恶狼已窜上了山梁。还有一家的女主人割田时，狼已窜到了跟前。吓昏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骑上狼背的，手舞镰刀，在喊“打狼！打狼！”同样也被吓坏的狼驮着她，没命地向地边跑去。从狼背上滚下来的女人从此疯了，还在不停地喊“打狼！打狼！”但没过多久就死了。

冬天，由于地里没有庄稼，人们就把羊群赶往村后的山里，到傍晚的时候，吃饱的羊们就会自己回到羊圈里。在我快9岁的那年，有天，家里养的20多只羊一只也没有回来。大人们还以为羊群混进了别人的羊圈，但打问到半夜还是没有下落。第二天，有人来报信，说高红崖后面一块叫“摩隆儿”的地里，有一些被狼咬死的羊。大人们急忙赶去查看，只见近20只羊已死得硬邦邦，没死的几只还在瑟瑟发抖，殷红的鲜血还在往下滴。死羊、活羊都被拉回了家，摆在外院的院坑里，每只羊的伤口都在脖子上，暗红的水血染红了羊毛。那年月，农家没有医治创伤的药，奶奶忙着用油炒面棒棒堵塞还有一口气的羊脖子伤口。从那时起，我就非常痛恨狼，心想：“你咬死一只吃上就算了，为啥要将全部咬死！”人们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贪婪、狠毒，确实是狼的本性。

那时，村上没有学校，我的小学是在三四里外的邻村上的，村上上学的四个娃娃相约，每天都要走过村南的小湾河滩。有天雪后的清晨，我们又走在小湾的路上，我落在后面边走边吃着一个煮洋芋。突然看见一只土黄色的“大狗”在雪地里迈着轻快的步子，自西而东向我跑来。那年月，村上没人养的野狗很多，人们把它们叫作“浪狗子”。到处寻食的浪狗子是不咬人的，所以我也没在意。“大狗”从我的面前窜过时，竖着耳朵，拖着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还歪头看了我一眼，径直爬上小湾梁梁。走在前面的几个同伴突然像清醒过来，大喊“打狼！打狼！”其实这时，它已经快跑到祁家坟了。

十多岁时，我跟着村上的牲畜群拾马粪，金贵的马粪是那年月农家厨房里惟一的燃料。有天，因为拾粪的娃娃们少，我将拾的马粪堆在高红崖的陡地边。晚饭后，伯父拉着家里的骡子，带着弟弟去驮粪。白天为了多干一点活，农村的晚饭一般吃得很晚，当他们出门时，已是星斗满天。年幼的弟弟紧紧地跟着伯父，借着惨淡的星光，走过了熟悉的河滩，来到红崖山上。当他们正在装马粪的时候，骡子突然竖起耳朵，打起响鼻，用前蹄不停地刨着地面。这不寻

常的举动,引起了伯父的警觉,当他抬头四望时,只见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闪动着一对对发绿的光点,而且围着他们转。这时,扶连罐(指可以驮在牲畜背上的连背斗)的弟弟也看见了,惊恐地望着伯父。伯父突然一边大声吆喝、怒骂着骡子,一边给弟弟说:“不装了,就走!”匆匆忙忙地牵着骡子下了山。直到进了村口,伯父才心有余悸地说,今晚上我们遇上狼群了啊!

现在,这里已成了工业园区的中心,夜里,明亮的路灯把高红崖照得一清二楚,再不要说狼了,就连个野兔也见不着了。

(七)弟兄山

弟兄山是村庄南面远处的一座大山,形状像个笔架,有着三个巍峨的山峰。其实,弟兄山是有名的拉脊山的一部分,它的西面有一座更高、更雄伟的山峰,名叫“拉摩勒”。民间传说里,那是一座凶神居住的山。

记得小时候,弟兄山的山顶冬夏都被白雪覆盖着。一冬天里,它像一堵白玉砌成的屏风,明镜似的矗立在蔚蓝色的天幕下;一夏天里,山脚下的积雪融化,草木葱茏,而它却像三个头戴白毡帽的弟兄,排在一起。现在,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弟兄们再也不戴“白毡帽”了,即就是寒冷的冬日,也就是披着一层薄薄的“轻纱”。我虽然怀念当年明晶晶的弟兄山,也怀念夏日浓雾环绕的弟兄山,但现在的弟兄山却冬夏袒露着自己,沟壑分明,展示着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弟兄山有个美丽的传说,听妈妈说,这个传说是当年她年轻时我的奶奶告诉她的。奶奶一辈子没来过这儿,只是远远地看过弟兄山,而我是从山脚下仰望过它的。多年前的一个盛夏,妈妈和我们来到大山脚下的马场沟,从这里仰望弟兄山,比起从村上看,要清楚得多了。妈妈此生这是惟一一次来到弟兄山下,为了更清楚地看看它,她曾艰难地爬上一条山梁。几十年前,这里长满了“蓝布籽”,绿油油的山草几乎可以遮住膝盖,而今天这里已被开垦成农田,金灿灿的油菜花正在炫耀着自己的美丽,空气中也弥漫着特有的清香,我们站在长有几棵树的山梁上,仰望在蓝天映衬下棱角分明的弟兄山。妈妈说,弟兄山上最东面的山峰是老大,中间的是老二,西面的是老三。弟兄三个虽相依为命,但结局不一样:老大因贪吃而最后涨死了,老二因饥荒而饿死了,老三因患恶疾流脓,最后也死了。按照妈妈说的一看,果然看见东面山峰有个臃肿



的山腰,褶皱较少;“老二”的腹部有个巨大凹陷,偏西的阳光斜照在那里,留下了一个硕大的阴影;“老三”的“胸部”那儿似乎发生过泥石流,裸露的砂石像大山的溃疡,长长地流向了“腹部”,大概这就是传说中“流脓死了”。

(八)大墩根

大墩根是村前红崖河滩边的一个地名,出村口沿背水路走到大路,两路交叉口处的地方就叫大墩根,地名的来历与这里有个大墩有关。过去,人们把趋利避害、祈求平安寄托在封建迷信上,按那年月的说法,村上如果有人突遭横死,或连续遇到不幸,就得求巫师禳解除灾。巫师禳解的办法之一,便是在鬼魅出没的地方建墩压邪,人们把土墩叫“镇墩”。那时,只有区区百十人的小村庄,周围就建有六七个镇墩,看来,小小的村子早已被魑魅魍魉团团围定了。村子南面不远处有两个镇墩,地名就叫“双镇子”;东面红坡岭上的叫“尕镇墩”,大沟鼻梁上的叫“红镇子”,岔路尖尖的叫“白墩”,因按巫师的吩咐,墩的上面用石灰刷成了白色,上面还搭建有一个小棚;阳坡根和红坡交界的地方也有一个,叫“大墩”;惟独村前大路边的那个墩最显眼,成了那一片地方的地名“大墩根”。

大墩根是村上与外界交往的关键地方,拉煤的、串亲戚的、进城的都要经过那里,小时候第一次见马拉轿车、皮车、铁车,甚至第一次见自行车,也都是在那里。记得有一天,下院的尕娃一边用手比划,一边说,他在大墩根见到有人骑着两个铁轱辘,一前一后,像刀子一样立在地上往前走,快得连马也追不上。我们不信,拉着他一连穿过几块庄稼地,“铁轱辘”早已不见了,只有它走过时压下的花纹,还清晰地留在大路的蹉土上。

大墩的南面土层较厚,是一块已种植多年的庄稼地,大墩的东面是通往鲁沙尔的大路,西、北两面是一片荒滩。荒滩上除了长着一墩一墩耐旱的馒头花和扫帚草之外,地面上尽是寸把长的绒草,其中有开着深蓝喇叭花的左拧根(秦艽)和开着金黄花朵的迎春花。每年地冻草枯的时候,我们就手拿栽把,到大墩根扫“滩渣(草屑)”,以供家里烧煨用。记得有天太阳已经落山了,暮色即将降临大地,我和母亲正匆匆忙忙地往背斗里装滩渣,一对路过的母子停在我们跟前,好奇地看着我们,半晌,只听得骑在马上妈妈悄悄地对儿子说:“这么苦的地方,不知道他们阿门活着?”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

走了。望着暮色中渐渐远去的他们，我失神地站在那儿，第一次感觉到因家乡的寒苦而心里充满了自卑和苦涩。

(九)庙和圆墩坡

村口有座庙，因是“一方之保障，兼为祈福图善之所”，所以当年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据村上保存已有150年历史的《家谱》记载，当时建有三间大殿，一并修成的还有山门、两廊房、钟鼓楼等，庙中还悬挂着“山水效灵”、“黎庶被泽”匾额。为了保证管护村庙的费用，还专门留有香火地。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村庙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只有在被称为“庙滩滩”的北面，孤零零地兀立着三间坐北朝南的破旧土房，没有大门，没有院墙。走过坑坑洼洼的房前台地，进屋便见黑乎乎的北墙上贴着三张同样黑乎乎的红纸，仔细一看，上面写着“黄王山神”、“火神”、“马祖”之神位，墙下是一溜油渍渍土台，土台上摆着大小不一的几个泥捏的油灯。每逢农历初一或十五，总有人会虔诚地来到这里，那时，泥捏油灯里就会闪烁起桔红的光。土屋背后的墙根堆着一摞粘着白灰浆的青色残砖和屋瓦，窜长的蒿草挤在砖缝里，无声地诉说着砖瓦堆积年代的久远，也诉说着村庙当年的辉煌。据老人们说，在当年大清朝的同治、光绪爷手上，由于匪乱，彩绘焕然的村庙被土匪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只有这些烧不掉的砖瓦被先辈们捡拾后堆在一起，打算时局平静时再重建，所以保存到了现在。

离村庙百余米的东南方，有一座高约20米的圆圆小山，它像山村的照壁一样，一直矗立在村口，人们把它叫作“圆墩坡儿”。夏天，小山上长满了绿茸茸的野草，其间“蜜罐罐”开着紫红的花，“狗豆子”开着黄色的花；冬天，积雪覆盖了圆墩坡儿，像个银色的馒头，那里是娃娃们滑雪的好地方。

1958年的“大跃进”中，为彻底“破除迷信”，残破的村庙被勒令拆除，但迷信的村民谁也不敢拿走一根木料，最后经大队领导拍板，把好一点的木料捡拾到圆墩坡儿的山顶上，又盖成一间小屋，当作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让上了岁数的人们在里面“喳喳板（拉家常）”；拣剩的破木头送到食堂里，当作了烧柴。可老人们认为那是人老几辈子“神”住过的房子，不愿到那里去“喧板”，只愿在房外面的墙根晒晒太阳。推来让去一段时间后，有一对不怕神鬼的老夫妻搬进了屋子。用村庙木头盖成的小屋在“圆墩坡儿”上只蹲了10年，便遇上



了使干河滩天翻地覆的 1969 年。

1969 年,正是“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岁月,上级决定在离村庄不远的南边修建青海钢厂和青海第二化肥厂,紧接着,要从双寨火车站修建连接钢厂的铁路线。因圆墩坡儿因正好坐落在设计的铁路线上,设计者便巧妙地利用了它,省下了不少路基土方,村庄护心镜一样的圆墩坡儿从此被埋进了铁路路基,用村庙木料盖成的小屋也从此消失了。

(十)王家守门狗

在我记事的时候,村边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破庄廓,据说是一家姓王的院子。从拆去大门的墙豁落里望去,里面没有一间房屋,原来曾有过两间土担梁的房子(建房不用柱子,直接将檩条搭在土墙上,是贫寒人家简易的土房),搬家时将金贵的几根木头和大门一起拆走了。院子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臭蒿蒿,曾当过厨房的西北角大墙缝里,只有探头探脑的麻雀在进进出出。王家原是村上的单门独户,因家境寒难,已搬往离这儿 20 多里的白土庄,给有钱人家去当长工了,却将家里的一条瘦骨嶙峋的尕黄狗遗弃在这个只有四堵破墙的院子里。

王家搬走以后,尕黄狗彻底断了吃喝的渠道,成了真正的丧家犬。白天,它低着头,躬着腰,沿着满村墙根里乱转,寻找可吃的东西;一到傍晚,便准时回到没有大门的“王家院”里,卧在风飕飕的院墙豁口处,一直守到天亮。假如夜里有人路过它家的“门口”,便要狂吠不止,似乎还在守护着院子的主人。那年月,村上虽然贫寒,但却有个讲究,人人不吃驴马肉,更不要说狗肉了。村民们把没出息、好吃懒做的人,咬牙切齿地骂作“吃狗肉”!也正好是村上不吃狗肉的民俗,使尕黄狗得以苟延残喘,度过了没有主人的孤单岁月。大冬天里,大雪淹埋了河沟和塄坎,蜷缩成一团的尕黄狗像个白绒球一样,仍然厮守在那里,只有一股一股的白气从嘴巴处冒出。村民被它的忠诚感动了,不时有人给它一块“油花(青稞馍)”或一半个煮洋芋。3 年后,好几天人们没见尕黄狗了,捉麻雀的娃娃们看见它已死在王家按过大门的院墙豁口里,黑紫的舌头耷拉在嘴边,硬梆梆的身上落满了尘土。从此以后,村上的老人如果骂自家不肖的子孙,就说“还不如养个王家的尕黄狗”!

(十一)窝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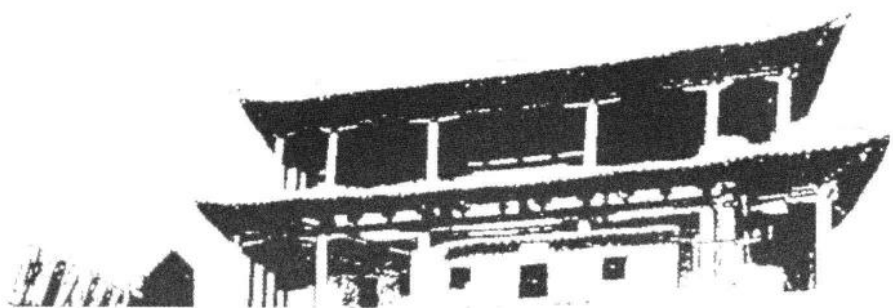
记得小时候,村上家家户户的角房屋梁或院墙上,都搭有几张羊皮或牛马皮,因为那年月贫困的山村里人少地多,广种薄收,家家都养着几只羊或一半头牛马,耕田犁地,拉运驮载,没有个马或牛,那薄薄的几十亩山地是没法种上的。羊毛可以擀毡、装被子,羊皮可以缝制“白板板”皮袄,一冬天里,它可是男人们御寒的惟一衣服;而牛马皮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个别人用它绌络缙(一种用牛马皮简单缝制的船型鞋),马具、板车上用一些皮条外,主要是用来做皮绳。那时候,没有塑料绳,虽然有的人家也种点麻头(一种籽可以吃或榨油,茎秆皮可以搓绳的一年生植物),但那只够供女人们搓麻线、纳鞋底,所以,皮绳是农家干活时惟一的捆绑用具。人们背柴、春种、秋收、打碾,处处要用到它,但现在已很少能见到它了。

所有的皮子先要经过熟制,才能再加工,熟制的过程就叫“窝皮子”,实际上就是“沤皮子”。窝皮子需要皮硝、青盐、青稞面等材料。皮硝即芒硝,是含有结晶水的硫酸钠的俗称,它是一种硫酸盐矿物,色白,西宁北山里很多,化学分子式为 $\text{Na}_2\text{SO}_4 \cdot 10\text{H}_2\text{O}$ 。西宁北山里发白的“石头”有三种,一种半透明而切面整齐、呈竖条状的是石膏;一种发白而外形凹凸不平的叫“羊脑石”;颜色白里带青,表面呈粉状的是皮硝。当年村上一姓王的汉子也想窝皮子,背着背斗走了一夜,来到 70 里外的西宁北山,第三天清晨才汗流滴水地背着沉甸甸的“皮硝”回到家。我家二阿爷是村上“窝皮子”的一把好手,经他一看,竟全是羊脑石。王家人辛辛苦苦背来的石头被倒在大门前的河滩里,多少年后,每当人们看见河沟里那堆石头,都会说起那件让人心酸的事儿。早年,二阿爷是赶着牲口去西宁北山捡皮硝的,用不完的皮硝就埋在后院土里,到用时再挖出来;公社化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人家窝皮子、缝皮袄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每次去西宁时,只能用褡裢悄悄背回一点皮硝。二阿爷去世已经 30 多年了,他当年使用过的裁刀、刮刀、绞杆、合股器等工具早已不知去向。每当我偶而去趟北山,途中见到裸露在沟坎、崖边的皮硝时,总会想起他老人家捡寻皮硝时的身影,心里总会难过一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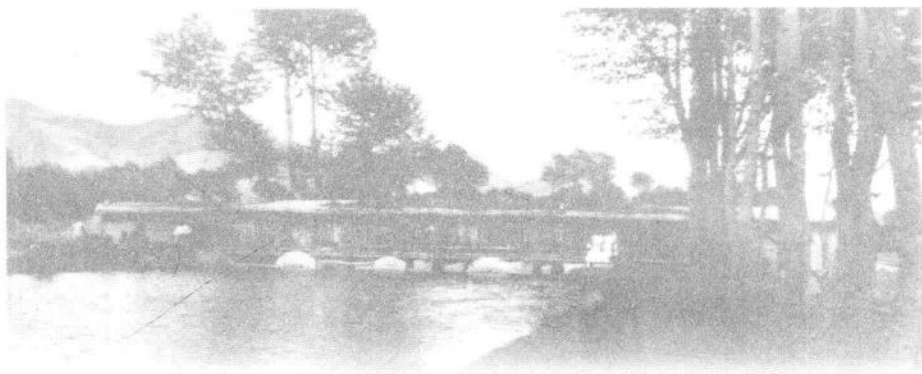
皮子是“窝”(其实是沤)在大缸里的,人们把大缸放在屋檐廊柱旁,为防缸被不小心撞倒,就用绳子捆在柱子上。届时放进羊皮,按比例添加皮硝、青

盐、青稞面和水，一段时间后，缸里就会泛出臭气，院子里充满了难闻的气味，惹得苍蝇乱飞。人们还得不时去翻动，防止皮子露出水面，以求皮张能均匀受硝。待沤熟后捞出，晾得半干时，就清理油渣、残肉，再悬挂在屋梁下，用脚蹬刮板反复进行鞣制。鞣制皮革是一件很费力的活儿，经过几道工序后，原来硬邦邦的羊皮就变得柔软如棉布，即可进行剪裁和缝制了。

牛马皮沤熟退毛、鞣制加工后，即可裁条。裁条先从皮张边缘裁起，那可是一项技术活，有技术者一手反握裁刀，一手掌握皮子进退方向；当下手者一手拽皮条，一手拽皮张，双手用力均匀，千万不得疏忽，以保证裁皮时刀刃的走向。不然，轻者会造成皮条宽窄不一，重者造成皮条断口。一张偌大的牛皮，在技术熟练者手里不停旋转，一会儿工夫，就像春蚕吐丝一样，变成了一堆宽窄一致的皮条。如果裁成四五厘米宽的，即可单股使用；如果裁成一厘米宽的，即是“拧绳”的材料。拧时可将三根皮条的一头固定，另一头绷到架子上，用“弓”形绞杆按同方向旋转，将皮条拧成圆绳，再将三根圆绳夹在一块木制“合股器”上，反方向旋转，拧合成一根，再按使用所需长度割断，穿编好断头处，使之不易散开，另一头拴上木制或铁制绳环，至此“拧绳”工序即完成。那时候，人人家里都有一两根皮绳，常用的皮绳柔软如绵，经久耐用，但最怕水浸脱硝。



《水经注》中西宁境内湟水支流谈



《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右控四水，导源四溪，东北流注于湟……而东入经戎峡口，右合羌水”。戎峡指西石峡，即今之湟源峡。上述四水指湟源县境内的纳隆沟、扎藏寺沟、大华拉拉口、小南乡纳隆口等诸小河。

羌水《水经注》中说“东入经戎峡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经护羌城东，东北流，注于湟”。《西宁府新志》中记载“羌水，出县治（西宁县）西南，经临羌故县，东北流入湟水”。羌水，即今之湟源南乡药水河，为湟水上游较大支流。水发源于日月山南侧野牛山本康村附近，沿途汇集哈城农场西侧小溪，寺滩、宗家沟、大茶什浪、白水等诸小河，在湟源县城附近注入湟水。

卢溪《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卢溪水注之”。《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出县治西南卢川，东北流注湟水”。卢溪，即今湟源县东峡响河村东的磨河。磨河发源于华石山北麓，北流经盘道（折科），在湟源峡天桥西侧不远处注入湟水。磨河上现建有“盘道水库”。

溜溪《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东北流注之”。《西宁府新志》中记载“溜溪，在县治西临羌新县故城西南，又东北流入湟水”。溜溪，即发源于湟中县共和镇的小河，北流经山甲子，出尕布沟后注入湟水。

伏溜水《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在临羌县，东北流，注湟水”。伏溜水，即发源于湟中县维新乡的小河，北流经转嘴子，出马申沟后注入湟水，

途中左侧山上有噶住寺。

石杜水《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在伏溜川东，东北流注湟水”。石杜水，即发源于湟中县大康缠（今汉东镇）的小河。水有两源，东支发源于南佛山北麓的占林村，西支发源于大小磨石沟，汇合后经汉东堡、扎扎、拉布尔、李家庄，过通海（镇海堡）北注入湟水。

蠡川《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在石杜川东，东北流注湟水”。蠡川，即发源于湟中县大、小石门的金纳水，金纳水经南佛山与照壁山之间的金纳峡，过坡家、甘河，在湟中县双寨村东侧注入湟水。

龙驹川《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龙驹川水注之”。《西宁府新志》中记载“水出县治西南山下，北流注湟水”。龙驹川，即今湟中县西堡镇的小河。水发源于大源、班沙尔附近，有名的海马泉也是其水源之一，一路经河湾、葛家、两旗、东西堡、羊圈、花园，在佐署村附近注入湟水。

临羌溪水《水经注》中说“左会临羌溪水，水发新县（指临羌新县）西北，东南流，历县北，东南入湟水”。《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发故临羌新县西北，经其县北，东南入湟水”。临羌，古县名，西汉置，初设在今湟源县南古城，不久移至湟中县湟水南岸的通海，再移至北岸的多巴后，称临羌新县。临羌溪水，即今湟中县西纳川河，发源于娘娘山南麓，流经上五庄镇水峡，史料记载其地为“金谷”，过富饶的拦隆口镇，在黑嘴尔村附近南流注入湟水。

云谷川 此河《水经注》中漏载。水发源于娘娘山南麓，建有李家山水库，流经鳌跌沟，因水分两叉，因而又称“双龙川”、“云谷川”。沟中卡约村潘家梁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卡约文化”，因而声名大振。水出沟，在西宁市大堡子附近南流注入湟水。

长宁川《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长宁水注之。水出松山，东南流经晋昌城，晋昌川水注之。长宁水又东南，养女川水注之。水发养女北山，有二源，皆长湍远发，南总一川，经养女山，谓之养女川。……长宁水又东南流，注于湟水”。《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在县治北，水出松山，即苏木莲河，合养女川南入湟水，隋炀帝所入长宁谷也”。长宁，古县名，西晋置，北魏废。长宁川即今北川河，为湟水中游较大的支流，主流发源于达坂山南麓的宝库河（史书记为“拨科”），一路经大通城关镇、桥头镇，在西宁小桥东侧注入湟水。



晋昌川 晋昌城，故城址位于今大通县城关镇北毛家沟至寺嘴一带，即依山而建的“杨家城”，城基及城门遗迹至今仍依稀可辨。估计此水即黑林河。水发源于海晏县三岔草原，经青土垭壑后入大通县青林乡黑林峡，在城关镇（旧称“毛伯胜”）附近汇入宝库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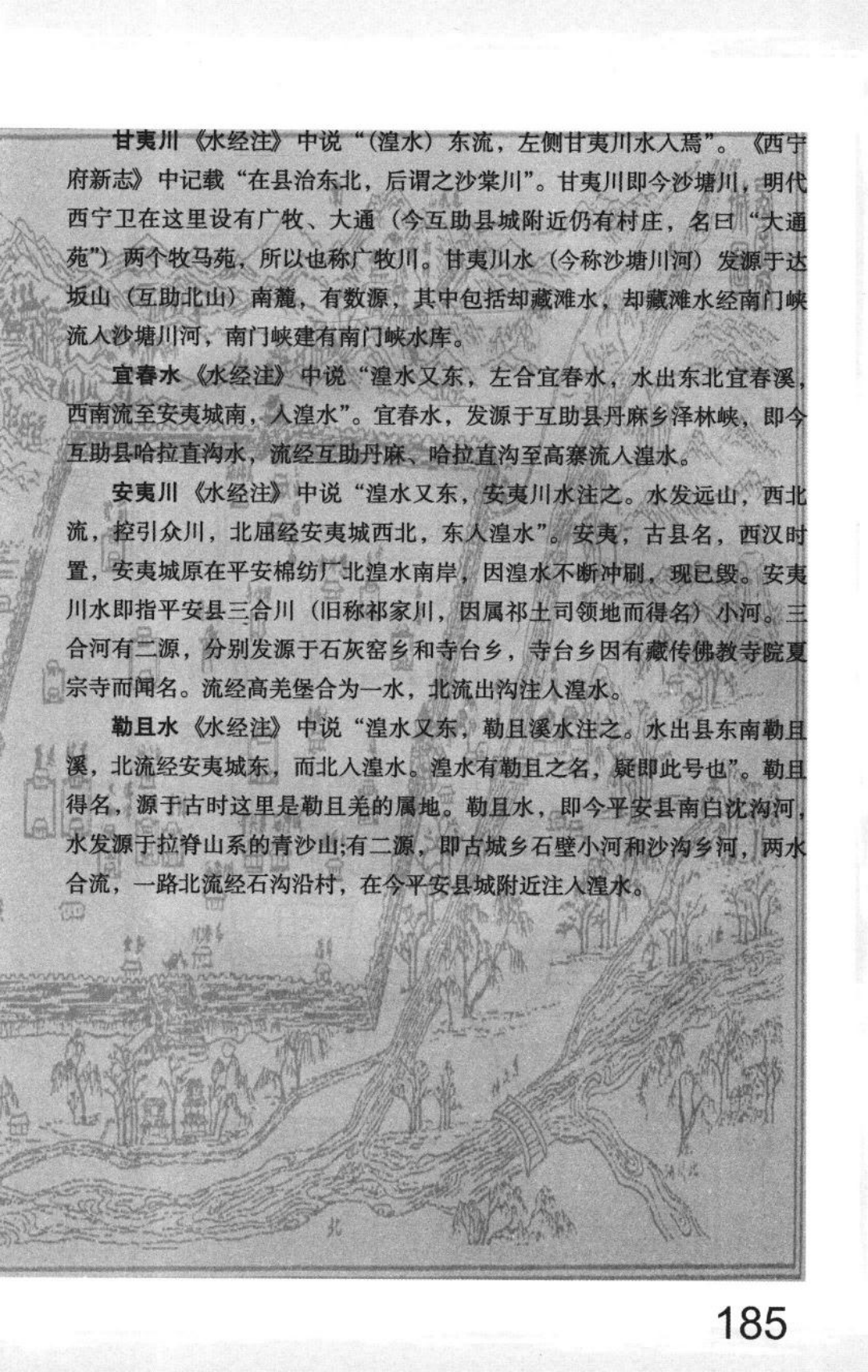
养女川 养女川水即大通县东峡河，水有二源，南源发源于向化乡达坂峡，北源发源于桦林乡瓜拉峡，两水西流，在元墩子村附近汇合西流，在桥头镇注入北川河。

景阳川 《水经注》中说“长宁水又东南与一水合，水出西山，东南流……其水东南经长宁亭南，东入长宁水。长宁水又东南流，注于湟水。”《西宁志》记为“景阳川，城西北五十里，旧名景约川”。此水即大通县景阳乡小河。水发源于景阳川脑峡门，东流经甘树湾、景阳苏家堡，出沟东流注入北川河。

牛心川 《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远山，东北流，经牛心堆（指南川申中村附近的孤山儿）东，又北经西平亭西，东北入湟水。湟水又经西平城北”。牛心川水即今南川河，又名麒麟河；西南远山即指拉脊山。南川河有三源，中间一条指去贵德路的马鸡沟峡水，为南川河主流；西边一条指门担峡水，出马场沟后，在陈家滩村东与主流汇合；东边一条指峡门水，出东沟滩经徐家寨（伏羌堡）后汇入南川河。

葱谷水 《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乱流注于湟。湟水又东经东亭北，东出漆峡，山峡也”。漆峡指西宁东面的小峡，湟水出小峡之前，右侧只有瓦窑沟水和铁骑沟水，瓦窑沟窄而短，铁骑沟（又名曹家沟）流域属湟中原升平乡干旱山区，山高沟深，一年中除下暴雨偶发山洪外，平时难有涓水。估计古时沟中植被茂密，涵养好，可能溪水较大。

常溪 《水经注》中说“（湟水）东流，右侧漆谷常溪注之”。《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在县治（指西宁县）东，水注湟”。漆谷指小峡，小峡中有常溪，即指发源于拉脊山的田家寨河。田家寨河流域原属湟中土门关、什张家、田家寨、丹麻四乡，其中什张家乡黄蒿台一支较大，诸水汇合北流，经李家台出小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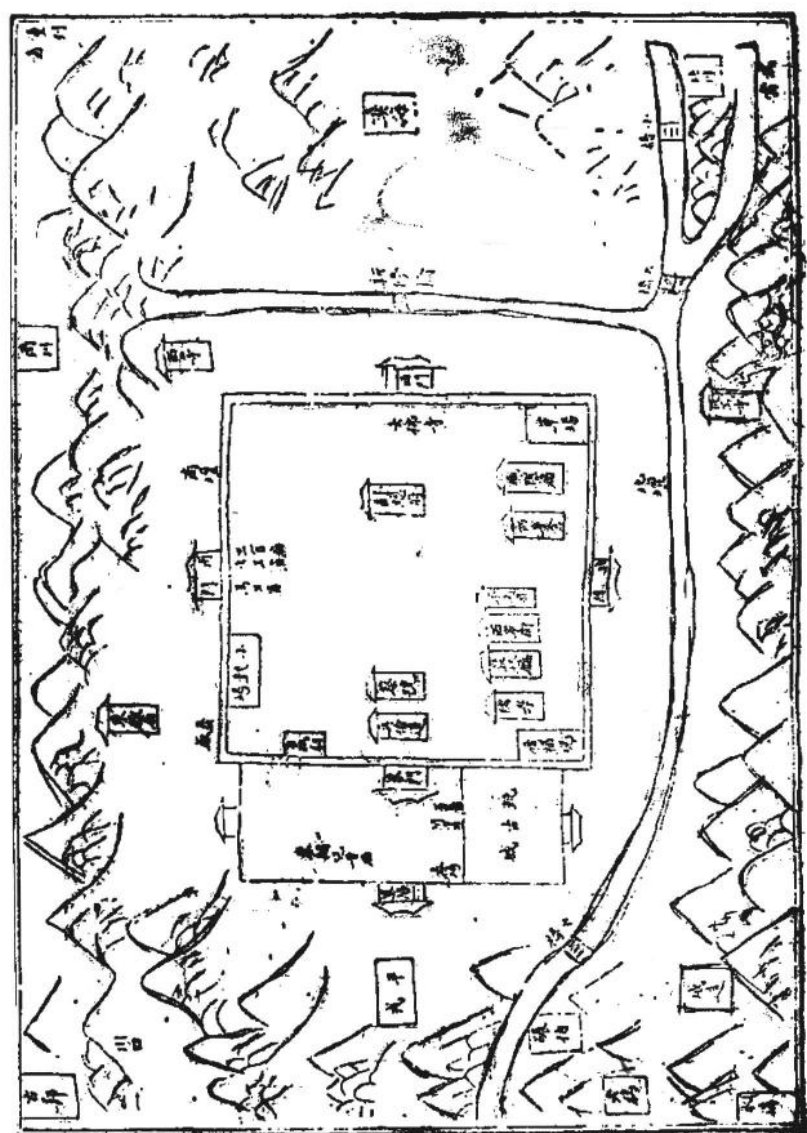


甘夷川《水经注》中说“(湟水)东流，左侧甘夷川水入焉”。《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在县治东北，后谓之沙棠川”。甘夷川即今沙塘川，明代西宁卫在这里设有广牧、大通（今互助县城附近仍有村庄，名曰“大通苑”）两个牧马苑，所以也称广牧川。甘夷川水（今称沙塘川河）发源于达坂山（互助北山）南麓，有数源，其中包括却藏滩水，却藏滩水经南门峡流入沙塘川河，南门峡建有南门峡水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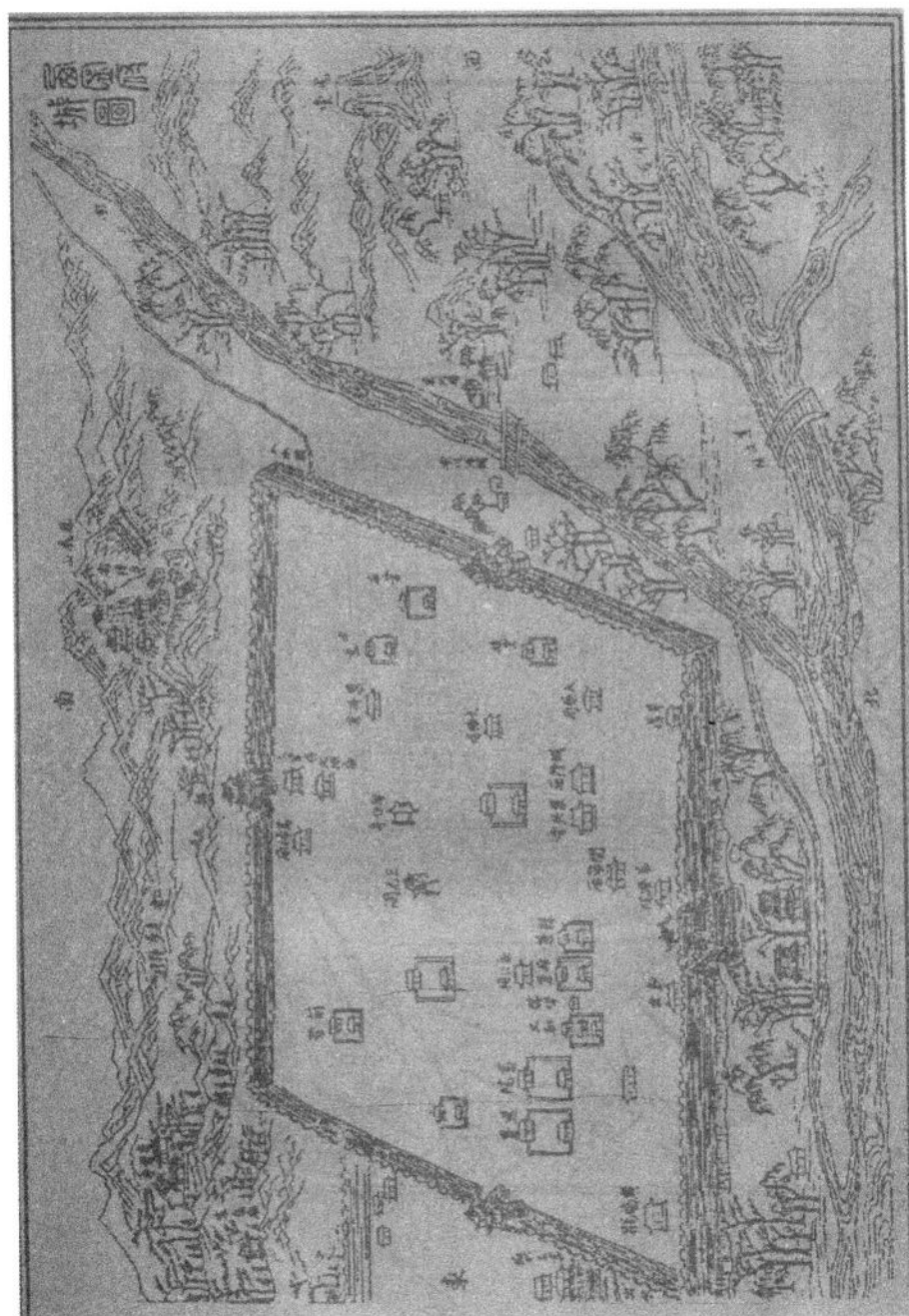
宜春水《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左合宜春水，水出东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水”。宜春水，发源于互助县丹麻乡泽林峡，即今互助县哈拉直沟水，流经互助丹麻、哈拉直沟至高寨流入湟水。

安夷川《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安夷川水注之。水发远山，西北流，控引众川，北屈经安夷城西北，东入湟水”。安夷，古县名，西汉时置，安夷城原在平安棉纺厂北湟水南岸，因湟水不断冲刷，现已毁。安夷川水即指平安县三合川（旧称祁家川，因属祁土司领地而得名）小河。三合河有二源，分别发源于石灰窑乡和寺台乡，寺台乡因有藏传佛教寺院夏宗寺而闻名。流经高羌堡合为一水，北流出沟注入湟水。

勒且水《水经注》中说“湟水又东，勒且溪水注之。水出县东南勒且溪，北流经安夷城东，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号也”。勒且得名，源于古时这里是勒且羌的属地。勒且水，即今平安县南白沈沟河，水发源于拉脊山系的青沙山；有二源，即古城乡石壁小河和沙沟乡河，两水合流，一路北流经石沟沿村，在今平安县城附近注入湟水。



寧遠縣志寧遠城圖（據甘肅省圖書館手抄本影印）





后记

拙作河湟三部曲——《河湟随笔》《河湟杂记》《河湟拾遗》出版之后，在青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下，以回顾与西宁有关的山水、街巷、堡寨、人文和旧事逸闻为主的《老西宁》即将付梓了。此时此刻，我心里充满着惶恐和忐忑不安，深怕有些文章的选题角度不对，一些事情的记述不准确，有些重要的人和事被遗漏，对先贤英烈的表述挂一漏万。……西宁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地处壮丽的达坂山和拉脊山两条巨龙之间，在数千年的青海文明史上，一直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我们的先民们在这儿与大自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像上孙家寨、沈那、卡约那样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它所表现出的自身价值，将永远在中华文明史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在2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飘扬过汉朝西征的旌旗，笼罩过南凉东拼西杀的烽烟；也迎来过文成公主进藏的车驾，矗立过广二十里的青唐王城；这儿也响起过明末大顺军攻城的呐喊，也传出过湟中书院琅琅书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霍去病、赵充国、隋炀帝、薛仁贵、哥舒翰、宗喀巴、林则徐等都曾在这儿留下过足迹。千年风云今已逝，西宁最终不但成了全省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而且也成了全省文化、教育的中心。

《老西宁》“街巷”一节中，所选的基本上是老西宁城城内的街巷，此外的几条，也是旧时城外早已形成的，如纸坊街、广济路、莫家路等。至于有的街巷介绍得详细，有的介绍得简略，是因为大多数街巷已在《河湟随笔》和《河湟杂记》中作过详细介绍，《老西宁》中只对一些没介绍过的，如大同街、纸坊街、后街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敬请读者见谅。

《老西宁》“村庄寨堡”一节中，所选的基本上是西宁城外和周边的一些村庄寨堡，已在河湟三部曲中介绍过的，尽管有的名气很大，基本上未再收入此书中。西宁现已包括大通、湟中、湟源三县，周边有名气的村庄寨堡很多，这里写到的只是极个别的。对于许多有名的大庄名堡，由于条件所限，难以亲至其地，难以亲询其事，留下了许多遗憾，也只能敬请读者见谅。

《老西宁》“旧学校”一节中，只选入了为数不多的几所，因为这些学校多是旧西宁市城内历史较久而有名气的。其实，旧时城外一些私塾、社学，大多设在村庙、祠堂之中，有的时办时停，影响大者不多，故只能拣城中重要者录入，也只能敬请读者见谅。

《老西宁》“历史名人”一节中，因版面所限，许多在西宁历史上留下过重要影响的先贤英烈未能写到，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只能敬请读者见谅。

书中收入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鲜明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年老西宁的面貌，尽管回顾时有些寒碜和苦涩，但那是实实在在的过去，我们就是在前人辛苦和奋斗的基础上，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过去条件困难的岁月里，能留下一幅家人的合照或个人相片，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可是件很奢华的事儿，一般人哪有条件去拍下老西宁的街巷屋舍呢？千千万万生活在照相机还没有普及年代的人们，也因经济条件限制等原因，终其一生也没有留下一张让后人纪念的照片。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为今天的我们留下西宁旧貌的先辈们，是他们把老西宁值得怀念和追忆的旧景又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在心头酸楚之余，感激和庆幸自己赶上了好年代，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清平岁月！为此，再次感谢提供珍贵照片的陈有钧、杨文盛、王元德、董天安、祁宁英和未知名的同志们，感谢《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的编辑同志们，是您们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为《老西宁》一书增光添彩！感谢单位领导元旦尖措先生和同志们，为我撰稿提供的方便和支持！感谢我省著名作家陈元魁先生在百忙之中为之作序。在此，再次感谢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感谢您们为《老西宁》一书的出版所作的辛勤努力！

文稿在撰写中，尽管自己做了一些努力，但资料查询不易，加之自己学识浅，书中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谬误，在此深望诸位方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出，以免错误流传，贻误来者。

2012年3月29日于苏木莲河西岸、旱坪山下